

红色中国周刊 2015 年第 44 期（2015 年 11 月 21 日）

总第 94 期

【道路探索】	2
<b>时迈：研究十月革命，继承十月革命</b>	
——读张耀祖同志纪念十月革命 98 周年文章及左向前同志的按语	2
【附】德国革命与俄国革命的比较（组图）	12
【历史澄清】	24
老田：观察文革诸问题的政治眼光与行政眼光	24
附：原文后部分网友跟帖评论	36
【理论学习】	38
《参阅文章》：看毛泽东如何对待“妄议中央”	38
【时事观察】	42
<b>革命 vs 改革家史：习正在建立“富平系”道统</b>	42
李旭之：胡耀邦百年诞辰纪念满足了胡家子女们歌爹颂爹的要求	47
高山之上兮：胡耀邦到底是谁的良心？	48
【附】张宏良：毛主席说胡耀邦中科院讲话是“放屁”	49
华岳论坛：高岗案重新审查，恢复高岗同志称谓——这是要干啥？（组图）	50
数学：把共产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向全世界传播而不要搞什么中华文明	55
王忠新：吃光毛泽东的“人口红利”十大灾难降临	57
香港《争鸣》：李克强经常发脾气、摔杯子、拍桌子（图）	65
多维：传新疆反恐“灭”17 人妇孺匿山洞被炸死（图）	66
【红中时评】	67
<b>水边：十三五能够消灭贫困吗？</b>	67
附：原文后部分网友跟帖评论	70
【经济分析】	72
<b>迎春：评楼继伟在清华大学的演讲</b>	72
【附】楼继伟清华大学演讲全文	77
<b>刘杰：危机是件很具体的事——论今天中国经济危机的成因</b>	84
刘诗蕾：社保基金收支压力在加大 媒体调查称 22 省养老金吃紧	88
【附】中国养老金亏空 3000 亿 进军 A 股补天	90
摩根士丹利：劳动力人口萎缩阻碍中国经济以 6.5% 增长	91
【国际瞭望】	93
法国新反资本主义党声明：他们的战争，我们的死亡——帝国主义战争的野蛮带来恐怖主义的野蛮	93
王琪：市场的扩张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兴起	95

**【聚焦工农】** ..... 98  
    下岗工人儿子对话李政道儿子：我们的头要比 150 年前还低..... 98  
    郝贵生：石二群为什么从普通农民变为银行劫匪?..... 100  
    2015 年 8 月份全国爆发大规模群众斗争 2200 余起（组图） ..... 103

## **【道路探索】**

### **时迈：研究十月革命，继承十月革命——读张耀祖同志纪念十月革命 98 周年文章及左向前同志的按语**

2015-11-19 作者：时迈 来自：毛泽东旗帜（击水中流）网



### **研究十月革命，继承十月革命 ——读张耀祖同志纪念十月革命 98 周年文章及左向前同志的按语**

毛泽东旗帜（击水中流）网 时 迈

张耀祖同志应邀在“国内某左翼团体”纪念十月革命 98 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梦回俄国革命》一文（原标题《十月革命的当代意义》），写得非常好。《红色中国周刊》“左向前”同志的“按语”，更是起到“点睛”的作用。

我们作此文，以便更大力度地宣传“张文”及“左按”的观点，同时阐发我

们自己的一些感想，欢迎各界读者参加讨论。

张文通过回顾俄国 1905 年革命和 1917 年革命前前后后的曲折过程，向我们揭示了一个真理，就是张文最后一句所说：“暴力革命终归是被压迫者获得解放的真理，列宁也没有能够超越它”。但是，张文的精彩之笔还不在于此，而是在于揭示革命的“必然性”是怎样通过历史的“曲折性”表现出来的。

### (一)

如张文所述，俄国 1905 年革命本来是由“成千上万名信仰上帝、忠于皇上”的工人在加邦神父的带领下向沙皇请愿，遭到沙皇开枪镇压，从而“意外”引发的革命。但是，1905 年革命的意义，在俄国历史上，是怎样评价都不过分的。它不仅是俄国近代革命历史的开端，而且是 1917 年革命的一次总演习。正如张文中引用的列宁的一段话所说，自从 1905 年革命之后，**“这个拥有一亿三千万人口的大国就陷入了革命之中，于是这个昏睡的俄国就变成了革命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俄国”**。

但是，我们绝对不能忽视的一个历史细节是，1905 年革命确实如张文所说，“仅仅是由看似愚昧无知的工人请愿活动‘意外’引起的，持续一年的反复斗争和较量，又把这些平日里软弱可欺的人，教育和锤炼得坚不可摧，并使他们后来具备了改天换地的能力”。

俄国的工人阶级之所以能够转变为有能力、有作为的阶级，恐怕还要“归功于”沙皇统治者毫不妥协的镇压，使群众受到了异常深刻的教育。

列宁 1917 年 1 月 9 日在给瑞士青年工人所作的报告中指出：

**“俄国还没有革命的人民”——当时俄国自由派的领袖彼得·司徒卢威先生在“流血星期日”前两天这样写道，他那时在国外办了一个自由的、秘密的刊物。在这位“受过高等教育的”、高傲自大的和愚蠢透顶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的领袖看来，认为没有文化的农民国家能够产生革命的人民，这种想法是荒谬绝伦的！当时的改良主义者正如现在的改良主义者一样，深信不可能发生真正的革命！**

1905 年 1 月 22 日（俄历 9 日）以前，俄国的各革命党派都是由很少的一群人组成的，而当时的改良主义者（也正像现在的改良主义者一样！）骂我们是“宗派”。几百名革命组织者，几千名地方组织的成员，每月最多不过出版一次的半打革命小报（这些小报主要是在国外出版，经过重重困难，付出重大代价，辗转寄到俄国），这就是 1905 年 1 月 22 日以前以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为首的俄国各革命党派的情况。这种情况就给既目光短浅又目空一切的改良主义者提供了一种表面上的理由，断言俄国还没有革命的人民。

但是，在几个月之内，情况就大变了！几百名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突然”增加到了几千名，这几千名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又成了两三百万无产者

的领袖。无产阶级的斗争在 5000—10000 万农民群众当中引起了巨大的风潮，在有的地方还引起了革命运动；农民运动得到了军队的响应，又引起了军人的起义，并且使得一部分军队同另一部分军队发生武装冲突。于是这个拥有 13000 万人口的大国就陷入了革命之中，于是这个昏睡的俄国就变成了革命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俄国。

**必须研究这次转变，了解它的可能性，它的所谓方法和道路。**

由此可见，俄国当初有一帮改良主义者，他们囿于俄国当时的群众还不觉悟这一暂时现象，妄言“俄国还没有革命的人民”，因而兜售其改良主义主张。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揭示经过曲折的过程而表现出来的历史必然趋势——人民要革命，就是要面对我们今天的、特别是“左派”队伍里改良主义思潮。

正如“左向前”同志在张文“按语”中所指出的，在今天看来，“没有革命的人民”何尝不是困扰革命者的最大难题、同时也是形形色色的改良主义者免谈革命的最坚实的盾牌！？但 98 年前的列宁没有因为这个与今天一模一样的门槛而被“目光短浅又目空一切的改良主义者”绊住脚步，那个时代最终改天换地的无产阶级其实也并不比今天的我们拥有更多历史赐予的资源 and 优势。

## (二)

张文叙述了俄国 1917 年二月革命的过程之后，提出了一个问题：**二月革命之后，出现了两种政权并存的局面，一方面是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一方面是各地的工兵代表苏维埃。在沙皇退位的当天，资产阶级与苏维埃达成协议，第一届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成立，且临时政府的所有主要部门都掌握在了资产阶级手中。那么，为什么工农阶级没有及时推翻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反而是去支持资产阶级去独立组阁呢？**

张文明确回答道：**其根本原因在于，当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进行决战时，介于其中的小资产阶级是左右双方力量对比变化的关键因素。**

张文介绍道，俄国 1917 年二月革命成功后，俄国存在着三股主要的政治力量：一个是以立宪民主党为政治代表的资产阶级（沙皇被打倒后，贵族和各色保皇党人要么进行地下活动，要么加入了立宪民主党），他们在经济上占有重要地位，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组织上又有很大发展，拥有地方自治机关、国民教育机关、各种全国性代表大会、杜马、军事工业委员会等合法阵地，并有强大的报纸、刊物等舆论工具，相当于承继了除王权以外沙皇政府统治时期所有的政治遗产；一个是以几个“温和派”社会主义政党（主要以由左翼知识分子和工人上层担任党的领导、宣布代表工人阶级的孟什维克；由“关怀”“心系”农民的知识分子和富裕农民担任党的领导、宣布代表俄国农民的社会革命党两党为主）控制的苏维埃；另一个是以布尔什维克为首的几个较小的革命派社会主义政党以及主张暴力推翻资产阶级的部分底层工人和士兵。

列宁指出：“在苏维埃中，只有少数代表拥护革命工人的政党，即拥护要求全部国家政权归苏维埃的布尔什维克社会民主党人。多数代表则拥护反对政权归苏维埃的孟什维克社会民主党人和社会革命党人。这两个政党不但不主张推翻资产阶级政府并用苏维埃政府来代替，反而主张支持资产阶级政府并同它妥协，同它组织共同的政府。”

鉴于以上种种情况，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本来打算通过各种和平手段而不是强制措施，在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这架力量不稳定的天平上，使农民小资产阶级这颗砝码加载到无产阶级这一方面来，实现“全部政权转归苏维埃”。列宁认为，“苏维埃掌握全部政权，那么小资产阶级各阶层的主要缺点、主要毛病，即对资本家的轻信态度，就会在实践中得到克服，就会被他们的实际工作经验纠正；在苏维埃独掌全部政权的基础上，执政的各阶级和各政党的替换在苏维埃内部是有可能和平地进行的。……政权归苏维埃这一事实本身，不会改变而且也不能改变各阶级间的相互关系，也丝毫不能改变农民的小资产阶级性。但是它会及时地大大促使农民离开资产阶级而接近工人，并且同工人联合起来。”

但是，俄国 1917 年二月革命后，工兵代表苏维埃中绝大多数的代表均由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两党委派。这两个小资产阶级政党占据多数的苏维埃，在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成立后，把自己确定为检查和监督临时政府行动的机关，充当起资产阶级早年通过议会监督国王一样的角色，并对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表示支持，只要临时政府履行自己所许下的诺言。与此同时，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上台后，对内对外继续实行没有沙皇的沙皇政策，导致对外战争失败，在国内造成普遍的民众失业和饥荒，导致临时政府失信于民，致使国内民怨沸腾。1917 年 7 月，在首都彼得堡爆发了 50 万工人、士兵参加的大游行。

此时，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居然同意把反动军队调进彼得格勒，临时政府以“维护市内秩序”为名下令部队向示威群众开枪，造成 400 余人伤亡，并宣布首都戒严，解除工人武装，封闭《真理报》并通缉列宁，这就是著名的“七月事变”。“七月事变”成为两个政权并存局面的终结点，资产阶级已经举起了屠刀，和平过渡的通道被关闭。

紧接着，1917 年 8 月又爆发了资产阶级立宪民主党怂恿的、俄军最高司令科尔尼洛夫发动的军事叛乱。叛乱虽然很快被平息，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已经彻底丧失民意，政权危机在即。

列宁说：“获得多数人民信任的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的这种同资产阶级妥协的政策，就是革命从开始以来整整 5 个月内（指俄国 1917 年二月革命至“七月事变”之间的 5 个月——引者注）全部发展进程的主要内容。”至此，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把小资产阶级拉去同资产阶级结盟的政策正在遭到可耻的失败。二月革命以来，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总是一直受到大部分人民的信任的，“七月事变”已经使他们失去了一部分工人和士兵群众；8 月的军事叛乱，客观上更加重了小资产阶级政党的信任危机。人民受到了教育，贫苦农民即大多数渴

望土地的农民已经开始同无产阶级结成联盟，趋向于同无产阶级联盟而拒绝同资产阶级联盟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占到了三分之二的多数。小资产阶级迅速向无产阶级靠拢了。

列宁于 1917 年 7 月总结道：“**俄国革命的教训是：劳动群众要挣脱战争、饥荒和地主资本家奴役的铁钳，就只有同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完全决裂，认清他们的叛徒嘴脸，拒绝同资产阶级实行任何妥协……。**”

张文精辟地指出，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这两个政党，用当时的话说都是“温和派”社会主义者，是“护国派”。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左右合流派”、“二次革命派”或“强国派”、“保党救国派”。作为小资产阶级，由于其阶级的经济地位，必然会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摇摆不定；其领袖人物的政治表现，由于他们更多地受到统治阶级思想意识的熏陶，对资产阶级还要再多一份一厢情愿。

“左向前”同志在发表张文时所加的“按语”指出，历史上的各色演员都能在今天对号入座，实力雄厚的保皇党、立宪派，自称代表了工人阶级和农民利益、实际依附于资产阶级，控制了苏维埃大多数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政党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以及列宁所领导的一直属于少数派的布尔什维克……

### (三)

读了张文及“左按”，我们获得一些什么教益呢？

人民群众也是在阶级斗争中不断学习的。没有 1905 年 1 月 9 日的“流血星期日”，就没有俄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初步觉醒；没有 1917 年“七月事变”，俄国群众和平地实现“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愿望就不会破灭，也就没有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破产，因而也就不会有俄国工人阶级举行武装起义的决心。人民群众的觉悟，总要通过一个过程；而这个过程中，需要资产阶级的反面教员“帮忙”；通过正反两方面的反复教育，不觉悟的人们终究会觉悟起来。

小资产阶级是群众的一部分，它历来有着革命性和局限性，广大小资产阶级群众——农民、知识分子、小职员，以及工人阶级中比较富裕的一部分，都有这样的两面性。但是纵观历史，其革命性总是主要的，只要他们受到大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他们总要反抗的。正如毛主席所说，总是一部分人觉得受压，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所以他们要革命呢。一万年以后矛盾就看不见了？怎么看不见呢，是看得见的。

但是，**附属于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政治团体、乃至政党，是否总是要革命呢？那就不一定了。**在一定条件下，无产阶级力量强大，且无产阶级政党的政策对头，他们就会转向革命一边。反之，如果无产阶级力量暂时处于微弱状态，如果资产阶级影响巨大、政策狡猾，他们则可能走向反革命。

如列宁所说的那样：“**由于小资产者不自觉地轻信资本家，他们在党派斗争的发展进程中就堕落到自觉地去支持反革命分子的地步。**”“小资产阶级民主

派，特别是它的领袖们，总是想跟着资产阶级跑。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领袖们总是用诺言和保证来安慰自己的群众，说同大资本家达成协议是可能的，可是，他们顶多能在极短的时间内使资本家对劳动群众中的少数上层分子作些小小的让步，而在一切有决定意义的问题上，在一切重要问题上，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总是做资产阶级的尾巴，成为资产阶级的软弱无力的附属品，成为金融大王手中的顺从的工具。”

某个自诩“左派”的“法学教授”曾在今年7月份纪念“七一”的座谈会上，引用列宁《论妥协》一文中关于必须善于学会妥协的论述，大谈所谓“策略”，大谈所谓“学会妥协”。但是他到底想跟什么人妥协、在什么问题上的妥协，却语焉不详。确实，机会主义的特点就是含糊其辞、模棱两可。

实际上，《论妥协》是列宁在1917年十月革命前夕写就的一篇文章，该文主要是力图说明，应该试图与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主动进行妥协，因为只要布尔什维克在苏维埃中真正具有进行宣传、鼓动的充分自由，只要在苏维埃的改选和职能方面立即贯彻新的民主制，自然就能保证革命和平地向前推进、和平地解决苏维埃内部的党派斗争。但是，列宁在文中同时强调了两点，一是布尔什维克采取这种主动妥协所获得的是它在苏维埃中能够具有进行宣传、鼓动的充分自由，而这一点只能在苏维埃中才能做到，在资产阶级政府中是不可能做到的；二是这种通过妥协和平地解决苏维埃内部的党派斗争、使革命和平地向前推进的可能性，在历史上是非常罕见，因此是非常可贵的，但列宁又重复强调“是极其罕见的”。在写作《论妥协》这篇短文之后的两天，列宁在短文之后又写下了一小段文字，说看了最近几天的报纸，觉得提出这种妥协的建议，为时已晚；“也许革命还有和平发展的可能的那几天”已经过去了，“只好把这篇短文送到编辑部去，并请求加上一个《过时的想法》的标题……有时候知道一下过时的想法也许不是没有意思的吧”。

列宁在《论妥协》一文中，说的是无产阶级在这一罕见的历史机遇中，在苏维埃当中与小资产阶级及其政党进行妥协。而“法学教授”所要讲的“妥协”又是什么呢？或许是想把群众拉过去与资产阶级妥协吧。对此，我们切不可书生气十足！

#### （四）

在人民还不够觉悟时，经常会有那么一些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的政治团体，总是要顽固地兜售其改良主义幻想，而且总是力图把群众拉过去同资产阶级达成妥协、同资产阶级结盟。这些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的政治团体，总是要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想让他们不表现是不可能的。在一定的时期内、在一定的条件下，这些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的政治团体，可能还会在群众中拥有一定的市场。对于这一点，我们必须保持有准备的头脑。

我们不仅要保持头脑清醒，还要随时拿出应对的策略。就像张文试图通过梳理俄国革命的历史过程从而获取一定的经验教训一样，我们前不久也整理了一个材料题为《德国革命与俄国革命的比较》。德国 1918 年爆发“十一月革命”后，同样是推翻了德皇统治，但政权却被资产阶级篡夺，没有从各阶级不同政治势力的较量中夺取主导权，甚至德国不来梅和巴伐利亚两个地区工人阶级奋起反抗资产阶级统治的起义，也惨遭镇压。当时代表德国资产阶级的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中的右派，代表德国小资产阶级、并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摇来摆去的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中的“中派”；考茨基就是这个“中派”的代表人物，而列宁则称考茨基之流为“可耻的中派”。后经与右派分裂，以“中派”为主导，成立了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而代表无产阶级的、由真正马克思主义者组成的政治组织——斯巴达克同盟，没有及时同“中派”决裂，而是留在德国独立社民党内，没有及时争取到大量群众；等到他们意识到需要独立成为一个政党、并着手建立德国共产党时，一切都已经晚了。

而在俄国，“**布尔什维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思潮，作为一个政党而存在，是从 1903 年开始的**”。（列宁语）在 1905 年革命失败时，作为一个独立的、拥有正确政治路线的政党，布尔什维克就能够“**正确地退却**”，在当时俄国各个革命政党和派别中，“**退却得最有秩序，‘军队’损失最少，骨干保存最多，党内分裂最小，颓废情绪最轻，恢复革命工作的本领最高**”。（列宁语）

在 1917 年二月革命后，出现了两种政权并存的局面，各地的苏维埃政权中又被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占据多数，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则伸缩自如，首先力图在苏维埃内部通过与小资产阶级政党实行妥协，把广大群众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上来；在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悍然开枪镇压群众的“七月事变”后，又果断组织工人武装起义，实现了俄国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

**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之所以能够如此，就是因为它在组织上是独立的，在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是独立的，因此，可以最大程度地发挥主观能动作用。**

“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是人们的认识规律，这是不可以超越的。但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政治家，在政治上有了清醒的思想准备，政策上才能够有足够的灵活机动**，像列宁和布尔什维克那样挥洒自如，而立于不败之地。如果像德国马克思主义者那样，对小资产阶级“中派”的危害认识不足，不能够及时地划清界线，则将陷入政治被动，直至导致革命失败。

## （五）

通过梳理俄国革命的过程，我们得知，在俄国革命中，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打“社会主义”之名、行改良主义之实，曾经欺骗了大批群众。幸而列宁是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家，幸而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是成熟的无产阶级政党，他们既坚持原则、又善于斗争，既给了广大群众以时间和过程，使他们得以领教和识别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力图把广大群众拉下水、与资产阶级结盟、做资产



阶级奴仆的本质，又坚持无产阶级思想路线和无产阶级政党的独立性，在关键时刻，团结广大工人和其他劳动群众，挫败了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图谋，使广大小资产阶级群众与无产阶级联合在一起，使革命转到社会主义革命轨道上来。

实际上，在当时的俄国，还有一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从另一个角度，对十月革命进行种种指责和非难。

考茨基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可耻的中派”，是典型的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的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代表。十月革命以后，考茨基发表题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小册子，其中在“经济分析”的幌子下，傲慢地大谈“历史唯物主义”。考茨基的所谓“经济分析”，就是从分析俄国的经济形态出发，企图证明俄国是小生产为主的落后国家，因此俄国革命只能是资产阶级革命，不具备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企图证明农民占俄国人口的大多数，因此十月革命之后俄国的苏维埃政权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农民专政。考茨基责备布尔什维克把社会主义事业交给了农民；而考茨基认为，农民整个来说都站在资产阶级社会关系的基础上面。

列宁于1918年在病中写成了《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书。列宁指出，考茨基在1905年曾经赞成无产阶级和农民进行联合，但是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面前，他又反对布尔什维克建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革命专政。这说明，考茨基把1905年革命是看作资产阶级革命，他只赞成在资产阶级革命中把团结农民作为权宜之计，他把农民只看作资产阶级革命中的一股可以利用的力量，而不是认为无产阶级应当引导贫苦农民来夺取民主革命的领导权。正因为如此，无产阶级团结贫苦农民来大办社会主义、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对考茨基来说就更是不可思议的了。列宁在驳斥考茨基的无知的“经济分析”时说：“**可爱的理论家，你想过没有，在这大批的小生产者中间究竟会有多少剥削者呢？**”

1921年，孟什维克理论家苏汉诺夫又发表了所谓《革命札记》。他在札记中肆意歪曲俄国革命的历史，大肆散布“俄国不具备社会主义革命的物质条件”的论调。列宁针对这一情况，本着高度的责任感，从社会主义革命的前途命运出发，于1923年，在不能执笔的情况下，用口授和整理秘书笔记的方式，写下了《论我国革命——评尼·苏汉诺夫的札记》一文，在理论上给了苏汉诺夫之流以有力回击。

列宁在文章中还提到应该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指出俄国“**所有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也和第二国际全体英雄们一样迂腐**”，“**他们都自命为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却迂腐到无以复加的程度。马克思主义中有决定意义的东西，即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他们是一窍不通的**”。“**马克思曾经表示希望能够造成一种革命局面的德国农民战争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就是对马克思的这个直接指示，他们也像猫儿围着热粥那样绕来绕去，不敢触及**”。

孟什维克，不仅在1917年革命中充当了可耻的角色，在1905年革命的关键时刻，孟什维克派就迂腐至极地提出：正在发生的俄国革命同过去的西欧资产阶级革命一样，都是资产阶级革命，因此只能由资产阶级充当领导，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只能是同资产阶级联盟，而不是接近和发动群众，特别

是不能接近农民。孟什维克认为，如果沙皇倒台，应当让资产阶级维持长期的统治，等到资本主义成熟以后，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列宁于1905年写下了《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书，针锋相对地阐述了布尔什维克的纲领，那就是：俄国反对沙皇的民主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来领导；必须团结贫苦农民、建立牢固的工农联盟；必须举行武装起义、彻底推翻沙皇的专制统治、建立临时革命政府，而不能让步于沙皇政权的任何改良措施；拟议中的临时革命政府，必须实行工农革命专政；必须对资产阶级采取既团结又斗争的策略，必须充分考虑到可能发生的新矛盾，必须为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不断创造条件。

在1905年革命前夕，俄国最黑暗的年代，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的“经济派”，就充满着对产业工人斗争自发性的迷信和崇拜，这种假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在当时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和进步知识界为害甚广，列宁1902年写的《怎么办？——我们运动中的迫切问题》一书，就对这种思潮进行了分析和批判，指出：“**阶级政治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给工人，即只能从经济斗争范围外面，从工人同厂主的关系范围外面灌输给工人。只有从一切阶级和阶层同国家和政府的关系方面，只有从一切阶级的相互关系方面，才能汲取到这种知识。**”“我们已经说过，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列宁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理论，形成了建立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的思想。

在布尔什维克党内部，也有过类似的机会主义思潮。托洛茨基就曾大肆兜售过所谓“不断革命论”，认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不仅会和资产阶级发生冲突，而且会和那些协助过它取得政权的广大农民群众发生敌对的冲突。

由此可见，列宁与上述假马克思主义进行的斗争，是一以贯之的。

## （六）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小资产阶级民主党派，在抗日战争和反蒋斗争中，总的来说是跟着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走向革命的。当然，在反蒋斗争中，也有一部分小资产阶级民主党派对美国抱过幻想，妄想通过美国阻止蒋介石发动内战；也有一部分民主党派试图在国共两党之间营造所谓“第三势力”，企图推行所谓既不依靠美国、也不依靠苏联的“第三条道路”。但是，随着中国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上述小资产阶级政党的幻想和企图很快就土崩瓦解了。

中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汪洋大海，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倾向、政治要求，曾经集中反映到中国共产党内部。1945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七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曾指出：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是小资产阶级极其广大的国家。我们党不但从**

党外说是处在这个广大阶层的包围之中；而且在党内，由于十月革命以来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世界的伟大胜利，由于中国现时的社会政治情况，特别是国共两党的历史发展，决定了中国不能有强大的小资产阶级政党，因此就有大批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民主分子向无产阶级队伍寻求出路，使党内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分子也占了大多数。

必须着重指出：任何没有无产阶级化的小资产阶级分子的革命性，在本质上和无产阶级革命性不相同，而且这种差别往往可能发展成为对抗状态。带着小资产阶级革命性的党员，虽然在组织上入了党，但是在思想上却还没有入党，或没有完全入党，他们往往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面貌出现的自由主义者、改良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布朗基主义者等等；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但不能引导中国将来的共产主义运动达到胜利，而且也不能引导中国今天的新民主主义运动达到胜利。

如果无产阶级先进分子不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 and 这些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的旧有思想坚决地分清界限，严肃地、但是恰当地和耐心地进行教育和斗争，则他们的小资产阶级思想不但不能克服，而且必然力图以他们自己的本来面貌来代替党的无产阶级先进部队的面貌，实行篡党，使党和人民的事业蒙受损失。

当今中国，包括“左派”队伍当中，一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及其团体，不仅打着“社会主义”、“强国”的旗号，而且打着“左派”、“毛派”的旗号，这难道不是事实吗？我们今天怎样面对这样一个事实？

在当今“左派”队伍里，有些人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觉得既然大家都自称“左派”、“毛派”，那就都是无产阶级革命派，不存在小资产阶级思潮的影响。

持有这种想法的朋友，或许出于其本身的小资产阶级地位和世界观，自己就没有弄清楚什么是无产阶级立场、什么是小资产阶级立场。这样的朋友，需要站在最大多数中下层人民的立场上，同时还要认真学习、掌握马列毛主义基本原理，把实际经验上升到理论高度，又把书本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上下贯通、反复体验，才能突破自己的小资产阶级立场。

另外，有些朋友是学过一些马列毛主义的，对于目前“左派”队伍中的是非对错，也能略知一二。但是，这些人既想与某些小资产阶级的错误观点及其派别保持一定距离，又出于某种目的想要达成妥协，因此经常处于变化之中，说起话来含含糊糊，做起事来左右逢源；或者口头上条条是道，行为上摇摆不定。这一部分朋友，有的是出于“老好人”思想，希望大家“团结”起来；有的对是非曲直心知肚明，但因为涉及自己的老朋友、老相识，因此采取“明知不对，少说为佳”的策略；有的甚至是为了扩大自己在“左派”队伍里的影响，尽管在理论上知道某些小资产阶级观点和主张的错误所在，却把本位利益放在了第一位，搞起实用主义。

所有这些，足以说明一条真理，无论我们学了什么理论、主义，都要在自己的生活实际中，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南宋时期的大诗人陆游有一首《教子诗》：

“古人学问无遗力，少壮工夫老始成。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这首诗的意思是说，古人做学问是不遗余力的。终身为之奋斗，往往是年轻时开始努力，到了老年才有所成就。从书本上得到的知识终归是浅薄的，要真正理解书中的深刻道理，必须亲身去躬行实践。

那么，对于马列毛主义这门学问，同样不能满足于字面上的了解，而要躬行实践，在实践中加深理解。而且，必须首先身体力行，而不是“对人马列主义，对己自由主义”。只有这样，才能把书本上的知识变成自己的实际本领。

总而言之，正如毛主席所教导的：“**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一个路线，一个观点，要经常讲、反复讲。只给少数人讲不行，要使广大群众都知道。**”无论是我们还原德国革命的历史，还是分析俄国革命的历史，抑或研究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都不是钻进故纸堆搞纯学术研究，而是为了古为今用、为了面对现实、为了迎接未来。

最后，让我们以两位革命导师的话，作为本文的结束语吧。

**在革命时期千百万人民一个星期内学到的东西，比他们平常在一年糊涂生活中所学到的还要多。因为当全体人民的生活发生急剧转变时，可以特别清楚地看出在人民中间什么阶级抱有什么目的，他们拥有多大的力量，他们采用什么手段进行活动。**（列宁 1917 年 7 月《革命的教训》）

**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取舍。**（毛泽东 1927 年 3 月《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编注：作者系毛泽东旗帜（击水中流）网站站长

## 【附】德国革命与俄国革命的比较（组图）

2015-11-7 | 来自：毛泽东旗帜（击水中流）网

### 德国革命与俄国革命的比较

【毛泽东旗帜（击水中流）网编者按】在纪念伟大的十月革命 98 周年之际，我们刊登此文，以飨读者。俄国 1917 年爆发二月革命，推翻了沙俄的统治，仅仅过了半年时间，就成功爆发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而德国有 1918 年的十一月革命，推翻了德皇的统治，但革命成果却被社会民主党中的右派所篡夺，延续了资产阶级和容克地主的统治，并残酷镇压德国工人阶级的进一步革命斗争。这到底是什么原因？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

## 1、德国革命与俄国革命的比较

德国是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的故乡，有着悠久的工人运动传统和历史，有一大批被后世熟知的“与工人运动相关”的思想家，比如拉萨尔、杜林、伯恩斯坦、考茨基、威廉·李卜克内西、倍倍尔、卡尔·李卜克内西、罗莎·卢森堡（她是取得了德国国籍的波兰人）；先后出现了一系列复杂的工人运动政党，比如全德工人联合会、社会民主工党、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德国社会民主党、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德国共产党；发生过一系列对后世影响深远的思想论战，比如马克思与拉萨尔的论战、恩格斯与杜林的论战、对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的批判、列宁和考茨基的论战以及列宁和罗莎·卢森堡的论战。俄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以及列宁本人都极大地受到了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而最后作为“学生”的俄国无产阶级革命者通过“十月革命”取得了革命胜利，作为“老师”的德国革命者却在“十一月革命”后遭到了惨重的失败。

对比俄国和德国的共运史，最应当引起我们重视的就是俄国二月革命和德国十一月革命的不同结果。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在二月革命后，通过发动十月革命，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以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为首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却在德国十一月革命后，遭到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右派政府的镇压，最终“一月起义”失败，“不来梅社会主义共和国”和“巴伐利亚社会主义共和国”被颠覆，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也被杀害。我们首先承认这两次革命具有各自的不同情况，其成败原因也不只一个。但是我们更要指出，这两次革命具有很多共同点，是可以进行对比分析的；而组织理论上的分歧以及由此导致的不同的组织方式是导致它们一成一败的极为重要的原因。

### （1）德国革命和俄国革命具有以下共同点

第一、革命的背景都是本国当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遭受了重大的军事失

败，国家暴力机器受到巨大损失，统治力大大削弱。

第二、革命最初都是以工人、士兵的自发反抗、罢工、暴动开始的。

第三、旧政府（德国皇帝和俄国沙皇政府）在这种自发革命中，摧枯拉朽地轰然倒塌，新的政权没有建立起来，而旧的统治秩序已经崩溃，出现了一定时期的无政府状态。

第四、最初的革命者中，都分为左右两派，而这两派中的主力都曾经是一个工人运动政党内的左右两派，而这两派在旧秩序瓦解后都进行了你死我活的斗争。（这也许是个很不确切的说法，因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内还有“中派”；而俄国除了社会民主工党分裂为了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以外，社会革命党也分裂出来左派社会革命党。而这里其实是要突出，工人运动的左右两派在旧秩序瓦解后进行了你死我活的斗争。虽然我们可以认为右派实质上是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但是必须承认他们也曾经是工人运动中一支领导力量。）

第五、革命中都建立了苏维埃，而在自发革命阶段苏维埃都掌握在了右派手里，右派掌握的苏维埃又都试图承认右派组织的临时政府。

第六、右派的临时政府又都受到更反动的政治派别的威胁。俄国发生了科尔尼洛夫叛乱，而德国发生了卡普叛乱。

**（2）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德国共产党与俄国布尔什维克相比，具有以下组织路线上的重大问题，导致了他们在十一月革命中的惨重失败**

第一、我们需要认识到，在按照列宁的组织理论组建的布尔什维克以前，实际上世界上并没有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这是因为当时的工人运动政党都采取一种松散的、“民主”的、自上而下的组织模式，其主要内容包括：宽松的党员发展方式，一般只要申请加入都可以得到批准，甚至可以自行宣布成为党员；党员并不需要加入党的一个组织，可以不受纪律约束；党的纲领又由这些通过“宽松方式”入党的党员“民主”选举的代表“民主”决定。因此哪些内容能够上升为党的纲领并不确定，阶级矛盾尖锐的时期革命思想就占上风，马克思主义的内容就会更多地进入纲领；而阶级矛盾缓和的时期改良思想就会占上风，修正主义的内容就会更多地进入纲领。而即便马克思主义的内容进入了纲领，由于这个党是松散的，也无法使全党贯彻这些内容。这样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在和其他思想（比如拉萨尔主义、蒲鲁东主义）在“自由竞争”着对工人运动的影响力，而在一个工人运动政党内也是这样“自由竞争”着对党的影响力，而各个工人运动政党又“自由竞争”着对工人运动的影响力，这些政党又通过议会选举“自由竞争”着对国家的影响力。这样整个工人运动完全处于各种思想的“自由竞争”状态下，根本没有一种思想可以称为国际或某国或某党的指导思想。

而列宁主义的政党是严密的自上而下模式的先锋队组织，其主要内容包括：



严格地吸收党员，党员是按照一个确定的马列主义的纲领、章程吸收的；党员必须加入党的一个组织，必须接受严格的纪律约束；党的纲领、章程只有按照纲领、章程严格吸收的党员选举的代表才能够修改。这样就使党的马列主义纲领具有了“确定性”和“继承性”，而严密的党的组织模式，又使这一纲领能够在全党贯彻。列宁主义的“灌输论”又通过党对工人运动的“灌输”，通过先锋队掌握工人运动的领导权和无产阶级革命的领导权，把这一纲领贯彻于工人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因此只有列宁主义的组织理论才可能建立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政党（至少是一个指导思想确定的政党），才可能把马克思主义贯彻于一个党、一国的工人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整个世界无产阶级革命。

以上两种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就是罗莎·卢森堡和列宁之间曾经发生的激烈争论的内容。

第二、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只局限于在党内和党的右派修正主义分子斗争，却不在组织上独立成立政党。而列宁及时地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右派——孟什维克分子彻底地分道扬镳，组建了马列主义的布尔什维克。

第三、卡尔·李卜克内西、罗莎·卢森堡为首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虽然在理论上同伯恩斯坦的和平过渡、议会斗争思想进行斗争，坚持暴力革命原则；但是在组织上却没有按照暴力革命的要求去建立党的组织，而是贯彻和改良主义一样的组织模式；也就是说他们在组织路线上和改良主义没有区别。正是这种革命的主张和改良主义的组织模式的错位搭配，决定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的必然失败。

第四、其实在十一月革命以后，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已经在实践上改正了以上第二点和第三点指出的错误。他们建立了独立的德国共产党，而这个党其实已经仿效了布尔什维克的组织模式。但是这并没有使他们免于失败，因为这一转变已经太晚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直到1917年4月才和右派彻底决裂，而且还在和“中派”一起按照旧的组织模式组成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直到1918年12月才建立了仿效布尔什维克的独立的德国共产党，而这时右派已经对他们举起了屠刀，一个月以后，也就是1919年1月，右派的临时政府镇压了柏林工人的“一月起义”，卡尔·李卜克内西、罗莎·卢森堡也被逮捕杀害。

而在俄国，“布尔什维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思潮，作为一个政党而存在，是从1903年开始的”（列宁语）。早在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上，由于组织路线上的分歧诞生了布尔什维克。在1905年，布尔什维克已经独立召开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三大”，修改了党章，贯彻了列宁主义的组织路线。1912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六大”上，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在形式上彻底决裂，成为独立的政党。因此布尔什维克按照列宁主义的组织理论从1903年到1917年为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进行了长达14年的组织准备工作，才建成了可以在二月革命后领导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的革命先锋队。可见列宁是主动地为着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做着长期的组织准备工作，而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则是在残酷的斗争驱使下，被动地和右派决裂、再和“中派”决裂，最后按照暴力革命的要求建立起严密的革命组织。

## 2、德国革命者失败的教训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俄国在 1917 年爆发二月革命、建立了工兵苏维埃并形成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布尔什维克党因势利导发动十月革命、推翻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取得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德国在 1918 年爆发了十一月革命，也建立工兵苏维埃，可德国社会民主党右派把持苏维埃、清除左派、镇压革命、颠覆无产阶级政权，最终建立了资产阶级魏玛共和国。

同样的革命形势，有的成功、有的却失败，这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其中的成败得失：

### (1) 爱森纳赫派不应放弃原则同机会主义的拉萨尔派合并

马克思、恩格斯在当时严厉批评了爱森纳赫派领导人的无原则合并，威廉·李卜克内西和奥·倍倍尔丧失政治警惕性，受了机会主义的欺骗。而且合并后也没有清除机会主义思潮，致使党内的机会主义泛滥，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党内的机会主义分子篡夺领导权带领社会民主党投靠德国政府，这不是偶然的，而是机会主义思潮长期侵蚀党组织肌体的结果。

在俄国，当布尔什维克同孟什维克展开激烈斗争的时候，第二国际在宣传方面、组织方面支持孟什维克，1905 年第二国际的执行局成立仲裁委员会来“调停”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的争执，求得“统一”。仲裁委员会提出的“调停”条件之一是，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停止争论”。这是要布尔什维克停止揭露孟什维克，取消布尔什维克对机会主义的斗争，列宁坚决拒绝了这种“仲裁”。1906 年，列宁再次拒绝了国际局的“仲裁”。由于列宁采取坚定的原则立场，抵制第二国际的粗暴干涉，布尔什维克党终于保持了自己独立的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坚决批判各种机会主义思想，形成了坚强的革命队伍。

### (2) 德国革命者没有及早地同机会主义派别彻底决裂，建立独立的组织

既然错误地合并了，而且又无法清除党内占上风的机会主义，就应该及时地决裂。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党内的右派分子已经赤裸裸地投靠德皇政府、替当局鼓吹帝国主义战争，用“保卫祖国”的口号欺骗工人为资产阶级政府卖命。党内的革命者就应彻底和机会主义分子决裂，建立独立的组织开展工作，以揭露战争的性质、争取更多群众。1917 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内“中派”同右派分裂时，斯巴达克同盟决定留在（“中派”主导的）独立的社会民主党内部，作为一个派别开展活动。这种决定对尔后的历史产生怎样的影响，积极效果和消极效果之间的权衡，也值得认真思考。

独立开展革命宣传和组织工作，开始时肯定会有各种困难，但随着战争进程不断深化的矛盾，肯定会有越来越多的群众觉醒，凝聚在革命组织周围。而且这也是党组织不断磨合、锻炼的过程，其中的工作经验、斗争经验都是宝贵的财富。在 1918 年 11 月爆发革命时，会有更大的作为，肯定要比 1918 年底—1919 年初



才正式建立组织更加从容地领导革命。

在 1903 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时，党内分裂成“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这以后“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就分别召开自己的代表大会，布尔什维克开始作为独立的组织按照列宁主义向前发展，最终成为一个有坚强战斗力的革命组织。而反观孟什维克，内部各种派别之间相互争论，最终也没有形成一个能和布尔什维克党相抗衡、哪怕是有一点战斗力的组织。

### 3、德国的“十一月革命”是怎么回事？

#### (1) 德国“十一月革命”的过程

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德意志帝国的经济陷于崩溃，国内阶级矛盾空前尖锐。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德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斗争日趋高涨。1918 年 11 月 3 日，基尔港的水兵反对同英国舰队作战，举行起义，建立全德第一个工兵代表苏维埃，揭开十一月革命的序幕。革命浪潮迅速席卷全国，柏林、汉堡、不来梅、莱比锡和慕尼黑等地工人和士兵奋起斗争，成立工兵代表苏维埃，对厂矿企业和一些政府机关行使革命权力。9 日，柏林数十万工人和士兵举行武装起义，推翻霍亨索伦家族的统治，末代皇帝威廉二世逃往荷兰。武装的工人和士兵控制整个首都，斯巴达克派领导人卡尔·李卜克内西（卡尔·李卜克内西是马克思的教子，是马克思、恩格斯的战友威廉·李卜克内西的儿子）在群众大会上宣布成立“社会主义共和国”。由于无产阶级缺乏独立的革命政党的领导，革命胜利果实落入德国社会民主党右翼领导集团手中。这个集团的领导人 F·艾伯特和 P·谢德曼组成政府——人民全权苏维埃，它没有触动旧的国家机构和军队，留任大批原来帝国的官员和将军，对内保护私有制，对外敌视苏维埃俄国，采取种种欺骗和镇压手段，竭力设法把轰轰烈烈的革命群众运动平息下去。新成立的艾伯特政府发表了“告人民书”。“告人民书”宣布给人民权利，如实行八小时工作制；享有集会、结社和新闻自由；年满 20 岁的男女有选举权；给失业者救济金，等等。但是，“告人民书”只字不提逮捕战犯、镇压一切反革命、没收战犯和垄断资本主义的企业为国家所有、没收容克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等问题，反而宣布政府保障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并作为政府的主要任务。这样，容克地主和资产阶级的统治基础依旧保存了下来。因而，艾伯特政府自称是“社会主义”的，但其实质仍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府。

1918 年 11 月 11 日，在柏林召开了斯巴达克派领导人会议，会上决定将斯巴达克派改组为“斯巴达克同盟”，它的成立客观上在创建德国革命政党的道路上向前迈进了一步。

1918 年 12 月 16 日，在柏林召开全德苏维埃代表大会。在出席的 485 名代表中，右派控制的社会民主党的代表 288 名，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代表 87 名。左派组织斯巴达克同盟当时还是独立社会民主党内的一个派别，它的代表只有 10 名。在大会上，右翼社会民主党人竭力要求恢复“和平与秩序”，主张召开立宪的国民会议，成立正式政府。“中派”对这些要求表示支持。斯巴达克同盟的代表提出“全部政权归苏维埃”和“成立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口号。

代表大会通过了两项剥夺工兵代表苏维埃自身权力的决议：（一）把工兵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行政权和立法权全部移交给艾伯特政府；（二）规定 1919 年 1 月 19 日举行国民议会选举，经选举产生的国民议会将取代工兵代表苏维埃。大会通过翌年 1 月召开国民会议的决议，宣布在此以前由艾伯特政府行使国家的全部立法和行政权力。此后，艾伯特政府加强对革命群众的镇压，独立社会民主党人退出政府。



德国十一月革命

## （2）德国“十一月革命”失败

斯巴达克同盟较早就清醒地认清了艾伯特政府的面目，进行了广泛的宣传鼓动工作，力图把革命引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轨道。但斯巴达克同盟本身却存在着很大的弱点，无法实现自己提出的正确的革命纲领。斯巴达克同盟组织小、盟员少，这时，柏林的盟员只有几百人，汉堡还不到 70 人。更重要的是尽管斯巴达克同盟在组织上已进行改组，但它仍然不是一个独立的革命政党，仅仅是作为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内的一个部分，这就妨碍了它们开展自己的革命活动。斯巴达克同盟没有在工人、士兵中单独建立基层组织，与各地的联系也不多。因此，斯巴达克同盟在工兵代表苏维埃中仍处于少数的地位。

阶级斗争的实践，使以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为首的左翼认识到在组织上同机会主义分子彻底决裂的必要性。1918 年 12 月 29 日，斯巴达克同盟在柏林召开全国会议，决定建立一个独立的党，并于 30 日至 1919 年 1 月 1 日，在柏林召开了德国共产党（斯巴达克同盟）建党代表大会。卢森堡作了关于党纲问题的报告。大会决定以她起草的《斯巴达克同盟要求什么》一文作为党纲的基础。德共的成立，标志着德国工人运动的一个重大转折，鼓舞了德国工人阶级的革命斗志。

1919 年 1 月 5 日，为抗议艾伯特政府免除左翼独立社会民主党人担任的柏

林警察总监职务，首都工人举行盛大示威。翌日，示威发展为总罢工和武装起义，参加群众达 50 万。德国共产党坚定地领导这场战斗。1 月 8 日，艾伯特等人宣布“总清算的时刻到来了”。接着，反革命大肆屠戮革命工人，一百多名起义者被杀害，许多群众受伤。11 日，政府军队在右翼社会民主党人 G·诺斯克率领下开进柏林，对工人进行血腥屠杀。15 日，德共领袖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惨遭杀害，德国革命进入低潮。2 月，政府在魏玛召开国民会议，艾伯特当选德意志共和国第一任总统。

### (3) “不来梅社会主义共和国”和“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

柏林工人一月罢工虽然失败了，但是十一月革命的火焰并没有熄灭。

早在 1918 年 12 月 24 日，不来梅工兵代表苏维埃就拒绝承认全德工兵苏维埃代表大会关于把政权交给国民会议的决议。反动政府企图解散不来梅的工兵代表苏维埃，不来梅工人发动武装起义，粉碎了反动政府的阴谋，并于 1919 年 1 月 10 日宣布成立社会主义共和国，建立了由共产党员 3 人、独立社会民主党 3 人、士兵代表 3 人组成的人民全权代表委员会。不来梅苏维埃政权建立后，实行了民主改革，提高了工人的工资，增加了失业津贴，还建立了对付资产阶级报刊的新闻检查制度。不来梅人民全权代表委员会坚决要求艾伯特、谢德曼政府辞职，并拍发电报向苏维埃俄国致敬。

艾伯特政府非常仇视不来梅苏维埃政权。在镇压了柏林工人一月罢工以后，诺斯克又命令“志愿队”进攻不来梅社会主义共和国。不来梅工人向汉堡工人告急求援，但是汉堡工兵代表苏维埃中的右派社会民主党人极力阻挠，使援救工作难以实现。恩斯特·台尔曼不顾右派社会民主党人的破坏，率领工人武装驰援不来梅。可是，领导铁路工人罢工的社会民主党人借口运送台尔曼的援军会“破坏罢工”，拒绝提供交通工具。台尔曼的工人武装只好徒步前往，未能及时赶到。2 月 3 日，诺斯克所属格斯登堡师的军队击败了不来梅的工人武装，不来梅社会主义共和国被反革命武装所颠覆。

巴伐利亚地区的工人阶级掀起了德国 11 月革命的最后一个高潮，建立了巴伐利亚共和国。1919 年 4 月 7 日，独立社会民主党宣布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成立。4 月 13 日，慕尼黑驻军发动叛乱，推翻了独立社会民主党的政府。共产党人领导广大工人举行总罢工，打败了反动军队，于 4 月 13 日晚建立了以共产党为首的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采取了一系列剥夺资产阶级的革命措施。巴伐利亚苏维埃政府把铁路、银行收归国有，对工业生产和产品分配实行工人监督，建立肃清反革命的非常委员会，并组织了红军。但是社会民主党政府对此恨之入骨，决定对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实行镇压。5 月 1 日，政府军队开进慕尼黑。经过几天的殊死搏斗，红军和革命工人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有几百名革命者被杀害，6000 多人被逮捕和监禁。5 月 2 日，反动军队占领慕尼黑。德国十一月革命结束。

十一月革命是德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是一次以无产阶级为主体的群众革命运动。由于右翼社会民主党人的反对和缺乏一个独立的革命政党的领导，革命遭

到失败。革命虽然推翻了德国的君主制度，但 1919 年成立的魏玛共和国仍然是资产阶级和容克地主的联合专政，所不同的是垄断资产阶级占了主导地位。

1920 年 3 月，发生了旨在推翻魏玛共和国、复辟帝制的政变——卡普叛乱。它是由东普鲁士地方长官、极右派头目卡普在国防军吕特维茨将军及议会外一批极右政客的支持下发动的。1920 年 3 月 10 日，吕特维茨将军向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的联合政府提出最后通牒，要求解散国民议会，改选总统。3 月 13 日，受到国防军大多数将领同情的叛乱分子的军队——埃尔哈特海军旅，未经战斗开进了柏林。艾伯特总统及政府成员逃往德累斯顿，转而逃往斯图加特。叛乱分子成立了以卡普为总理、吕特维茨任国防部长的政府，宣布全德戒严。叛乱发生后，德国无产阶级立即投入保卫共和国的斗争。3 月 15 日，总罢工席卷全德，参加的工人达 1200 万人。工人们武装起来同叛乱军队展开战斗。在德国共产党领导下，鲁尔区还成立了红色鲁尔军。大部分官吏和职员以及大批农业劳动者也参加了反卡普叛乱的斗争。叛乱分子的队伍在许多地方被击败。3 月 17 日，卡普政府垮台，卡普本人逃往瑞典，吕特维茨逃往匈牙利。当晚埃尔哈特海军旅撤出柏林。

大罢工触发了在德国共产党领导的鲁尔区工人起义，5 万人组成了红军，企图控制该区。但是正规军与自由兵团再度镇压了这次起义。1921 年 3 月，在萨克森与汉堡发生的类似事件也都被镇压下去。

在卡普叛乱中，工人运动挽救了资产阶级的魏玛共和国，因此列宁称“卡普叛乱”为“德国的科尔尼洛夫叛乱”。1917 年 9 月，俄军总司令科尔尼洛夫发动的反革命叛乱，企图推翻在当年二月革命后成立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布尔什维克党是反对科尔尼洛夫叛乱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彼得格勒的 4 万多名工人武装和 1 万多名卫戍部队的革命士兵严阵以待；几千名喀琅施塔得水兵赶到首都；各地的工人赤卫队和革命士兵控制了通往首都的交通要道。布尔什维克党还派出大批鼓动员到叛军中进行宣传解释工作。叛军推进处处受阻，内部开始瓦解。克伦斯基为首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被迫将科尔尼洛夫解职下牢。叛乱虽然宣告平息，但俄国国内阶级力量发生巨大变化，临时政府的支柱——军队陷于瓦解，广大士兵不再相信政府，转向布尔什维克一方，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武装起义形势开始成熟。但德国共产党的工人阶级革命却没有成功，这再次证明了，德国工人阶级是有力量的，但是由于德国共产党和无产阶级革命思想在德国工人中没有占据领导地位。这个力量并没有被组织到无产阶级革命的方向上去。

#### 4、德国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发展与分化过程

##### (1) 全德工人联合会以及拉萨尔

拉萨尔（Ferdinand Lassalle；1825～1864），德国早期工人运动活动家，机会主义代表人物之一，全德工人联合会创始人，联合会主席。拉萨尔对于政治经济学也缺乏深入研究，尽管马克思多次向他解释过自己的理论，并请他帮助出版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但他始终不能理解马克思在五十年代末所完成的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不懂剩余价值规律和工资规律，只是谈论“货

币是价值的符号”这类流行过多年的一些简单常识。拉萨尔的社会主义，没有达到科学社会主义的水准，显得简单、粗俗。他的斗争策略虽然强调了现实主义，但又常常是同机会主义联系在一起的，以致迷恋于“合法手段”，过分相信当时的“铁血宰相”俾斯麦，险些将工人运动引向歧途。他本人在个性上又显得轻浮、夸张，喜欢别人奉承自己，企图成为工人运动中的独裁者。这样，马克思从一开始，对拉萨尔的活动就持有批评态度。

1864年拉萨尔在为红颜的决斗中去世之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德国工人运动中的拉萨尔主义采取了更加严厉的批判态度，矛头集中在其策略上，而这种策略又被当时德国最大的工人阶级组织所接受。拉萨尔在《工人纲领》和《公开答复》中，在批判普鲁士政府的反动政策、阐明建立独立的工人阶级政党开展政治斗争的必要性的同时，宣扬所谓“铁的工资规律”的老生常谈，声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的工资只是围绕平均工资上下波动，无法摆脱贫困。怎样才能提高工人的生活水平、实现工人的解放呢？拉萨尔开出了两个药方，一是“国家帮助建立合作社”，一是“普遍的、直接的选举权”。拉萨尔的信条在他去世后的十几年间，一直被“全德工人联合会”即拉萨尔派信奉着。

拉萨尔逝世后，恩格斯在书信中写道：“若不是拉萨尔过早去世，那么必将看到拉萨尔背叛无产阶级的一天”。马克思也指出：“拉萨尔的全部社会主义在于辱骂资本家，而向落后的普鲁士容克献媚”，是一种地道的“普鲁士王国政府的社会主义”。

1863年5月，德国十一个城市的工人代表在莱比锡成立了全德工人联合会，拉萨尔窃取主席职位，他的机会主义观点被写入联合会的章程，成了这个组织的指导思想。1864年拉萨尔死后，他的继承人约·施韦泽和哈森克莱维尔等人先后领导全德工人联合会，仍然散布和执行拉萨尔主义。

拉萨尔派控制了1863年成立的全德工人联合会。后来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教育和帮助下，德国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奥古斯特·倍倍尔（1840～1913，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和创始人之一，第二国际创始人之一。晚年在战争、民族和殖民地问题上犯有“中派主义”错误）、威廉·李卜克内西（1826～1900，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第二国际创始人之一）等在联合会内开展了反拉萨尔主义的斗争。从1865年到1869年6月，威廉·李卜克内西、白拉克等人先后退出了联合会。

## **（2）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与全德工人联合会（拉萨尔派）合并为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

1869年8月，威廉·李卜克内西（1826—1900）、奥·倍倍尔（1840—1913.8）在爱森纳赫城召开代表大会，成立了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即爱森纳赫派。爱森纳赫派参照第一国际章程的原则制定了自己的党纲，宣布参加第一国际，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1875年5月22日至27日，爱森纳赫派和拉萨尔派选出的代表在哥达城召

开合并代表大会，选举了统一的党的中央领导机构，决定把党的名称改为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1890年哈雷代表大会改称德国社会民主党），对纲领草案略加文字修改就通过了，这就是机会主义的哥达纲领。

马克思、恩格斯支持两派的合并，但主张在拉萨尔派放弃自己的错误观点时才能合并。但爱森纳赫派的领导人没有听从马克思、恩格斯的劝告，1875年，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和全德工人联合会在哥达城召开代表大会，合并成立了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并于1875年2月与拉萨尔派共同起草了一个纲领草案，这个纲领具有明显的拉萨尔主义思想。当马克思和恩格斯得知他们的老朋友威廉·李卜克内西所领导的德国工人组织——爱森纳赫派在纲领草案中采用了许多拉萨尔派的提法时，便压抑不住内心的愤怒。马克思写了有名的《哥达纲领批判》，恩格斯也写了一封措词尖锐的批判信。马克思的学生和追随者威廉·李卜克内西等人在接到这些批判后，认为从当时德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在合并时做出一些妥协，保留拉萨尔派的某些对整个工人运动无害的提法还是必要的，便没有采纳马克思、恩格斯的意见，德国两大工人派别终于实现了统一。两派合并后成立了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在党的领导机构中，拉萨尔派占了多数。

### （3）德国社会民主党

马克思、恩格斯在指导欧洲各国工人运动的过程中，同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内先后出现的拉萨尔、杜林等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思潮进行过不调和的斗争。特别是恩格斯晚年，对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和“青年左派”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先后进行过认真的批判。不幸的是，恩格斯逝世后，右倾机会主义（在如何认识资本主义新时代特征问题上的修正主义，以及在帝国主义战争面前的社会沙文主义）泛滥于第二国际各国社会民主党内，包括德国社会民主党。

尽管1878—1890年德国实行《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遭到严厉的镇压。但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党不仅未削弱，反而发展壮大。期间党派结构高速发展，并拥有极高的工作效率。由于工会的支持，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总是能够在帝国议会内外扩大它们在工人中的影响。1890年，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已经占据了27.2%的席位，到1912年，提高到了34.8%，很快成为了德国最大的党派。

1890年《非常法》取消后，重新获得了合法地位。同年改名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并恢复活动。一年后，在艾尔福特通过了《艾尔福特宣言》。由卡尔·考茨基和爱德华·伯恩斯坦撰写的宣言（即党纲）拒绝了改良主义，并且向马克思主义倾斜。

可是到了1899年，伯恩斯坦写了《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的任务》一书，反对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等原则，主张阶级合作和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的社会主义，传播改良主义等修正主义思潮。在当时，无论是倍倍尔、威廉·李卜克内西、考茨基，还是卢森堡、蔡特金，都坚决批判了伯恩斯坦的观点；但都不彻底，既没有在理论上与伯恩斯坦主义划清界限，又没有给予修



正主义首要分子以纪律制裁。



高中历史图片素材：德国社会民主党中的女工积极分子

#### （4）德国社会民主党分裂为右派、“中派”（独立社会民主党）和左派（斯巴达克同盟）

20 世纪初，鉴于一触即发的紧张局势，社会党国际局在 1912 年 10 月 28 日举行紧急会议，决定召开第二国际非常代表大会。大会于 1912 年 11 月 24~25 日在瑞士巴塞尔举行，出席大会的有来自 22 个国家的 55 名代表，大会一致通过反战宣言。宣言揭露帝国主义发动大规模战争的严重危险，指出正在酝酿的战争具有帝国主义掠夺性质，阐述了社会党人对待战争的观点和策略，确定了国际无产阶级和各国社会党防止战争、保卫和平方面的具体任务。宣言号召各国无产者和社会党人利用一切手段，开展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第二国际各国党的多数领导人口头上赞成宣言，但在 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却公开背叛宣言，堕落为帝国主义战争的支持者。

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资本主义世界进入帝国主义时代，第二国际各国党内机会主义倾向日益滋长。首先是 1899 年法国独立社会党人米勒兰入阁事情带来的各国社会民主党的激烈讨论和日益分裂为两大派别。在德国，随着党的领袖倍倍尔 1913 年 8 月逝世后，党的领导权正式落入右派艾伯特等人之手，1913 年艾伯特任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德国社会民主党首领们背弃了 1912 年国际代表大会通过的《巴塞尔宣言》，公开支持本国政府进行帝国主义战争。

大战以来，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明显地分为三派。以谢德曼、艾伯特为代表的右翼公开投靠帝国主义政府，主张“保卫祖国”；以斯巴达克派（卡尔·李卜克内西、罗莎·卢森堡、蔡特金、梅林等）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左派主张同社会沙文主义者决裂，反对“保卫祖国”，认为“主要的敌人在国内”；以考茨基、哈阿兹、伯恩斯坦为代表的“中派”则在左派和右派之间进行调和，主张二者实行统一，他们主要为右派的叛变进行辩护，但有时候向左派靠拢。

1917年4月6~8日，“中派”同右派分裂，在哥达城召开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成立大会。斯巴达克派决定参加独立社会民主党，以便在党内开展争取群众的工作，同时保持斯巴达克派在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

## 【历史澄清】

### 老田：观察文革诸问题的政治眼光与行政眼光

2015-11-18 作者:老田 来自: 红色中国网

**【摘要】**文革诸问题其实是政治问题而不是行政问题。政治问题的解决，不是设计制度或者领头人进行明智选择就能够解决的，而是一个艰难困苦的创造过程：要创造新的力量、新的组织形态和认识，要根本改变人们的行为方式和内在动力，实际上就是要创造新的人。资本主义作为一种新的私有制代表封建主义旧的私有制都花了漫长时间，而社会主义是要在根本上消灭私有制并且不承认任何特权，其制度建设的难度更大，需要克服的障碍也更多。

九月初在清华的一个会议上，聆听海内外很多专家回顾讨论中国和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实践问题，强烈地感受不同的观察视野的差异。

从政治眼光出发，看问题首先要追问有哪几股力量出场以及各自有什么需要和表现，影响那几股力量进行这样或者那样表现的因子又是什么，相互之间的博弈过程如何以及形成均衡的可能性。而从行政眼光出发，就很容易追问“谁叫你这么干的？”这个事儿对还是不对？尤其是喜欢追问：不对的责任者是谁？行政眼光本身，很容易不自觉地把自己拔高到检察官和法官的坐席上，去俯视观察对象的对与错，减省各种必不可少的材料搜集和推论过程就直接进入结论。

对照毛时代的叙述模式，政治眼光意味着首先要扩大观察视野，纳入路线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内容。我在另外一篇文章中间专门谈到，分析新中国的政治史，路线斗争意味着破除当权派的中立假设，追问组织内部各级代理人的个人利益和偏好及其对于命令和信息的扭曲，而阶级斗争视野则要追问是否存在根本性背离多数人利益的特殊利益和要求，同时还要审视当权派权益扩张方向与管理职能要求相对立的官场机会主义普遍性话题。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从研究视野中间消失，实际上意味着自觉地把政治眼光从研究中间驱逐出去，官方提倡把行政眼光升级为



唯一的观察历史和政治的方式。

权力要在大范围里起作用，离不开组织和制度这两根拐杖。对于制度的看法，西方经济学界靠右边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有一个分支叫做新制度经济学，这个经济学领域中间，对于制度的主流看法是把制度看作是“博弈均衡”或者“子博弈精炼均衡”，还很重视制度的“自我执行能力”。通俗地说，在涉及到重大利益冲突的领域，一切设计的制度都不好使，需要通过利益冲突双方的长期博弈并形成共识之后，才会有制度的自我执行能力，或者说等到自愿遵循制度的人数要足够多之后，强制执行制度的成本才会降低到一个可以承受的水平，这个时候新制度才具备运作条件，一句话，没有长期的博弈过程就没有均衡和制度。诺斯就很重视推动新制度的第一行动集团和阻滞成本问题，新制度肯定会有“将来的受益者”起来推动，但也是反对力量起作用他们的行动会构成阻滞成本。这种对于制度的看法，显然是一种政治眼光而非行政眼光，而在行政眼光里，制度就是政策和设计，就是领导人的意愿和讲话。毛泽东曾经批评过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思路，但是同时又表示同情其部分合理性——作为政协委员，一个人总应该有个说话的讲台和机会，这是在否定行政眼光的同时支持政治眼光。新制度经济学的观察眼光中间，倒是保留了一点政治眼光，抛弃了狭隘的行政化眼光，关注各种活生生的社会力量的博弈过程，肯定群体力量的动态博弈对于制度形成的作用。

## 一、曼海姆如何区分政治与行政

这一次听到老余谈到，他在编辑韩先生文革回忆录书稿时，有一个感受：“在书稿中评说文革教训时，无数次归结于法律、法治问题，反省造反派没有法治观念，批评老干部还有毛泽东没有法治观念，好像大家都有了法治观念，文革就可以顺利进行，好像文革的所有问题都是源于法治观念不强。”看起来，从研究型专家到历史亲历者，都很容易忽视政治眼光同时不自觉地引入行政眼光。

韩先生的观点，是一种看问题的方式出了根本性的偏差，他评议文革的出发点或者说方法论，实际上是德国学者卡尔·曼海姆所说的“所有官僚思想的根本倾向是把一切政治问题变成行政问题。”“每一种官僚都依据他对自己立场的独特强调，倾向于把自己的经验普遍化，而忽视这样一个事实：行政领域和有条不紊地运作的秩序领域都只代表整个政治现实的一个部分。官僚思想并不否认建立政治科学的可能性，但把它与行政科学等同起来。这样，非理性的因素被忽视了，然而，当这些因素依然迫使自己处在显著位置时，它们又被当成‘国家的例行公事’来对待。”（曼海姆著黎明等译《意识形态与乌托邦》商务印书馆 2000 年，第 119-120 页）曼海姆区分政治与行政的标准是：行政是国家和社会事务中间较为稳定的部分，人们对此已经有了充分认识并且积累的处理经验，这种情况下的事务处置可以称之为行政——把管理职权授予专业官员并按照既定的规则处置社会事务。但是，人们业已掌控或者能够娴熟处理的问题，仅仅只是国家和社会事务中间的一部分，还有大量事务处在不稳定或者不确定状态之中，人们对此的认识很少，并且事务演进过程中往往还有相互冲突的力量相互作用，尚未进入尘埃落定的状态，因此，这个领域的事务不是行政手段可以处置的，而是处于政治领域之中。

曼海姆还谈到，官僚保守主义者如何看待革命，“官僚把革命看成是在一个其各方面有序的系统内的不幸事件，而不是社会赖以生存、保存和发展的基本的社会力量的活生生的表现。那种司法的、行政的心智，只能构成封闭的、静态的思想体系，它总是面临着自相矛盾的任务：不得不把产生于活动着的力量之间的非系统化的相互作用的新规则并入它的体系之中，似乎这些新规则只是原有体系的进一步详细阐述。”（同上书，第 120 页）

结合曼海姆的看法，把政治问题当作行政问题来处置，就相当于要强硬地把政治问题提前行政化，刘少奇等人的反干扰，就是这样一种处置方式：通过镇压反对意见及其力量来恢复行政化的条件。韩先生的观点是法律和法治，这是另外一个行政化的设计方向，可能意味着每一个政治的参与方都能够恰好遵循不损害他方的天定律例（肯定是天定而不是人定的），这样，政治领域就能够象行政领域一样：参与各方彬彬有礼地按照天定律例来进行。准确地说，文革诸事务是政治而不是行政，这首先是反文革阵营的各个参与方，不愿意遵循革命就像请客吃饭、绘画绣花那样进行，率先采取强制手段处置实际存在的不同政见，反干扰、抓游鱼，把对立面和批评意见用强硬手段在短期内彻底瓦解掉，这就取消了问题的政治性了。反文革阵营的作为，并不是因为没有法律和政策在先，而是因为根据法律和政策无法有效地处置对立面的意见和力量。

对于提前的行政化，硬性删去政治化内容的“反干扰”做法，1966年8月4日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有几段插话对此进行过评论：“中央自己违背了自己的命令。中央下令停课半年，专门搞文化大革命，人家起来了，又来镇压。不是没有人提过不同意见，人家提意见，就是听不进去，听另一种意见却是津津有味。什么群众路线，什么相信群众，什么马列主义，都是假的。已经是多年如此，凡碰上这类的事情，就爆发出来，明明白白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说反对新市委就是反党，新市委为什么不能反？看你站在哪个阶级方面，向哪个阶级作斗争。……讲客气一点，是方向性错误，实际上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反对无产阶级革命。为什么天天讲民主，民主来了，又那么怕？”（《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五卷）

## 二、文革诸问题的政治博弈特点

因为还没有看到北航文革的全部回忆录，所以，讨论文革是政治而非行政的话题，就从韩参与撰写的清华文革为例来展开。

据《清华蒯大富》一书记载，1966年6月份，“九日晚到十日晨，一夜之间，从前顽固的保皇先生们都突然‘哗变’纷纷起义，‘我们受骗了’的大合唱登台表演了，各系打狗队十、十一日纷纷出去，很多狗被打得落花流水，夹尾而逃。”（蒯大富大字报《工作组往哪里去？》）...华岳论坛-"<http://washeng.net>"  
在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 623 报告之后，叶林在工作组进行传达，然后工作组就取消 25 日辩论改为层层讨论，结果是“清华的师生一下就全过去了。所以当时的清华又是‘我们上当了！’”在不到一个月时间内，清华那群高素质的干部、教师和学生群体，竟然两次集体受骗上当，这是怎样一种非凡的经验和惊人的感受？

以文革初期为例，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是典型的政治事务，而资反路线之所以存在，首先是存在着这样两群人，一群是坏干部——这些人只顾自身的政治利益而不顾事实诸如叶林为首的工作组，二是群众中间马屁精式的积极分子——只顾媚上，清华文革初期两次出来说“我们上当了”的人群，就是资反路线的“群众”基础。这两群人所践行的标准——为了向上爬而敢于践踏一切规则的劲头——显然不是法律问题，老田把坏干部+假积极组成的同盟称之为政治机会主义同盟。坏干部不是不懂政策和法律，但是利益所在就导致法律靠边，马屁精也不是完全不明事理，但是为了利益可以把这个视而不见，更为可怕的是：政治机会主义同盟中间的两群人，在做坑人利己的坏事之时，还往往要假以大义——例如说我们“反干扰”是为了捍卫共产党的领导，打击反革命和右派。

以清华工作组安排的“反蒋”“反蒯”运动为例，一个月之内大批干部、党团员和积极分子，

两次出来合唱“我们受骗了”“我们上当了”，难道这么多的人真的是缺乏做出正确判断的政策知识和准确信息吗？这个关键的事实折射出：积极分子的投机性大于普通群众，党团员的投机性大于积极分子，干部的投机性大于党团员，高级干部投机性大于低级干部，这种情况的存在，肯定不是法律和法治的问题。照理说，应该是投机性较高的高端人群受到了更多的政策和法律训练，更少违背政策和法律的行为，更能够尊重别人合法权益而不是恣意侵犯并作为政治投机的手段。李雪峰所说的清华有着“一万对七百”的优势，这个占据优势方面的一万人，难道是因为法律普及方面出了问题？亦或者缺乏相关的政策和法律限制吗？政治或者法律制度要能够起作用并成为人们行动的指南，就清华的经验而言，有一个初始条件必须达到：政治投机行为不再成为追逐政治利益的主要方式，这又有一个等价命题：在日常的政治生活领域内部就需要有制约政治投机的足够力量，而不是等到事后的或者外在的力量来干预和制约。

蒯大富对于对立面的批判，其正义性就在于：要在政治生活时刻发生的日常领域，建立起批判性的制约力量，老田个人认为毛主席支持造反派以及文革的正义性，不是因为蒯大富在政策和法律水平方面超过坏干部和假积极群体，而是因为蒯大富所代表的批判性力量，虽然还很不成熟，但确实是民间成长起来的、针对了公有制社会政治异化的关键领域、且有可能最后引导出合理政治生活的建设性力量的唯一来源。

而蒯大富后来看待问题和处理对立面的方式，也抄袭了典型的行政方式。从蒯大富自身的遭遇和所见所闻来说，坏干部+假积极所组成的政治机会主义同盟，都毫无值得肯定之处，因此，得出“反托”的看法并采取相应的手段，从行政视野里去看问题，都没有大的错误。但是，就政治眼光而言，这一件事恰恰错在这个地方，反托及其后的一系列针对性措施，在很大程度上都对准了政治机会主义同盟的两群人，结果是很清楚的，把对立面塑造得无比强大、最后强大到自己的阵营根本无法应对，哪怕采取极端的武斗手段也未能摧毁对方，最后是军宣队和工宣队这种以维护最低限度秩序的“利维坦”角色出场，清华文革才最后收场的。以行政视野看待和处理政治问题，其结果就是如此。

蒯大富并没有与武汉的大学生造反派约定，采取一致认识和行动，但是，对曾经有过保守派经历的异己派别的看法，却异常相似，湖北大学的造反派学生是这么看待不同中间派别的：“保守派，他们是保守组织中的基本群众，他们和人民的矛盾是内部矛盾。但必须指出，作为他们在保守组织中所组成的势力是反动势力。他们的保守不但取决于思想上的受蒙蔽，更重要的是取决于他们的社会地位。这些人经济上与走资派保持着较为密切的联系，往往受走资派的小恩小惠，政治上往往是走资派的红人，思想上极端的奴隶主义。不过这些人是能觉悟也是可以争取的。”这些人被造反派称为小资产阶级革命派，即便这些人后来参加了造反派，但他们自己“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保守派觉悟之后从反动势力中进化而来的，他们由于一度受蒙蔽，加之本身的地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恨不起来，对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行动往往不可理解，称之曰‘过火’，武汉曾一度流行的‘同意思想兵的观点，不同意思想兵的作法’，便是这些人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真实写照。这就是红三司出现的历史必然。应该说，红三司是典型的小资产阶级势力，人们称之为‘康老三’。在斗争最关键的时刻，是不允许小资产阶级革命势力——保守派；或者向左转，靠近革命势力——即革命造反派。这就是三司革联的出现和红三司垮台的根本原因。”（杨闯《湖北大学文革亲历记》）从这个认识出发，只要是稍微偏一下，就很容易得出斯大林那个著名的观点：中间派是最危险的。

从坏的结果掉过头去看，解决这些问题就要真正做到团结大多数，这就需要走出行政视野，把政治机会主义同盟中间两群“坏人”（坏干部和马屁精式的积极分子）的“坏”先放在一边，真正做到以理服人，争取这两群人中间的大多数，然后才有可能组建强大的新政治同盟，并且在新政治同盟中间逐步地扫除旧的政治投机行为以及与投机相关的利益分配方式。说到底，团结大多数，组织新生力量去催生新生事物，这些文革中间的词汇，恰好是认识和处理政治领域事务的关键词。等到新的同盟很强大，新的认识很稳固并且得到大多数人的赞成了，这个时候，蒯大富想要进行的反托事业，才算具备了初始条件。不过这样的新同盟的成长和壮大过程，新的认识形成并得到多数人同意的教育过程，肯定需要一个极端漫长的过程，并且如果没有现实的教育，多数人的认识肯定是无法顺利转过来的。所以，毛主席说文革不是一两次三四次就能够完成的，认识的循环和政治同盟乃至新的政治规则的奠定，不可能是设计出来的——少数人设计出来之后多数人遵循就行。

### 三、在头头与群众之间：投机还是不投机

我记得 1968 年毛主席接见五大学生领袖的时候，韩曾经为缺席的蒯大富辩护，说他搞武斗也是迫不得已，这个说法很符合事实，假如本派的很多成员就是要求以极端手段伸张自身的意志，这个时候如果简单地迎头反对，肯定会被快速淘汰并失去影响力。还有另外一个选择就是站在群众的前头，加以正确的引导，让多数人逐步地形成正确的认识并自觉地疏远错误的认识，后一个选择其实就是毛泽东那个强硬的说法（把老虎打死）的合理内涵。不过，选择前一个是容易的，支持武斗并以此作为头领服务于本派群众利益的表现形式是很划算的，选择后一个是很困难的而且往往还有失败的危险还可能伤害到自身的头领地位。

西方的选举政客大多数也是这么选择的，每到美国大选年份美国的政客们都要出来代表美国人民利益反对邪恶中国或者中共，激起敌意并采取简单地攻击对方的方式来进行情绪上的满足和代表。台湾的选举战中间，政客的言行和表演及其处理与选民的关系的方式，与蒯大富在原理和逻辑上完全一致，哪怕投机不利于团结不利于稳定和发展，但是，只要有利于争取选票那就干吧，更为可怕的是，凡是不选择这么干的人，肯定会被轻易淘汰出局，因此，各种挑拨和离间的计谋，上百年来都成为选举战中间标准的发言方式，既不会后退一步，也肯定不会前进一步。政治领袖或者头领，在与支持者群众的交流互动中间，最容易选择各种低成本赢得支持的投机策略，选举政治中间的表现最为明显。这个现象老田称之为“投机互锁”——群众中间的极端主张最易得到风头主义的表现来显示，而头头在确立与群众的互动关系时最容易做的选择就以自己的投机去赞成群众中间的投机，在群众中间的投机风头主义和头头的投机跟随之间，双方都不会简单放弃，而投机的气氛会在头头和群众的互动中间得到逐步地加强。以头领减少其投机性来看，文革的进步还是明显的，造反派头领的进步及其处理与本派成员和外派关系的方式，十年期间都有着显著的进步。

政治头领选择以投机的方式来处理自己与本派成员的关系，不仅民主条件下的政客都是这么干的，这个选择其实也就是 1966 年夏天之后蒯大富的一贯选择：从 1966 年年底的反托到 1968 年夏天的武斗——都是就本派成员的现有认识水平出发进行最低限度的投机表态，而不是从长远利益和切合实际的需要出发去加以引导。进行正确引导确实要冒政治利益受损的风险，如果为了正确引导不惜克服困难甚至丧失头领地位也在所不惜，这其实就是毛泽东用各种方式强调的五不怕精神、斗私批修和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够解放自己的内涵针对性所在，进行正确的选择需要与投机收益的诱惑划清界限，为此必须要冒风险。

解除投机互锁的最低要求是头头首先要有“担当”——为了实现正确的引导不惜冒风险和承受个人利益损失。不仅仅毛泽东这么说过，岳飞也说过“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惜死”，孔夫子也说过“临财勿苟得临乱勿苟免”，一切有经验的政治人物，都知道作为权力代理人必须承担风险的重要性，随时随地要以自身的最大化利益和最小风险来进行选择的人，在任何时代都不是合格的政治人物。而清华的工作组、坏干部和马屁精式积极分子群体，恰好就是把自身的利害关系作为唯一的行动圭臬，这属于政治上“零担当”的群体。

1967 年在谢富治的亲自干预之下，蒯大富等代表团派与对立派的四派头领在签署了 524 协议，预备双方以九比四的比例，选出革委会的组成人员。结果，这个协议刚刚签署来不及实施，四派的两个签字人就在本派内部被迅速边缘化，四派中的激进头领通过“五三〇分裂”迅速确立起自身新的头领地位。签署协议的两个头领被逆向淘汰出局，其实是每一个政治场域中间都常见的现象，这意味着：那些真正负责的头领，想要通过做工作把本派成员引导到正确轨道上的人，往往有很大可能被投机分子以简单的投机手段边缘化，这种逆向选择的风险切实存在，有可能反过来鼓励那些有预见性的头领选择投机：既然结局不可能好到哪里去了，那还不如我先来投机一把算了，就算是最后必定要陷入泥坑，那最后也是我而不是别人领着大伙下泥坑。这个选择在成熟的革命家中间，也是经常有的，不是有一种说法——与其你篡党、不如我篡党吗？清华四派头头中间，利用群众

中间的风头主义的投机思想状态，对造反派头头进行逆向选择的机制，其实就是投机互锁的一种重要表现。而团派和四派群众之间的风头主义竞争言论和相互攻讦，则是投机互锁的另外一种重要动力机制。

从文革的经验看，要解决造反派批评锋芒所指的外部投机者及其所依附的投机政治规则问题，首先还必须要解决内部的投机者问题——解除投机互锁，只有解决了两个方面的问题，才有一线希望出现光明的未来。这个事儿做起来难度到底有多大，却是不好评估，至少一两代人是做不完的。

#### 四、当权派与造反派相互威胁的“策略处境”及其形成过程

文革在每个单位都分成两派，群众组织中间两派的相互对立和缺乏建设互信的管道，最后发展成为互为政治上的威胁力量。在派性政治博弈中间，美国对外战略中间的那种“单边安全”战略就格外有市场——削弱对方的力量才是建设自身安全的出路。从单边安全战略出发，对立派力量的增强就是对己方的威胁上升，为此，需要不顾一切地削弱对方：把对方说成是反革命或者没有任何合法性和正当性，就是派性论战中间的主要努力方向，在成立三结合的革委会的谈判时期，对方名额增加或者支持对方的干部进入革委会，都被视为对己方的威胁，因此，开动宣传机器妖魔化对方的头头或者干部代表，就成为一个很重要的策略。策略处境的形成，是派别竞争过程中间，增强各派别内部投机互锁的重要机制。

在文革期间形成的策略处境中间，最重要的表现是当权派和造反派的对立，我们追溯一下这个对立的来由和冲突的性质，能够看到问题的根源所在。我们以外交部为例，在1966年文革初期十五天白色恐怖期间，陈毅指导下派出15个工作组，去外事口单位和院校指挥运动，主要的方式是有当权派和多数派（后来演变为保守派）联手把很多人打成右派或者反革命，这是文革整个政治博弈的起点，当权派及其打手们一方对另一方造成致命的政治危险。陈伯达后来在中央开会时，当面批评陈毅说他支持的张彦工作组是全国最坏的工作组，陈毅表示接受批评还为此做过检讨。

1966年6月，在外交部内部姬鹏飞开会动员号召大家写大字报，结果44个青年人仅仅因为把贴出的众多大字报归纳整理出一张大字报，马屁精式的高官刘新权说这些人是想要推翻领导，陈毅和姬鹏飞等人就特别听得进这样的话，就被外交部当权派联手马屁精式的积极分子当做重点打击对象，死整几个月，这是第二个形成造反派对策略处境有着切肤之痛的体会。

1966年年底周总理明确表示支持外交部造反派成立组织，结果外交部成立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之后，很短时间就发展到1700多人（全部约2200多人），占外交部的绝大多数。此后，在周总理的捏合之下，陈毅勉强认错并于1967年1月24日做了“亮相检讨”，造反派也同意原谅陈毅的前期错误，大家预备实现三结合了，周总理同时安排在外交部的夺权试点内容是夺取运动的领导权和业务监督权为此建立部司两级监督小组（周同时在广播局指导夺权试点，同时夺取运动领导权和业务领导权）。今天回顾外交部十年文革进程，周总理亲自出面捏合陈毅为代表的当权派与造反派，双方成立革委会，这是唯一一次有可能走出策略

处境的机会。

结果，这个唯一的机会不几天就被陈毅浪费了。陈毅就反口说自己的检讨是被逼的（这是说周总理逼迫他作检讨，除周之外没有其他人做过他的说服工作），他本人没有什么错误，还破口大骂造反派说他们是野心家（2月12日）。陈毅的反悔，使得外交部的“三结合”连表面文章都维持不住了，造反派经过一段时期的酝酿于4月16日召开勤务组会议讨论，以15票赞成1票反对通过“打倒陈毅”的口号。此后，造反派砸掉了保守派的办公室，甚至逼得人数很少的保守派在外交部站不住脚，搬出外交部。

在外交部当权派和造反派的对立中间，双方逐步地共同塑造了一种相互威胁的策略环境。第一步是外交部当权派对于44人大字报的粗暴镇压过程，造反派不仅积累了不满，而且有了官老爷完全无法相信的证据；造反派成立组织并得到总理的支持，还发展为外交部的大多数，尚能够接受总理的调处，在陈毅检讨之后还表示拥护他，不料陈毅不到两周时间就变卦了；到了4月中旬造反派勤务组以绝对多数票通过“打到陈毅”口号之后，双方严重对立和互不兼容的态势业已形成。此后，再也没有能够实现矛盾缓和，更不用说和平共处了。不仅仅是蒯大富如此，就算是很多老革命家难道就高明了吗？

把当权派和造反派互为最大威胁的背景突出出来，再去回顾陈毅在处理与外交部造反派群众的关系上面的系列讲话和措施，基本上是朝着激化双方矛盾和对立方向使劲的。如果仅仅从很多陈毅的讲话内容看，确实不愧高于蒯大富，毕竟是有多年从业阅历的人士，他说的很多话也不算坏话，例如说反右运动得罪了很多人，文革的后遗症还要大；例如不要搞逐步升级，什么缺点都说成是路线错误；例如说发动群众批评干部，是我党健康的表现。这些都说的很好，问题在于：陈毅以这种教师爷的姿态说话的时候，他考虑到了听众的感受和心理了吗？说到底，外交部以陈毅为首的当权派自身已经成为造反派眼里的最大威胁力量，而且经过几轮政治博弈之后，可以信赖陈毅的证据逐步消失，要形成新的互信，陈毅必须以自身的言行去接受对立派的苛刻考察，这个时期还抱住高高在上的老爷姿态不放，在那里指手画脚，这到底是要解决矛盾还是要激化矛盾？

到了1966年之后，除了文革小组诸公之外，绝大多数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业已丧失了真正与群众进行交流和对话的能力，造反派和当权派的对立随着运动深入，步步加深，到底是当权派的责任多一点还是造反派责任多一点？从外交部造反派和当权派的博弈过程看，应该算是标准的动态博弈过程：先是当权派表演一番，造反派进行策略性的跟进；结果周总理的捏合，陈毅检讨了错误，造反派也表示谅解；结果陈毅反悔，造反派定性陈毅是不可相信的人而必须打倒。在双方的博弈中间，当权派是首先施加各种威胁对方策略的主动进攻方，造反派的策略是被动跟进性质的；在周总理进行调处的时候，造反派表示足够的和解诚意，但是陈毅没有起码的诚意。

说到底，派性的对立和冲突，起点是你是否兼容对立面的合法政治权利和利益，不兼容对立面的合法政治权益，这是所有派性政治的起点和展开逻辑。到底是当权派的派性大还是造反派的派性大？文革受到具体单位内部的派性对立能量的

驱使，蹒跚前行的过程，特别值得反思和深入追问，可以肯定的是：基于派性视野下的不兼容对立面合法权益的动力，不是所谓的法制或者民主制度能够消解的。

在外交部的当权派和造反派业已形成互不兼容的策略处境前提下，实际上只剩下两种破局方式：要么是支持造反派到底把陈毅为首的当权派彻底边缘化——这是“向左破局”，要么是放弃对造反派的支持那么陈姬乔等人就获得了自由行动的空间彻底干掉造反派——这是“向右破局”，至少看不到第三个可能性。王力和戚本禹支持外交部造反派的讲话，不存在任何错误，毛泽东和周恩来不支持他们，实际上否定的是“向左破局”选项，剩下的就是当权派主导下的“向右破局”过程。毛主席和周总理否定了向左破局选项之后，此后的外交部文革运动，就是陈毅及其贴心手下的“表演时间”了。

正是体现了陈毅等人强烈的单方面向右破局的意志和愿望，外交部 1967 年 10 月开始了“批极左、抓坏人”运动。1968 年春天外交部出现 91 人大字报，题目就是《揭露敌人战而胜之》，这个大字报虽然受到周总理的严厉批判说是“老保翻天”，但外交部老爷镇压群众的意志并不因此稍懈，1968 年夏天进驻军宣堆之后开始“清理阶级队伍”，随后就开始了军宣队、老干部和保守派练手镇压造反派的“清查五一六反革命分子运动”，这个运动成就卓著，到 1971 年外交部打出了 1600 多人的五一六分子，基本上达到了把造反派当做反革命一扫而光的目标。我们今天知道，外交部延续数年的系列抓坏人和反革命运动的成绩，就是外交部老爷们主导的文革向右破局的最终结果，是陈毅所代表的外交部老爷们展示自身政治智慧和能力的成绩单，陈毅虽然后来离开了外交部，但是他的主要副手和同路人姬鹏飞和乔冠华都始终在场参与并指导运动进程，他们在相互博弈的政治现实中间如何走出策略处境所设计的唯一选项就是这个。

从外交部的文革经验看，对于相互威胁的策略处境形成过程及其固化，陈毅为代表的当权派要负主要责任。在策略处境固化之后，只剩下一个单方面破局的选项，毛主席和周总理否定了向左破局，陈毅后来也离开了外交部，他的手下们选择了把向右破局进行到底，在短期内反文革派好像赢了，但长期后果又怎么样呢？不过，如果没有造反派方面的深入反思，外交部的老爷们就肯定要一赢到底了，而造反派的反思也一定要达到超越单方向破局的高度，否则自己的委屈就白受了。看马继森的《外交部文革纪实》一书，反思的高度不够，似乎痛感毛主席和周总理没有支持向左破局，这样的境界还不足以对镇压造反派的法西斯老爷们及其打手给出强有力的批判，真正有力的批判需要走出单方向破局的狭隘眼光，要站到比对手更高的位置上去看问题。

#### 四、经验主义和“饱和”带来的行政化眼光

韩先生信奉法治解决问题，可能有一点经验主义的根底，因为北航在文革期间迅速实现了大联合与三结合，较为快速地实现了稳定，没有出现派性的恶性膨胀。从这个基础出发，可能会轻易地看待一些难于解决的结构性问题，把那些问题看得过于简单，我不是解决了吗？你要是做到了这一点那一点，不就没有问题了吗？老田个人倾向于认为，北航能够联合起来，确实有一些好的经验，也确实突



破了一些现实存在的障碍，经验值得总结，但是，如果认定这些经验就能够解决所有地方的所有问题，那恐怕也是说大了，如果韩与蒯易地而处，也不见得就能够把清华完全领导到北航的路子上来，韩在清华能够争取到“罗文李饶”的有限度支持或者不拼命反对吗？我知道韩曾经试图要捏合四派和团派，四派人士是个什么态度，他应该有着深刻的记忆。这种事后的历史假设当然不成立，但是，从反面提出一个高难度的问题，可能有助于促进思考的全面性。

还有一点，造反派中间对于民主和法制的迷信和追捧，其实在 1974 年就出现了，广州李一哲的大字报题目不就是《关于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献给毛主席和四届人大》吗？我个人倾向于认为：这个强烈的呼唤是与当权派对造反派的累次镇压的高成本记忆联系在一起的，因为造反带来的多轮镇压，已经感到受不了了，想要设计一种没有成本或者低成本的政治参与渠道和方式。这种思路在造反派中间形成明显的政治认识分化：能够承受较高成本的人士还坚持从前的认识，对高成本早已厌恶和痛恨的人士也早就打算放弃一切去寻找新的出路了。不过在造反派群体中间，承担高成本的人士也不是多数，按照杨道远的估计：政治上很坚定的人在造反派的骨干中间看有没有百分之十？毛主席也是这么说的：左派历来是少数。

有个法国学者阿兰·巴迪欧用“忠诚”和“饱和”两个词汇来分析这种政治态度和认识的转变过程，通俗地说，所谓忠诚就是一个人愿意为他所赞同的正义事业奉献出多少无收益的投入数量（或者说：愿意承受的最高成本），而饱和就是那样一种状态：已经付出了最大投入还没有收益因此预备随时改弦更张了。显然，《关于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所表达的，就是这样一种深切的感受，因为备受“林彪体系”的多轮镇压或者迫害，个人所付出的代价早已经超过愿意接受的最高成本，因此，对于原先认定的目标以及实现目标的路径，也不再认真了，按照巴迪欧的看法：就是饱和了。因此，老田有一个看法，造反派对于政治认识的分化，是沿着自愿成本线来呈现的，杨道远看起来象是一个死不悔改的走社派（愿意接受无限成本），如鲁礼安可能就是一个愿意承担三分钱成本的走社派。

## 五、不能够低估政治问题的解决难度

前些时看到郭松民批评造反派不足的文章，该文可能是以那些低成本走社派为对象发议论的，如果简单地扩展为对全部造反派进行评论的话，那就肯定是大有偏颇了，首先指责大多数肯定就是不对的，其次，是低估了解决文革诸难题的难度和障碍，一句话，没有看到文革诸问题其实是政治问题而不是行政问题。

政治问题的解决，不是设计制度或者领头人进行明智选择就能够解决的，而是一个艰难困苦的创造过程：要创造新的力量、新的组织形态和认识，要根本改变人们的行为方式和内在动力，实际上就是要创造新的人。按照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前首相布莱尔的精神导师）的“结构化”看法，人们的行为都要受到既有社会结构的影响和制约，同时又以自己的行动来创新旧有的结构，结构和人是一种共同成长和演化的长期辩证过程。韩的看法对照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韩只承认结构的合理性，至少是漠视了人们行为的创新空间及其对结构革新的合理作用，当然，韩这个看法可能是有鉴于文革各方的投机性和派性表现来说的，但是，过分

关注消极面的结果，显然产生了终结政治并过分地回归行政眼光。

1967年2月3日和5月16日，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这个地方，毛泽东两次会见外宾时，都强调说：“解决这样的问题，只有发动群众才有办法。没有群众我们毫无办法。我们党里暴露出许多人。一部分是搞民主革命的，在民主革命阶段可以合作，打倒民族资本主义就不赞成了，要组织合作社他就不赞成了。”“我们的一些事，完全没办法，我们政府、中央、公安部毫无办法，红卫兵、群众一起来，就有办法了。几十年我们不清楚的事，红卫兵一闹就清楚了。你不借红卫兵的力量，什么法子也没有，一万年也不行。”（《毛泽东年谱》第六卷）

为什么党内或者官场内部的政治蜕化变质问题，一定要引入外部的“非专业人士”来参与，这从结构化的视野去回顾共产党政权的蜕变趋势，才能够理解毛主席曾经对外宾的抱怨：具有最高行政地位的毛泽东，反而很多事情管不了，需要红卫兵来就管住了。在旧有结构的庇护之下，新的结构向着蜕化而不是健康的方向发展，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彭真为了死保邓小平的牌友吴晗，竟然以发布中央文件的方式“要有计划地制造一场混战”。彭真死保吴晗，只是一个典型案例，毛泽东所说党阀和学阀的结合，意味着很大程度上不冲破旧的结构及其以权力和话语权相结合的维护力量，结构化的方向只能是蜕化，为了寻找可能的好的结构化方向，这才需要缺乏专业知识和必要信息的外行的干预，才能够激发结构化过程走向健康方向。

不仅如此，旧有的结构会自动地走向蜕化方向，更为严重的是，很多大权在握的老爷们根本就没有反思和问题意识，觉得一切都好。没有外部非专业人士的冲击，甚至无法给僵化的头脑输入必要的“问题意识”，所以毛泽东说：“这一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以前几个月，……虽然有那么多文章，中间，五月十六，又发了一个‘通知’，可是，并没有引起多大的注意。我看，还是大字报、红卫兵一冲，你们不注意也不行。”“这一冲，我看有好处。过去多少年我们没有想的事情，这一冲就要想一下了。”【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五日，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卷】

根据毛泽东的经验，引入非专业的群众运动，对于掌握权力和话语权的精英群体来说，一是破除其旧有结构的自我复制和退化趋势，二是给官场人士输入必要的问题意识。当然，对群众运动的“非专业性”也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这一点需要预先了解并做出必要的限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三句话是毛泽东在1945年七大上说的，针对的非专业人士参与政治过程及其批评意见，需要他们提供的政治压力帮助实现有利的结构化方向，但是，却不能够以行政眼光去较真——群众说怎么办就怎么办。

不过，对于最愿意放弃社会主义制度的那些人来说，群众参政的问题乃是一个假问题，他们有一个天然的解决方案：把管理权对群众的开放的程序重新封闭起来就完了，让工人农民成为纯粹的劳动工具。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邓小平在1975年就说过：文革的两派都错了（据《谭启龙回忆录》）。造反派对于走资派的批判，对邓小平为代表的老爷们来说自然不对，但是，保守派一贯反对造反派批判走资派为什么也错了呢？因为，“白虎堂”原本就是机密重地，泥腿子闯进来就

是一种原罪，不管你是从左边门进来的还是右边门进来的。所以，只有对那些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来说，泥腿子参政的问题才是一个真问题，必须通过实践的逐步上升去解决这个真问题。

毛泽东说阶级斗争是纲，在这个主张背后，群众或者劳动者的政治角色或者政治上的权利义务被突出出来并且具有不可剥夺性质；邓小平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建设过程的生产活动中，群众或者劳动者的劳动工具角色被绝对强调。共产党高层的不同政见主要在于：劳动者的政治角色如何看待？文革说是要“认真搞好斗批改”，而“改”字中间最重要的政治实践是“工农兵占领上层建筑”，共产党高层中间一直有人想要叫“大老粗滚回车间劳动去”，但是，最想说这个话的人们，自己也不过是些文盲和半文盲，其中有一个人特别善于搞政治，所以，他没有直接说大老粗应该滚，而是说我们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但是目的地和政策效果是一样的。1985年中组部下发文件，不再从基层的工农兵中间培养和提拔干部了，改而从大中专毕业生中间选拔，此后管理事务意味着真正与“被管理者”无关了。

毛泽东所说的走资派或者党内资产阶级，是与他在阶级斗争为纲的主张下赋予被管理者政治角色相对应的，这些在公有制社会活动的作为资产阶级，并不是具体地占用土地或者资本的地主富农资本家那样一群人，而是一股活生生的社会力量，这股力量因其在公有制社会中间的优越地位，寻求占用资本的人格化群体那样的永久性优势地位，为此，这股力量能够引导并且再造出他们需要的一切，在不改变公有制的情况下，就已经能够确立自己的优势并且制造出其他人的劣势。从基层的政治生活经验看，坏干部与假积极两相结合的政治机会主义同盟，就是公有制社会政治退化方向的主导力量。而与坏干部这一群人相互配合行动的人，就是姚文元等人在政论文章中间反复提到的“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严重的人”——通俗地说就是为了向上爬能够蔑视一切规则的人。法律或者政策，乃至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学习，对于这一群人及其合作者来说，都不过是空话。

从世界历史演进历程看，一个新的制度确立，并诞生出一大批新的社会关系的自觉承担者，把大多数民众的思想、情感和价值观都引导到新的轨道上来，不仅需要复辟和反复辟的漫长曲折，还需要认真的建设和引导，前后需要好几代人的时间。象文革那样的群众性运动，在很短时间内就近乎激发全民的政治热情，产生了大数目的深度参与者和思考者，这有可能缩短新共识的形成时间，迅速提出大多数人都愿意参与思考的真问题，这看起来有利于新制度的建设，所以，毛主席把老百姓平时在家里说闲话到争论政治问题的变化视为正面的现象。（“过去一家人碰到一块，说闲话的时候多。现在不是，到一块就是辩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重要指示》）同时，也是因为短时期内激发的深度参与者过多，真正能够起到引导作用的领导力量不足，有一定程度的盲目性或者投机性恐怕也难以避免，一句话，这是政治问题而不是行政问题。正是在这个维度上，毛泽东说对陈毅要一批二保，在728接见结束之后又返回来要官员们不要反过来去整蒯大富，实际上这意味着不管是陈毅还是蒯大富，要终结本人所在阵营的机会主义行为是超越他们能力和眼界范围的，毛主席这种态度是政治家的态度和眼光，在大多数政治主题尚未形成解决问题能力的早期，还不是追究责任的合适时候。换句话说，学徒期的问题是大多数人普

遍犯错误，解决这一问题需要进行教育和提高，而不是处分和指责。过早的指责，意味着终止学徒期，这相当于终结政治回归行政。

但即便是这样，恐怕也不能够认定，建设社会主义制度比巩固资本主义制度更容易，文革期间的文章就经常说：资本主义作为一种新的私有制代表封建主义旧的私有制都花了漫长时间，而社会主义是要在根本上消灭私有制并且不承认任何特权，其制度建设的难度更大，需要克服的障碍也更多。

二〇一五年九月二十日初稿

二〇一五年十月二十三日修订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十六日定稿

## 附：原文后部分网友跟帖评论

[林林](#) 2015-11-19 07:10

真不明白，讲的那么多，到底讲什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首先是无产阶级，所有问题都必须从无产阶级的立场，认识，方法来看。从毛主席的一贯教导，要有正确的政治方向。那么在文革中，什麼是正确的政治方向？我很奇怪，现在有人一谈文革，就是什麼武斗啊，什麼派性啦，什麼五大领袖啊，难道文革是这些吗？实质上要挑起新的群众斗群众，破坏左翼的团结，保护当前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我不明白，为什麼有人就不去看文革当中最最重要的反修斗争？从批判“和平民主新阶段”到“论共产党员修养”；批判“不论黑猫白猫能够抓老鼠就是好猫”；批判“物质刺激”，“金钱挂帅”，批判为个人奋斗的“白专道路”；批判反动学术权威“治校”，批判不为人民服务的“老爷卫生部”；批判文艺舞台上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腐朽文化等；为什麼要“批林批孔”？为什麼有一些人顽固抵制文化大革命？借着掌握的权利挑动群众斗群众，混淆斗争性质，转移斗争的大方向？

明明是党中央集体决定发动文化大革命，现在有人就推给毛主席。最早的文化大革命小组就是以彭真为首的，他搞的“二月提纲”，可是就是在传达“二月提纲”的过程中，引起一些群众的疑问，提出问题，然后他们就开始派工作组镇压这些革命群众——后来所谓的造反派，执行一条反动路线。

毛主席是在反动路线出现之后，才发布“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引导群众的斗争方向。

在文革中，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制定了许多方针政策，注意，这些政策都是集体决定的，下达中央文件，然后通过人民日报，红旗杂志通告全国，充分发动群众，引导群众，提高群众的思想认识，统一行动。由于文革的矛头指向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引起他们百倍的反抗，血腥的镇压，有什麼好奇怪的？文革作为一场无产阶级革命，影响世界不少国家。对中

国人民来讲，在这场斗争中有人牺牲生命了，有人残废了，有人颓废了，有人反动了，并不奇怪。我们作为活着的人要悼念文革中牺牲的无产阶级的勇士，关心残废的战士。。。。。，而不是继续纠缠在个人的得失之中。个人的得失和无产阶级大革命是无法相比的，不是吗？

我们再看看文革所带给人们的无穷创造力，爆发的建设热情，以及最终取得的伟大成就。今年以来，不少网友发布了文革的建设成就，难道有人装着看不见？就是一心要抹黑文革以及造反派？

我认为，造反派是一个文化大革命中的革命集体的称号，她代表了那个时代的最强音。不能看集体中个别人的行为和错误乃至严重错误。对广大参加文革的人民，是在游泳中学会游泳，不可能没有被呛水的，不被激流卷走的，不在水中挣扎的。我们要看到的是主流，而不是斤斤计较于一些支流。只有那些心怀不轨的人才会去看支流，而且想方设法变支流为主流，否定伟大的文化大革命。

看看邓一上台，急不可耐地利用夺取的权利纠结一些狗头军师用历史决议来否定文革。难道我们还不能通过他这个历史小人看清文革的伟大吗？

[龙翔五洲](#) 2015-11-19 23:54

学习林林同志鲜明的无产阶级立场，学习她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来观察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观点，正确地一针见血地道出了文革的本质和千年功绩。

[林林](#) 2015-11-20 03:18

龙翔五洲朋友，你言重了。我只不过一直观察和阅读有关网友们的不少文章。因为文革中在民间有大量引发的小册子，各种传单，那些都是指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党内当权派。我相信这些批判材料都来自各个部委，科研单位，文化教育，卫生等等许多革命群众。他们不分日夜印刷发给大家的。我就不明白，这些群众所做的许许多多，怎么没有人写出来？除了我的评论举的例子，还有不少的。比如批判“全民党”，“全民国家”，“剥削有功”，“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而且好多都以传单，册子出现的。在这里出现的是一批不为名不为利的革命造反派，难道我们能忘记他们吗？我只是希望现在还活着的原来在各部委，各个机构等等革命造反派应该说出这些文革中的斗争事迹，以教育年轻的朋友们。让他们真正知道真实的文革。像有的网友说，他以为文革造反派就是季羨林那种。说实话，我还不知道北大有这个人呢。事实是，我只知道高校五大领袖，可惜他们昙花一现，不免感到惋惜。但是，我们必须面对的是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大局——大风大浪，波浪宽阔。 ...

[yiou](#) 2015-11-20 20:22

历史一瞬

1972年尼克松访华时随行的汉学专家费正清对毛主席说：“我们原以为知识分子下放劳动后和工人农民一样生活，没想到只是让他们参加劳动体验生活而已，工资福利等方还是有权利的”毛主席哈哈大笑：“就这样我死了之后他们也要哭诉是残酷迫害，你信不？少则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大造谣。”

今天这些“参加劳动体验生活”的臭知识分子遗孀象阴沟沉渣不断泛起。他们是在恐慌在他们心头文革幽灵。

## 【理论学习】

### 《参阅文章》：看毛泽东如何对待“妄议中央”

2015-11-19 来自：《参阅文章》

原《参阅文章》编者按：如何看待“妄议中央”？境外媒体[多维网]编辑了5条毛主席语录（前5条），标题也是该网所设。编者做些补充，又增选了11条，一共16条。仅供各位学习参考。

1、国事是国家的公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因此，共产党员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利。

——《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二届一次会议的演讲》（1941年11月6日）

2、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

——《为人民服务》（1944年9月8日）

3、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些中国人民的有益的格言，正是抵抗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侵蚀我们同志的思想和我们党的肌体的唯一有效的方法。

——《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

4、不负责任，怕负责任，不许人讲话，老虎屁股摸不得，凡是采取这种态度的人，十个就有十个要失败。人家总是要讲的，你老虎屁股真是摸不得吗？偏要摸。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1962年1月30日）

5、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自己也不会垮台。不让人讲话呢？那就难免有一天要垮台。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1962年1月30日）

6、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因为任何错误都是不符合于人民利益的。

——《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96页

7、共产党员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实际，是否真有道理，绝对不应盲从，绝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



——《整顿党的作风》（1942年2月1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29页

8、大字报、座谈会和辩论会，是揭露和克服矛盾、推动人们进步的三种很好的形式。

——《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1957年7月）

9、大字报是一种极其有用的新式武器，城市、乡村、工厂、合作社、商店、机关、学校、部队、街道，总之一切有群众的地方，都可以使用。已经普遍使用起来了，应当永远使用下去。

——《介绍一个合作社》（1958年4月15日）

10、应该把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些东西传下去，形成传统。这是我们过去民主传统的一个很大的发展。这种民主，只有无产阶级，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能有，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国家是不可能有的。这种民主，不是削弱集中，而是加强集中，不是削弱无产阶级专政，而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在中共八届三次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10月9日）

11、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几千年来总是说：压迫有理，剥削有理，造反无理。自从马克思主义出来，就把这个旧案翻过来了。这是一个大功劳。这个道理是无产阶级从斗争中得来的，而马克思作了结论。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

——《在延安各界庆祝斯大林六十寿辰大会上的讲话》（1939年12月21日）摘自1966年8月26日《人民日报》

12、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我们希望一切同我们共同奋斗的人能够勇敢地负起责任，克服困难，不要怕挫折，不要怕有人议论讥笑，也不要怕向我们共产党人提批评建议。“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我们在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斗争的时候，必须有这种大无畏的精神。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3月12日）

13、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

——对《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的批注（1968年8月5日），摘自1967年1月1日《人民日报》

14、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做坏事，就要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地方要多出几个孙悟空，大闹天官。

——《毛主席同康生、张春桥、江青等谈话记录》，《毛泽东传》（1949-1976），第1407页）（1966年3月30日）

15、如果中国出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中央，“一个省可以造反，可以独立。”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1160页。

16、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

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  
——摘自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六日《人民日报》

#### 附：原文后部分网友跟帖评论

[毛丝丢顿](#) 2015-11-20 01:14

比较而知什么是民主什么是独裁，也看到了正真的伟人的胸襟。

特色的‘妄议中央’和‘不换思想就换人’是一脉相承的，而且是变本加厉的，贻笑大方和遗臭万年的

[马列托主义者](#) 2015-11-20 07:51

右派讥笑毛派，毛时代一切好的都是毛伟大英明的领导的成果，比如青蒿素，一切坏的和毛没啥关系。

如果一个国家犯罪率很高，这个国家的领导人肯定是有责任的，只不过追责不追，指出不指出。犯罪率是一个领导人领导如何的指标之一。在文革，大规模地因为妄议毛而受到迫害，如果毛一点责任没有，你继续让右派讥笑吧

[解鹰角](#) 2015-11-20 11:15

[马列托主义者](#) 发表于 2015-11-20 07:51

右派讥笑毛派，毛时代一切好的都是毛伟大英明的领导的成果，比如青蒿素，一切坏的和毛没啥关系。  
如果一个 ...

满脑子封建主义极权主义思想的人才像你这样看问题。美国总统换了一届又一届，有谁用犯罪率的变化去考核过哪个总统？过去三十年来，美国犯罪率持续下降，是不是因为总统越来越好？或者是制度越来越好？前面已经提醒过你，就是论事，毛泽东哪句话说错了，尽可以批判，别瞎扯别的。

另外，别跟我扯什么左派右派，我连自己是左派还是右派都分不清楚，但是我知道自己是毛派。

“在文革，大规模地因为妄议毛而受到迫害”，这简直是天方夜谭，文革时期何来“大规模妄议毛”？既无大规模“妄议”，何来大规模迫害？即使有你所谓的迫害，怎么就一定是毛的责任？最近毕福剑因为酒桌上“biang”毛而受处理，是不是应该由已经逝世近40年的毛来负责任？

[马列托主义者](#) 2015-11-20 15:56

[解鹰角](#) 发表于 2015-11-20 11:15

满脑子封建主义极权主义思想的人才像你这样看问题。美国总统换了一届又一届，有谁用犯罪率的变化去考核过 ...

犯罪率也好，预防恐怖也好，在什么层面来看，比如天津的那种事故，哪个层面的领导应该负责，难道只是管仓库的负责，总体性的东西当然总统负责，比如经济情况，总体犯罪率（哪怕它权重很低），总统至少有个评价体系，干得好还是坏，当然在形式民主下，一般是通过选举对总统进行一种评价的，只要总统没有违法，总统不会被定罪，权力的相关东西是责



任。

你不能把下面的好的东西归结为毛的功劳，因为毛是最高领导人，而不好的就撇开，这个逻辑是不通的

毛时代，你说没有大规模迫害妄议毛的现象，因为没有大规模的妄议毛的出现，大家不敢妄议而已。

[bapl](#) 2015-11-20 19:46

在毛时代，你不敢妄议毛主席，并不是担心毛主席会把你怎么样，而是担心你周围群众会把你怎么样，因为你发现周围众多的群众是毛主席的忠实崇拜者。最要命的是他们可没有毛泽东好的素质修养！

[yiou](#) 2015-11-20 20:40

毛时代人人关心国家大事，我根本不会想到妄议什么。请你明指“毛作为最高领导人肯定有责任，这是一，其次其制度有...”别吞吞吐吐。

“在文革，大规模地因为妄议毛而受到迫害，如果毛一点责任没有”

亲身经历过文革，工农兵包括造反派都不会妄议毛主席的，何来“大规模地因为妄议毛而受到迫害”？？？恰恰是党内外一些右派分子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被揭发。

[yiou](#) 2015-11-20 21:05

远望东方 发表于 2015-11-19 03:52

反右时，有不说话的右派，文革时一言不慎就可以打你个现行反革命。

胡说八道。文革中各基层单位都大字报满天飞，没见有谁打成反革命。倒是文革后造反派大小头头多被抓捕镇压。

[解鷹角](#) 2015-11-20 21:41

马列托主义者 发表于 2015-11-20 15:56

犯罪率也好，预防恐怖也好，在什么层面来看，比如天津的那种事故，哪个层面的领导应该负责，难道只是管仓...

天津爆炸当然不能只由管仓库的负责，但也不能因天津港爆炸追究习近平的责任吧？

行使了权力（或者职责所在却没有履行职责）并造成了**直接危害**结果，才谈得上责任问题。你对**因果关系**问题完全没有概念，如果让你当法官，必然是葫芦僧判葫芦案。你口口声声信奉马列主义，不能只懂政治经济学而不学马克思主义哲学。

[远望东方](#) 2015-11-21 05:04

yiou 发表于 2015-11-20 21:05

胡说八道。文革中各基层单位都大字报满天飞，没见有谁打成反革命。倒是文革后造反派大小头头多被抓捕镇压...

你才是胡说道，睁着眼睛说瞎话!!! 文革中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的比比皆是，算一算你们单位，学校抓了多少反革命吧，连中小学生都不能幸免！

是的，文革中的的大字报可任意“妄议”刘邓陶的“中央，但是你敢妄议林彪，江青的“中央”吗？？？

文革造反派大小头头很多在文革中就被抓捕镇压了！谁抓的？文革中大字报满天飞，除了高喊革命口号，批这批那的外，还有不少就是污陷他人的污告信。污告者就成了响当当的造反派，被污告者就成了反革命！

[yiou](#) 2015-11-21 19:18

【“但是你敢妄议林彪，江青的“中央”吗”】

我是1965年复员回家的义务兵，正赶上文革全过程。文革是斗私批修，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林彪江青是党内走资派么？！不是干嘛要妄议？！议刘邓不是妄议。

[yiou](#) 2015-11-21 19:27

【文革中大字报满天飞，除了高喊革命口号，批这批那的外，还有不少就是污陷他人的污告信。污告者就成了响当 ...】

一些联动似的造反队员背后诬告好人有之，在我所属的部门里未见有被打成反革命的，可见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yiou](#) 2015-11-21 19:29

【文革造反派大小头头很多在文革中就被抓捕镇压了！谁抓的？】

请你看看清楚是“文革后造反派大小头头多被抓捕镇压 ...”谁抓的？你说呢。

## 【时事观察】

### 革命 vs 改革家史：习正在建立“富平系”道统

2015-11-21 作者：长山 来自：作者供稿

左向前按：这是国内某著名左翼学者发给《红色中国周刊》的时政评论文章。作者视角独到，文笔犀利，其中一些观点可谓一针见血，不乏真知灼见，应该能够反映出部分左翼知识分子在政局“新常态”下的思想变化。当泛左翼内部“救党保国”的鼓吹者同所谓“推墙拆庙”的“带路党”正在开启新一轮论战的时候，不妨小憩片刻，阅读一下这位左翼时政评论家的分析。目前的论战双方无一例外都高举着反修的大旗，然而邓三科连“修正主义”的资源都已用净，习所能者只有去“修祖庙”而“立道统”了！

从多种因素考虑，我们在编发文章时将作者本名隐去，特向各位读者说明。文中黑体字内容系编者加重突出。

## 革命 vs 改革家史：习正在建立“富平系”道统

长山

后世的史学家（而不是艺术家）在给习近平画像时，只要遵守基本的事实，他的头像一定不是端正而是“斜头歪脑”的。在各种公开的报道中，“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都是扭着头。据一位心理学家说，凡是说话扭着头的，第一含义是“不服气”，还有一种含义是“不自信”。深藏的自卑和过度自信结合在一起，是心理学上的通例。

事实上，即使不用心理学家用姿态语言来解读，我们也已经能够深深地感受到“富平道统”的霸道和跋扈。政治学认为，在一个受到过灾难性影响家庭出生的孩子（文革和改革都受过冲击），心理会留下对人们的不信任以及隐藏在内心长久的不安全感，而且他很难做到宽宏大量，最终缺少执政智慧和操作艺术。

习近平执政以来，对历史问题着墨甚多。在他的出招路径里，很多的做法让人匪夷所思。例如他“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却保留着被左派视为“历史虚无主义的大本营”的《炎黄春秋》杂志。既将左派的领袖薄熙来投入监牢，又重击右派的知识分子，方法是以各种不起眼的经济罪名将他们驱逐出舆论场。激起更大舆论场波澜的是纪念胡耀邦的规格上升到几乎和陈云、邓小平等 CORE（核心）一样的高度。在 11 月 20 日习近平的对胡耀邦的纪念讲话里，充满着对胡耀邦的溢美之词，甚至连象征性的“尽管存在一些错误”的词句都惜墨如金。尽管这样会激怒左派，也不能让右派满意，但是习近平就是无所顾忌地做了。

这是薄熙来被打倒以来，中国政治的全新局面。这意味着“富平道统”正式建立并将运行剩下的 6 年，甚至将润泽更久的时间。整个中国都将为消化这个“富平道统”而付出更多的思想与政治资源。甚至可以说，中国政治，似乎回到了起始的原点。这个原点是和左派、右派无关的。在右派语境里的宪政民主，在左派语境里的大众民主，都已经被宣判为邪路或老路而成为应当封闭于坟墓中的代名词。

可以说，我在 2010 年做的一个判断是错误的。我当时根据谢韬等人在舆论上的试探，认为中国可能走上社会民主主义道路。可是我今天却发现，习近平，这个 14 亿中国人的领导人，在政治体制上试图走的是“纯洁”的西朝鲜道路。无论是权宜之计，还是长久性的体制，至少 2012-2015 年这段历史时期保持了这样的状态并有所强化。简单的来说，这个道统发源于习仲勋在照金、南梁起家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那些与习仲勋有关的人物、资源都得到了保护、提升或重新评价（例如《炎黄春秋》因习仲勋的正面题词而未被关闭、和习仲勋在革命时期共事的高岗出现重新评价的迹象、习仲勋同情的胡耀邦被置于最高领导人规格进行纪念等等）。通过习近平执政四年以来的历史路径梳理，我们会发现：凡是习仲勋喜欢、支持、同情以及一起共同战斗过的人都迎来了春天。这是一种习的革命家史道统，其本质是一种革命的血统主义，可以命名为“陕甘边道统”或“富平道统”。在这个道统下，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都将进一步边缘化。为了快速建立自己的叙事话语体系，习近平的讲话不断有新的数量，

不停有新的突破，不断有新的内容。速度之快，令人叹为观止。我们可以简要地将中国共产党内部各个派系（按照左派的语言就是“路线斗争”）在共和国历史上的执政概括为“韶山道统”（1949-1977）、“广安道统（1978-2012）”以及最新试图创建的“富平道统”。这个道统的思想较早资源是习仲勋的思想和回忆录，这个道统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看法是遵循着习仲勋一家的革命历程、际遇、心路以及他们的世界观。这个革命家族的世界观在中国革命史、中国改革史都有着清晰的表达和思想建立，核心内容是：肯定毛的延安史，因为他与习仲勋的获救有关（可以参见习近平访问延安时对毛泽东救下其父的赞扬），但是否定其文革的实践（其父在此期间受冲击，本人也下放农村）；对邓小平则是肯定其改革开放的实践（习仲勋是广东改革的前沿），但是否定其对胡耀邦等人的定位（胡耀邦的纪念大会规格前所未有的程度可见一斑，因习仲勋不赞成邓小平对胡耀邦的态度）。因此有的人说是“毛邓合”，也未尝没有道理。但是须知，这种“合”不是没有轨迹的，不是乱合，是按照习家对革命、文革和改革的理解、观点而重新建立的。凡是习仲勋能和毛泽东保持一致的，左派有其活动空间；凡是习仲勋能和邓小平保持一致的，右派有其活动空间。只有一个原则：“顺我者上，逆我者下”，不管你是理念颇为相似的薄熙来“左派”群体也罢，也不管你是腐蚀政权存在的合法性基础的周令徐苏“平民派”（他们不求信仰，只求个人私利）也罢，还是网络上吵吵闹闹的右派也罢。可以说，迄今为止，大老虎或者是左派，或者是平民派，右派身居高位的官员并没有实质性的触动，这也是由于习近平距离毛泽东的“革命历史”较远，而距离邓小平及江湖“改革现实”较近的缘故。可以根据这个线索看出，习近平的道路，将更多地遵循“肯定毛泽东的革命史，但是仅此（此是合法性以及文化领域）而已；肯定邓小平的改革史，而且据此向前”。这也是一些流亡海外的右派如焦国标看好习近平将会走向自由化的重要原因：因为习近平没有来自左派的当代资源（左派回归毛泽东时代的想法是幼稚的），而来自右派的当代资源却是汗牛充栋（美国制度和体制的榜样，甚至习近平欣赏的新加坡也是资本主义威权体制）。

因此，试图研究中国的国际学者，或者试图理解习近平执政理念的，不需要过度地猜测习近平的讲话，但是只要读读习仲勋的传记或文章即可理解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未来走向（文首的心理分析可以看出习近平不自信故而需要从父辈寻找资源）。这种走向可以比喻为一种寓言：一个男人被问起洪水到来时应该先救洪水中的母亲还是妻子。目前最好的回答是：救最近的那个。这个寓言实质上告诉我们，对于习近平来说，毛泽东时代是古代史，而邓小平时代则是近现代史，他自己才是当代史。对于当代史来说，古代史只能证明他来自哪里，但是近现代史却带给他荣耀或个人利害得失。在中国经济转型和关键时期，他能快速抓的住的，不过是距离他最近的近现代史。当然，从良策角度来看，手段上古代史更容易突破，近代史却是面临着各式各样的掣肘。因此我们常常看到古代史的突破性现象（因为它容易），但是你却不能理解那是“否定之否定”对“否定”（3.0 利用 1.0 对 2.0 进行制衡）的一种指桑骂槐的体系。他带着红二代那种自信，因而也给外界一意孤行的感受，对任何与之相反的建议和批评都置之不理。在他的带领下，短时期内看中国与右派期盼的那种法治实质上更远了（关于依法治国的全会实质上拟定了方向性的图景），权力的霸道却显得更加扎眼和显著了。左派很快也发现，他们也是这种霸道的受害者。在右派的标杆选举治理网被关停之前，左派的标杆乌有之乡原网站也永久性被关闭。与右派主张的政治权力向资本开放

不同，左派主张的权力向民众回归也不被采纳。前者由于资本家入党因而在习近平执政之前已经成为既定的事实，后者则处于襁褓中未能孵化即被扼杀（所谓重庆道路）。

习近平这样野心勃勃地建立革命家史的唯一崇高地位，面临着来自左派和右派的批评。遗憾的是，体制内的高层左派和右派（包括商场上的大资本拥有者）由于其屁股的不干净，使得他们害怕因为过去的贪腐历史被清算，因而只能对习近平的做法听之任之，无法干涉习近平的任性。左派求历史名声，右派务求实利。一些有信仰的左派无疑是清廉的。但是这也无济于事。薄熙来事件证实，即使是相对清廉的左派，也会因为“莫须有”而被涂上一层贪腐的罪名被拿下，何况是体制内形形色色的没有信仰、只求权力和利益的官员。

这是对“主义”知识分子的一次“过关大考”。在权力的威逼利诱下，大量的左派和右派都沦陷了。多数右派闭口不言或者冷嘲热讽（因为他们天生就是体制的反对者，依附体制反而有些奇怪），但奇怪的是，一些左派却仍认为“春天来了”，以为中国将回归社会主义，可是当他们看清楚形势时，就陷入一种沉思：结局是，相当多的左派分子转向极端民族主义或者国家主义，从共产党人转变为官办五毛。左派在权力面前跪拜的标志性事件是观察者网的独秀，而传统的乌有之乡则彻底边缘化了。右派的阵地有所萎缩，跳得比较高的几个都抓了，但是基本实力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损伤。观察者网是左派的国家收容所。尽管他们经常能够纠正反体制者的偏颇和狭隘，但是事实上却是代之以另外一种偏颇和狭隘。左派代表人物在习近平时代失去了往昔的那种自由度，他们被限制在对古代史（毛时代）的感情怀旧和抒发中，而不能在当代采取任何对国家有建设性的左派扭转，除非你投靠国家主义（可是国家主义的观察者网对色彩明显的左派基本上是处于封杀状态）。左派群体在当代，只面临着两种选择：被收编，或者被边缘化。当然，如果在思想源泉上，他们能够真心回归马克思或毛泽东，也许还有希望。因此，在这个迷雾重重的年代里，看到习近平根本上要右转的右派是极其聪明的，可以说是先知。而能够保持独立性的左派却是极其可贵的，可以说是圣贤。历史是一个客观的进程，不管习近平主观上有何种意愿，最终的结局都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进程：习近平的左派话语将成为表象（用左派的话语来复兴和集纳对政府的信任），甚至导致用无产阶级专政的方法导向了胡耀邦的老路。由于他的“革命家史”给予了他一个正确的来源，他的“改革家史”却给了他一个错误的发展路径——他削平的不过是冒尖右派，但是对左派却是方向性的否定。他没有别的思想资源，他在文革和改革中的经历使得他只能信任他的父亲和落难时的朋友，而这些人绝大部分都崇尚西方方向。

这也是对官僚体系的一次重大考验。事实证明，官僚体系的绝对反击方式和当年应对文革的方式保持着惊人的一致：执行之，并推之向荒谬，从而毁灭其合法性。离开左右的视角，从官僚体系来看，习近平的纠正运动是一件清扫肌体的好事，但是由于他不是依靠群众、民主（左派话语）或宪政法治（右派话语），也不可能依靠这些，因此还是依赖于旧体制。结果是产生无数爪牙和走狗，催发更多的恶奴。这些势力由于在“大发财和大贪腐”的时代心中有鬼，在当代高压态势下陷入了极其恐惧的境地，因此不断采取极端行为进行“找补”，不停折腾中下层执行者和群众，客观上制造着更大的矛盾与隐患，而这些怨言和矛盾的最

终指向，是反对这个纠正运动的发起者，动摇着“富平道统”的超稳定结构。严格来说，文革并没有结束（我指的是文革的负面资产，文革中那些丑陋的东西），面对习近平对腐败和庸官的重压，执行层挑逗群众斗群众，使得整顿异化为对群众的修理。一些举措被恐惧和害怕而推行到极端：江胡时代的规矩是政权和财产是我的，但是你有饭吃；现在政权和财产还是我的，有饭吃但是你得干更多的活而且得时刻汇报吃饭的原因以及谁吃的。从程序的繁简上来说，我们迅速倒退30年，恢复官僚主义盛行的橡皮图章时代。

这也是对习近平本人的一次重大考验。习近平一个人无法建立共和国的3.0时代。毛泽东以30年“精神导师”时间形成了属于他的时代，邓小平则以“拜物教”为核心要素使其时代延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邓三科）。因此，习近平需要与时间赛跑，时间是他雄心勃勃计划中唯一的重大障碍。这个问题的解决路径是两种，一是既定时间内做出更多的讲话，提出更多的概念；二是打破轮替制，实行韩德强所说的“终身拥戴习近平为总书记”（韩德强作为左派中一个清醒的人士，早早就看出了端倪，提出了这个主张并迅速隐遁到乡村开辟农场与世无争）。这两种方式最终都是为习近平争取更多的“单位内海量化的思想生产效率”。可是习近平的阅兵令人大跌眼镜，他对邓小平和胡耀邦的评价几乎绝对完美，显示了他的极端不自信、缺乏诚实（官方媒体中报道的他出访美国、法国、英国、德国所列的作家和著作足以开设一家小型图书馆，从时间管理的科学性来说，这是不可能完成的阅读任务）以及缺乏政治家风范。一般而言，高压和不诚实反映了内心的不安全和对人的不信任。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斯大林是不自信才在肃反中杀人。政治上的独断主义根本上体现了一种自身恐惧和虚弱。习近平时期事实上的“过度安全意识”在发挥效力，一切不同的看法和意见都被上升为安全因素加以提防。从邓小平以来，对人民残存的一点点信任也几乎全部失效。在习近平政府的管理思维，是所有人都是待审查的罪犯。在他们的眼睛里，民众都是需加以提防和监控的因素。这个模式延续自维稳模式，是和小平的消极防御与控制思维是一致的。邓小平时代，对于人口的理解是消耗性的，而不是积极能动的（毛泽东认为人多力量大，是一种积极正面的生产性思维，邓小平思考计划生育的起点是“人要吃饭因此是负担”）。2.0和3.0时代的“维稳”秩序的核心都是对“人”不做积极正面理解，也不相信人们具有生产超越消费的能力。

历史常常重演，不过正如马克思所言，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是闹剧。执政者需时刻不要忘记，我们今天处于信息时代的21世纪，任何对信息时代的蔑视和对民众已经觉醒的漠视，都将付出重大的代价。如果政治家还想象可以像过去那样糊弄民众，就已经不是一种政策失误，而是一种意志跋扈的愚蠢了（难怪说“高贵者最愚蠢”）。如果说，邓三科时代的中国模式核心是经济自由化基础上的政治“轮流专制”，那么习近平开创的3.0时代则是一种在经济自由化基础上的习氏革命家史“西朝鲜体制”。在这种前所未有的大变局面前，每个人都要思考自己的位置，以及自己能做什么。不过我相信，以知识分子非常天真的习气，过去是，现在还是无法认清我们的时代政治经济真相的。

2015年11月21日

## 李旭之：胡耀邦百年诞辰纪念满足了胡家子女们歌爹颂爹的要求

2015-11-21 作者：李旭之 来自：华岳论坛

胡耀邦诞辰一百周年的纪念座谈会，经之前的舆论纷争之后，终于在11月20日在人民大会堂举办了。从会议情况看，规格不算低，应该满足了胡家子女们歌爹颂爹的要求，只是还无从知道这次的规格与之前胡家人的哭闹是否有关系，但无论怎样，胡家人应该是可以去庆贺了。

会议对胡耀邦的评价都是十足的好评价，既是忠诚的无产阶级战士，又是伟大的革命家政治家。对于他这样一个从革命年代走过来的小辈，至今也没有见到他在革命年代里有过什么值得定为家的丰功伟绩。国人知道胡，是从邓小平主政之后，是在给人平反中出了风头而开始的，所以所谓的革命家不过就是一个空帽子而已，但给的人愿意给，毫不吝啬地给，别人也是没有办法的，起码还算有一个革命年代里的经历。至于政治家，在中国的政治环境里，只要当了两天的官员，死后溢上一个政治家的尊号，不过标明他有从政的经历，是个高高级的公务员而已，也没什么稀奇。什么家不家的，几十年来，这家那家的都快跟博士一样多了，人们是不大会在意的。

但唯独不是家的无产阶级战士，戴到他的头上，却是对无产阶级战士的玷污和对他莫大的讽刺。国人众所周知，胡下台，是因为他搞资产阶级自由化。今天看得更清楚，当年他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目的就是在中国搞全盘西化，按政治路线的说法，就是抛弃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一个领导人，一个身为共产党员的最高领导人，一个在社会主义国家领导无产阶级事业的领导人，不去走马列毛的社会主义道路，却执意改弦更张走资本主义道路，就完全不能说是无产阶级战士了，“忠诚”更是滑稽，纵然有各种遮掩，也已经不能否认他已经没有共产主义信仰了，不是共产主义的信徒了，哪里还能称得上是无产阶级战士呢？难道这不是一个莫大的黑色幽默和讽刺吗？

对他的评价，通篇都是好的，可以说已经好到天上去了，不能再好了，再好一点，就真成了天上的神仙或者上帝了。一个大家都知的下台原因，也是最为明显，也绕不过去的严重错误，居然就是看不到，不想说。

再看又是怎样纪念毛泽东的呢？不需引据，每个中国人，几乎世界人都知道，那是时刻不忘毛的所谓错误的，逢会必讲，逢人必讲，而且每个讲话中，肯定毛的部分是虚，而说毛错误的部分，那才是讲话的核心，是最重要的但书。

毛已经作古近四十年了，还在成天喋喋不休地说着他的所谓错误，不知这种仇恨从何而来，又从何而去消失，似有大讲特讲千秋万代之势。

人们看清了，凡改开时代的领导人，无一不是伟光正的，无人不是完美无瑕

的，都是神人圣人，而独有毛泽东，这位给他们开拓了江山、留下给他们做人上人的执政权柄的太庙第一祖，却必须时刻不忘去羞辱的。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第一起例子，已经写入人类的历史了。

人民群众看得太清楚了，溢美不管千字万字，人民群众心中却只写有两个字——不服，真正的共产党不服，不服标准的两立，不服对人民领袖的打压，不服对胡等人的胡拔高，不服昧着良心的评价。

这种不服，存在于人民群众的心里，它不为任何强权和霸道的条文做折服，因为，人民群众最爱戴自己的领袖，是永远信仰和追随领袖思想的。

## 高山之上兮：胡耀邦到底是谁的良心？

2015-11-18 | 作者：高山之上兮 来自：红色中国网

作者按：旧文重贴，为胡耀邦的百年诞辰，凑个热闹。

胡耀邦在其位为党为国没有做一丁点有益的事情，首先搞乱了意识形态，乱了党，接着搞乱了民族政策，乱了西藏、新疆，乱了国。身后还留下两个继续乱党乱国的孽种，一有机会就出来狂吠。中国的当务之急，应该是彻底清算胡耀邦乱党乱国的历史罪行，划清胡耀邦与共产党的界限，把胡耀邦清理出共产党。免得胡家孽种以及炎黄春秋们一有机会，就穿着胡耀邦的马甲、打着共产党的旗号招摇撞骗、乱我中华。

胡耀邦去世后，其徒子徒孙们除了顶礼膜拜、除了为其戴上一顶一顶炫目的政治花环之外，还不失时机地为胡耀邦编造了一个一个美丽的传说，其中，最最离奇、最最令人笑掉大牙的莫过于“胡耀邦是共产党的良心”之说教了，从此，“胡耀邦的良心”就成了胡家窝棚的最大政治卖点，每一位当家人莫不想盘活这笔胡氏不动产，莫不想倚重胡家二兄弟，似乎只有这样，执政者才算心安理得，执政者才算在道义上执政合法。

胡氏二兄弟俨然一副政治上的无冕之王，似乎拥有对改革开放等等话语的最终解释权，恰似姜子牙再世飘飘若仙，手里提着一根打神鞭，站在政治道义的制高点号令天下、吃香喝辣，到处半斤八两地贩卖“胡耀邦的良心”。

然而，国人恐怕殊有不知，“胡耀邦是共产党的良心”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政治谎言，它所造成的政治人文生态灾难远比漂浮于北京上空的雾霾还要严重十倍百倍。这个谎言是如此地美丽动人，美丽的让人舍不得戳穿它，在这里，仅仅借用一下两个凡是句型，让事实说话，让国人自我识别。凡是向共产党发起猖狂进攻的人，凡是向社会主义阵地冲锋陷阵的人，几乎清一色地穿着胡耀邦的马甲、摇着胡耀邦的旗帜、吆喝着胡耀邦的口令……。到此为止，胡耀邦是什么货色、是什么人的精神支柱、是什么人的良心难道还不昭然若揭吗？

附：原文后部分网友跟帖评论



林林 2015-11-21 00:10

胡耀邦如果有良心，就不会背叛毛主席，共产党。他是怎样当小红军？没有红军，我想他早夭折了。红军救了他，劳动人民养育了他。有了权力就忘本，还变成中国共产党的叛徒，背叛自己的誓言。只能说是一个卑鄙小人！有其父必有其子，如此而已。看看特色党纪念他的百年生日，用“一丘之貉”来形容，看来不过分！

## 【附】张宏良：毛主席说胡耀邦中科院讲话是“放屁”

2015-11-21 作者：张宏良 来源：民族复兴网

刚刚看了习总书记纪念胡耀邦百年诞辰的讲话，其中提到了文革期间胡耀邦在中科院的工作，不由得想起了毛主席对这个时期胡耀邦的评价。当时毛主席对这个时期胡耀邦的评价，人们记忆最深刻的就是2个字——“放屁”。

后来到主席身边工作的同志曾经专门问过毛主席：主席，听说您说过胡耀邦在中科院的讲话是放屁，是真的吗？

毛主席回答说：他就是放屁！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不是放屁是什么？科学技术是渗透到生产力各个要素之中的，是通过提高各个要素的质量来发挥作用的，并不是与生产力其他要素相并列的独立要素，并不能独立存在，所以不能与其他要素去并列排行第一第二。

由于胡耀邦邓小平他们知道毛主席这个评价，所以文革后为了否定毛泽东，专门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以这种方式对毛主席进行报复。并与此相联系，制造了人类历史上一个最大的谎言，就是“落后必然挨打”，以取代毛主席关于道路错误必然挨打的基本结论。

邓小平制造这个谣言，可以归咎为是无知，因为邓小平一生读书甚少，历史知识几乎为零。他在九十年代初南巡讲话时自己就说过，读书要读管用的，不要读厚的，他就是只读过一本小册子。邓读的这本小册子，就是红军到达延安后，专门为培训工农出身的干部而编写的“共产主义ABC”，目的在于避免工农出身的干部在国共合作过程中在理论上“露怯”，不知道社会主义为何物。因为需要速成，所以便把社会主义等重大问题，编成了文盲也能记住的儿歌形式，如社会主义生活就是“蓝蓝的天，白白的墙，油炸馒头蘸白糖”，“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等等。

邓小平的所有理论基础就来自于这本速成教材，所以邓小平的历史知识基本等于零。南巡讲话时邓小平自己就说过，中国穷了几千年了，现在该富起来了。当时他的女儿为了让大家听清楚，还专门用标准普通话高声重复了一遍。稍有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在过去几千年的时间里，至少在清代以前，中国都是世界最富的国家。根本不存在穷了几千年的问题。邓小平对历史的零知识，决定了他说“落后就要挨打”是情有可原的，是无知的结果。

而自认为好读书的胡耀邦，说“落后就要挨打”就有问题了。因为无论是世界历史还是中国历史，特别是对于中国历史而言，从来就没有过“落后挨打”的现象。当时灭亡宋朝的蒙古，比宋朝不知道要落后多少倍，其差距比印第安人与欧洲的差距小不了多少。后来打败明朝（此处汉奸小流氓会较真儿）又灭了李自成的清军，与明军的武器差距甚至超过了后来与八国联军的武器差距。当时清军完全是大刀长矛，而明军已经是火器装备，差距之大，超过了一个历史断代层。至于共产党的小米加步枪，打败了装备精良的日本鬼子，打败了国民党的飞机大炮，更是“红小鬼”出身的胡耀邦亲身经历的现实。

可见，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都不存在“落后就要挨打”的命题。自认为“好读书”的胡耀邦这样讲，显然不是无知造成的，而是阴谋，是要从根本上颠覆社会主义，颠覆中华民族的政治阴谋。因为只要“落后挨打”这个命题成立，那么历史上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这个命题就不能成立，现在坚持社会主义就没有道理，特别是为未来的卖国主义留下了理论根据。这就是编造“落后就要挨打”这个历史谎言的意义。

无论你怎么评价邓小平胡耀邦这些人，有一点都不容置疑，就是他们都是一些智商极高的人，他们编造的每一个谎言，都有着重大的特殊目的。所谓“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同样如此。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最大作用，就是否定了“劳动者是最首要的生产力”这个马克思的原有观点，用知识分子取代了工人的主人翁地位，然后“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再用官僚和老板取代知识分子，于是整个中国社会就被彻底颠覆了。这就是毛主席十分生气地骂胡耀邦是“放屁”的根本原因。

## 华岳论坛：高岗案重新审查，恢复高岗同志称谓——这是要干啥？（组图）

2015-11-18 来自：华岳论坛



高岗一家人

生前，他身上光环耀眼。他是陕北红军和革命根据创建者之一，是陕甘宁边区的连任参议长，是中共中西北局书记；解放战争时期，他奔赴黑土地，历任北满区司令员，第一野战军政委，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建国后的他是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兼中央人民政府计划委员会主席。死后，他却是“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主角，被开除党籍。



高岗同志诞辰 110 周年座谈会/任芳颖摄

（香港文汇报讯记者郑忠成、任芳颖、凯雷北京报道）10月25日是原国家副主席高岗诞辰110周年，纪念开国元勋高岗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在北京举行。座谈会上播放高岗同志纪录片中显示，高岗与刘志丹、习仲勋等在创建陕北根据地功勋卓著，在保障抗美援朝中做出重大贡献。中央此前已经启动高岗案重新审查工作，已不再提高饶反党联盟，并恢复高岗同志称谓，如今政通人和，陕甘宁边区老区人民期待高岗既往历史功绩正名的那一天。

### 创建陕北根据地、抗美援朝功勋卓著

10月25日正值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65周年纪念日，座谈会中专家、将领后代等纷纷忆述高岗在抗美援朝作战中的历史功勋。抗美援朝中，高岗挑起领导支前工作重担，完成了为志愿军提供后勤保障的艰巨任务。志愿军总司令彭德怀说：“如果真要论功行赏的话，得勋章的，前面应该是洪学智同志，后方应该是高岗同志，没有他们，我们就不可能取得这样大的胜利”。高岗之子高燕生表示，正是抗美援朝令中国立于世界之林，抗美援朝是当时在党中央毛主席高瞻远瞩的重要国策，奠定了我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基本国策，之后的几十年都说明的这一点。

### 高岗之子评价其父：任人为贤五湖四海

谈起对父亲高岗的评价，高燕生直言，拉帮结派，反党联盟都是不实之词，父亲时刻以党和人民的事业为重，以党的利益为第一位，工作从不夹杂私念，才能做



到任人唯贤，五湖四海，强调“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不搞论资排辈”。如果稍加留意，所谓“高岗反党集团”里面的骨干成员，都跟他没什么瓜葛。“‘五虎上将’中除张秀山外，其他四位跟我父亲既不是老乡，历史上也没有任何渊源，只因他们五位德才兼备。我们现在缅怀他就是要继承老一代身上这种优良品质，共同团结在习近平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做实事，尽努力。”



本报记者独家专访高岗之妻李力群、之子高燕生任芳颖摄

### 高岗案重新审理恢复同志称谓

今年九十五岁的高岗夫人李力群接受本报访问时表示，她期待在有生之年看到高岗平反。今年也是胡耀邦诞辰 100 周年，她说胡耀邦任中组部部长时，她向胡耀邦申诉，胡耀邦向她说：“高岗是党内问题，是人民内部问题，不是反党，反毛主席，犯了自由主义，不应该将毛主席个别对他讲的话又在别的老同志面前透露。她与孩子不要背包袱，孩子考大学时，总理特别给有的大学打招呼对组织部也讲了，成绩达标，优先录取。”



高岗

进入新世纪，高岗案重新审理工作启动，历时三载。时任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委托要员来到李力群家，探望老太太，谈到中央有关部门历时三年时间查看各个时期

的五百多份档案，从现在来看，高岗为党和国家还是做出了许多贡献。如果是现在再做结论，就不是那样的了，以后再不提什么“高饶反党联盟”，要称高岗同志。“高岗同志为党和国家做了大量的工作和许多重要贡献，我们看了很受教育和鼓舞。”

2013年10月15日，高岗夫人李力群及小儿子高燕生应邀出席了中央举办的纪念习仲勋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并坐于第一排显要位置。李力群说，“我写过很多材料，都交给组织了，希望中央能正视高岗的贡献与过失，给予实事求是、公正的评价。”

### 高燕生：我没有入党，但永远都是“党员”

除了李力群外，高岗的后代们都不是党员，高燕生解释道，“当时入党也比较难，有很多人从形式上入了党，但实际行动上没入党。有很多人实际行动上入了党，形式上没入党，我就是这种。”他表示，我们这种人骨子里就流着红色的血，我们跟共产党的感情是，砸断了骨头连着筋的感情。我们的前辈用自己的头颅鲜血赢得了这个江山，所以我们更关心老百姓的生活和国家的发展。高燕生深情的说，“我没有入党，但我永远都是‘党员’”。

来源：凤凰网

---

### 华岳论坛原文后部分网友跟帖评论

[2:3306] eb111(韩.谷.黑.竹) - 18:27:42 11/18/2015 这就是新的凡是：凡是毛主席做过的都要彻底翻过来。

带头标志应该是胡乱邦，马上就要胡乱邦100年蛋沉了，据说会有轰轰烈烈纪念胡的蛋沉的猴戏上演，瘟猪之流估计会拼命跳。大家准备看群魔乱舞的猴戏大戏吧。

[2:0]西方失败(华.江.青.阁)-21:43:54 11/18/2015 高是谋刘之位，被邓举报出的事。

[3:0] eb111(蜀.城.黄.石)-22:39:02 11/18/2015 所以这个事情很好玩儿，那两家人的活着呢。

[9:78]末允(辽.岗.绛.柏)-00:29:27 11/19/2015 有没有体会出那个猪头蠢衙内西瓜皮搽屁股的“历史”观？

笑。。。。。。我现在理解了那帮贼人为什么要把他举出来当“头”，智商不好掌控。

[5:260]观察员 909(巴.郡.梦.岩)-22:43:46 11/18/2015 以高岗和习仲勋的关系，这事情翻一翻也不奇怪。关键是翻到什么份上。

按说毛虽然对高的作为不满，但把高往死里整的罪责基本在刘那边。所以这事情并非毫无瑕疵。关键是翻案在当下的目的性如何。不过改开教徒都是掺私货的高手，故前景不容乐观。

至于乱邦‘蛋沉’（这真 TM 是个好词，哈哈），大家眼睛得盯紧点。谁的出格表演都给记清楚了。那是风向标。

[7:552]Omska(巴.岭.千.松)-23:28:11 11/18/2015 高大麻子除了权力野心还有一个广为人知的毛病。

那就是疯狂地玩女人，对 TG 的名声影响不小，周曾当面对高表示极端厌恶。据老干部们说，高的组织能力还是很有两下子的，抗美援朝后勤组织贡献不小，但就是变态一样不停地换着糟蹋女孩。高的资历其实不算太老，还比不了刘志丹徐海东甚至包子的大大和程子华，虽说高是包子的大大亲密战友，翻案过头假公济私会有影响的，毕竟最老特别是比较老的革命还有不少人在世。另外饶漱石也是一个和高岗一样觉得自己有大功封官太小吃亏了的人，难道这回也要沾光翻案了？主席很讨厌这种斤斤计较个人利益小家子气的人，柳亚子也因此被暗讽过。不管怎样，这和胡乱帮的纪念活动都是猴戏，看小丑们都是谁跳得最猛夹。

[13:26]西方失败(梁.都.百.叶)-10:24:41 11/19/2015 据一些回忆录称此公到东北后好白俄妓女，因此落下的名声，而非强抢民女欺凌下属之类。当年的土共，节操还是有的。

[14:583]末允(秦.县.佳.株)-11:19:10 11/19/2015 都是借口，当年黄永胜不是也好那一口吗？要不是“永远健康”落难，屁事儿没有，顶多是给林秃子叫到小黑屋里一顿臭训，然后就继续美好的感情生活了。

陈独秀在狱里都得招个花姑娘，向忠发是在妓女被窝里被逮住的，那个妓女倒是比那个总书记有骨气得多。花帅一堆婆娘，怎么怎么啦？不还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云云？少奇同志不是在哪都没缺过女人吗？刘源当年在洛阳，睡得还少吗？这帮老流氓的“高尚革命情操”只不过都是糊弄老百姓逗你们玩儿的。就我们小时候刚回北京住的那个宿舍楼里，多少都是那些穿黄呢子军装进城后找的孩子他/她娘带着娃的？有的再见到孩子爹都只有框黑框的照片了，人家那些住进小楼儿的才是有名分的，至于那些春天里来找孩子爹要救济的农村大婶子，也不是一个俩个。

[8:112]末允(辽.岗.绛.柏)-00:23:52 11/19/2015 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这种趟雷的蠢事反映了那个傻“博士”令人着急的智商。

我是不反对如今的伪共为高岗饶恕石一案翻案的，翻了好，为自己增加敌人。刘源和那个邓瘫子一定会有种吃了屎一样的想法。

[6:1052]bluejay(楚.城.红.蝉)-23:07:47 11/18/2015 是谁整死了高岗

高岗是党内斗争的牺牲品。搞倒高岗乃刘与周联手干的。毛主席当时正在杭州起

草第一部宪法。高岗个人也是有些问题。他除了毛主席外，其他领导人他都不服。与刘争第二。周当时的位置不甚明确，政务院总理，第二或是第三。但在对高岗的问题上，刘周完全一致，必欲除之而后快。他们趁毛在外忙于起草宪法，抓住高岗的问题，无限上纲，对其进行“双归”。急得林彪不顾身体不好，坐飞机去杭州密报。毛主席没当一回事，认为党内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乃党内家常便饭。只给刘写一信由林面交，说是要以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式，坚持治病救人的原则。但刘周还是对高岗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专案组有人甚至动手打耳光。逼得高岗服大量的安眠药自杀了。高岗第一次服的剂量不够，自杀未遂。第二次大量吞服才自杀成功。可见专案组有故意让高岗自杀之意。毛主席回来后看到人死无对证，为了顾全大局，只好由着刘周办了。但是，毛主席亲自交代周，高岗夫人李力群和孩子必须妥善安排，周本来已把高岗夫人李力群和孩子遣送出京到安徽，只好又接回京，按毛的要求，任教育部一个司级干部，一说副部级。你们看高岗夫人李力群和他大儿子近年来的一些讲话，就知道他们心里很清楚，是谁整死了高岗。

时来运转，现在是西北帮掌权，这个案是要反过来。

[\[10:0\]西方失败\(梁.都.百.楼\)-04:07:56 11/19/2015](#)09年已内部平反称同志了。

## **数学：把共产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向全世界传播而不要搞什么 中华文明**

2015-11-17 作者：数学 来自：红色中国网

现在全世界有两大信仰，都具有普世性质，都超越国界。一大信仰就是基督教信仰，和由此信仰衍生的民主自由人权，主要是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通过宣传加暴力等手段向全世界推销。另一大信仰是伊斯兰教信仰，也是普世性质，超越国界，通过宣传和暴力等手段向全世界推销。

可以认为这两大信仰的人都在全世界各地发展信徒，都有席卷全世界之势。

其它的一些信仰则发展得不好。比如说佛教信仰，在全世界发展得并不好，原因在于，它缺少斗争性，但是现代社会，缺少斗争性的信仰，通常都是任人宰割，被宰割之后努力自我安慰，忍气吞声。所以发展得不好。所谓儒家信仰也是这样在，发展得不好，也是这个缺少斗争性。可以认为缺少斗争性的信仰都是不行的。而且儒家和佛教都没有暴力手段，温文而雅，所以推广得不好。好的信仰都是要通过枪杆子向全世界推销的。

对于历史上象苏联东欧那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原来的信仰是共产主义，但是通常领导人会变修，一变修之后，道理就说不通，或者说，马克思主义不灵了，不灵了怎么办？因为还要拢住手下的人啊，乱了可不好啊。所以，通常就是共产主义不灵了就搞爱国主义，意思就是劝说下面，就算是马克思主义不对吧，那你总得爱国吧？



所以后来这些领导人，通常讲话也不引用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话，不好意思，动不动就说自己看过西方人的什么什么书，很受感动。

现在世界上三大武装力量，一大是美国军队，北约军队，二大武装力量是俄罗斯军队，三大武装力量是中国军队。但是后两大武装力量，都是依靠爱国主义来支撑的。例如，普京教育手下的人，就说要爱俄罗斯。但是，这种爱国主义的东西用来对抗普世的东西，就处于守势的状态。因此另外两大具有普世性质的信仰，其实也是不断蚕食中国社会。

而我认为，如果中国能够搞出共产主义加毛泽东思想的信仰，是可以起到普世的作用的，是可以向全世界扩散的。

比如现在有人动不动就高唱爱国。其实我个人是不喜欢爱国主义的，我更喜欢具有普世性质的共产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这样的东西。例如毛泽东写的《纪念白求恩》，里面表扬的白求恩，是一个外国人，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白求恩是爱中国主义吗？根本不是，他有一个中国复兴梦吗？也是没有的。

对于中国来说，只有将爱国主义处于被共产主义信仰领导下的位置，它才是有意义的，否则都称之为狭隘爱国主义，是毛泽东思想所批判的。

尤其是，中国人口太多，因此有大量的国内人移民国外，是当然不爱国的。但是不爱国不等同于汉奸，也不一定就是敌我矛盾，但是如果信仰是爱中国，那也是不象话的，但是完全一个人可以在填写自己的信仰的栏目时声称是信仰毛泽东思想的。

而且信仰毛泽东思想，这全世界的人，无论国别种族，都是应当鼓励的。毛泽东所说的爱中国，是指的“中国应当对世界有大的贡献”，因此是贡献而不是索取，也不是事事处处按有利于中华民族的来，当然可以免费为全世界人民服务，尤其重视全世界人民的解放斗争。

否则的话，你光说爱中华，甚至是只包括海外的华人，都给人以种族主义之嫌。

而毛泽东信仰，其实在国内很长时间不提的时候，国外的许多人民仍然重视。例如，委内瑞拉的查韦斯就挑灯夜读毛泽东著作，甚至在委内瑞拉建立人民公社，这说明了查韦斯也不相信那些黑毛泽东的人的鬼话。而尼泊尔共产党公然声称自己是毛派，都已经取得夺取政权的成功。

其实在我年轻的时候，就知道全世界的共产党分为两派，后面跟括号加(马列)二字的，就是毛泽东派，毛泽东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精神领袖。

我以为，你让一个白人，或者黑人，通过学习或者被别人宣传，最后宣布“我

信仰毛泽东思想，信仰共产主义”，这是有意义的，你要把他宣传成“我热爱中华文明，我加入中华文明”，那都是很扯淡的事情，他要加入中华种族吗？不是吧？

所以，中国应当向全世界推出一个普世的东西，而不是总在那里高唱爱国或者爱中华。

其实我这个人从来不高唱爱国主义的，甚至也有可能我都会移民国外，白求恩可以作为一个外国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我为什么不能够作为一个中国人不远万里来到外国？都是可以的，无论是出于宗教的目标还是个人利益的目标，都是可以的。我不是什么爱国主义者，但是我对共产主义啊毛泽东思想啊什么的也还是感一些兴趣的。你说我这样就没有道德底线？没有就没有。我以为，爱中国的行动，只有在它有利于共产主义在全人类早日实现，才是有意义的。

文明一词不应当冠以民族名称或者国家名称，那是不利于普世的，普世的东西和种族及国家无关。

#### 附：原文后部分网友跟帖评论

[林林](#) 2015-11-18 00:39

爱国和信仰共产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并不矛盾。但是爱国要看爱怎样的国。我一直在想，钱老他们为何不愿意回到蒋家的国，可是新中国一成立，他们不顾个人安危，千方百计要回到新中国。难道能说他们不爱国吗？当然不是！就像现在的特色国，除非你的人生目标就是为钱，你可以回国试一试。只要你希望在特色搞真正的科学研究，你就得小心。首先你得考虑，凭你一个人的能力能否能做出来，因为许多科研项目要有团队精神才能做出来，没有人配合你，能否做出来？搞理论方面研究，一个人还行。搞科学实验，单凭一个人很难做到的，必须要协作。看看国内你争我夺的情景，你能争吗？光有抱负，没有条件，没有齐心协力的环境，回国也做不出来像样的研究，回国又有何用？不回国就是不爱国吗？一个提倡个人主义的自私自利的特色国，不爱也罢！ ...

至于国外的孔庙，又有几个人关注？也许台湾来的一些人会关注吧。因为我看到过台湾来的人用孔夫子做餐馆的名字。

## 王忠新：吃光毛泽东的“人口红利”十大灾难降临

2015-11-21 作者:王忠新 来自: 乌有之乡

如何繁衍人口已成中华民族“天字号”难题

吃光毛泽东的“人口红利”十大灾难降临

自改开以来，公知精英们一面痛骂毛泽东的人口政策，一面饕餮毛泽东时代的人口红利；一面严苛地推行“一孩政策”，一面极低廉的出卖劳动力。而当“一孩政策”实施了35年，也吃光了毛泽东时代的人口红利，人们才发现：十大灾

难已经降临。

### **难题之一：谁来拿枪保卫共和国？**

自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之日始，无论红军时期、抗战、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直至实施改革开放，一直都是“当兵热”，可这个景象在近年出现拐点。

**1、“独子不当兵”这个铁律已被打破。**秦朝，被称为苛政猛如虎的朝代，却立法：独子不当兵。这也成为世界通则，美国有部获五项奥斯卡大奖的电影《拯救大兵瑞恩》，就演了这样一个故事。可中国“80后”的代名词，就是独生子女，不征独子当兵，还能征独子他爹当兵？由于生育率降低，中国适合入伍的独子成倍减少，北京市适龄青年仅从2008年的56万人，就减少至2012年的30万人。

**2、千古奇观：独生子女组成作战大军。**“一刀切”实施了30多年的“一孩”政策，造成现在中国军队中独生子女率已不低于70%，中国成了世界独一无二由独子组成的军队，也是千古绝无的由独子组成的军队。而打仗就要流血牺牲，“二战”中苏联军民死了2500万人，中国军民死了5000万人！死不起，怎么赢得起？死不起，谁来保卫南海？谁来保卫共和国？！

**3、士兵发言：“我死了家里人怎么办”。**针对一士兵：“不是我怕死，我是独生子，我死了家里人怎么办？”对此，一家主流大报曾发文痛批。可唱了那么多高调，告诉了那么多如何发扬，指出了那么多该怎么做，可就没回答：他战死了，家中的六七个老人咋办？再看看那些对越自卫反击战牺牲战士的父母，看看烈士和领袖被侮辱、诋毁，甚至烈士墓被铲的现状，这独生子女兵的提问，只能遭到批判？

对中国人民解放军，他们特别能吃苦，特别能牺牲，特别能战斗，特别值得人民的爱戴和信赖。但独生子女政策直接接触的谁来保卫共和国，不需要深刻反思？

### **难题之二：天量的廉价劳力还从哪里来？**

以提供廉价劳力来支撑高速发展，这是改开的基本经济模式，可现在中国还能再提供廉价劳动力吗？《凤凰财经综合》去年底提出一个问题：中国城市即将陷入“抢人大战”，缺口的20亿人从哪来？

**1、供给廉价劳力，是改开的绝对历史前提。**发展资本主义必须有两个绝对历史条件，一是资本的存在；一是无产者的出现。资本主义的秘密：就是将无产者变为工资掩盖下，能增值的可变资本。在当代全球经济一体化，机械和原材料等都是平均价格，还是国际化的透明价格。商品要有竞争力，无疑要从劳动力价格找利润。中国能长久、不断、天量，又十分廉价的供给劳动力，这是搞改开的绝对历史条件。过去30多年中，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近30%。

**2、人口增长出现拐点，廉价劳动力风光不再。**2012年，我国劳动力资源总量首次出现绝对下降，比上年净减少345万，以后劳动力人口年减少400万左右。世界银行2014年认为：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已经接近枯竭。人口拐点到来的具体表现，就是工资迅速上升，由人力构成的这部分可变资本成本迅速上升，中国“农民工时代走向终结。中国的劳动力供应，由结构性相对短缺，走向绝对短缺。

**3、按各地发展规划需要，人口缺口20多亿。**安邦研究团队在长三角调研：不少新型城镇规划，都需10万-20万人口填满！若数千“经济-城镇-人口”同时扩张，中国就会遇到人口过少的严峻挑战。以新城区为例，到2013年底，中国城镇人口7.3亿，新区规划34亿人口，总计超40亿人。既，中国把全世界城镇人口装进去，才能实现城镇大发展！

**4、“雇工难”已成一种普遍现象。**随着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各地出现“用工荒”。造成很多外资纷纷撤离，大批企业纷纷倒闭。这种风潮不仅在东南沿海城市出现，也在全国蔓延。现在中国各地出现的“鬼城”，不就吸引不来人流？而且，“80后”出生的农民工达56%--60%。城市只有提供更好、更公平的发展机会，才能接纳新生代农民工。随着招工难，非洲、东南亚等国打工者纷纷偷渡中国，并形成劳力输入产业链。“洋打工”一两年内在中国就要达1000万，随后陆续“偷渡”进入的“黑洋打工”，将带来更大的社会问题。

人口已经是各地寻求发展的第一需要，也是最大的需要，还是最大的缺口，并是极难破解的难题，这是不争的事实。

### 难题之三：“八老一小”的养老景象不令人恐怖？

日本人富而后老，美国人富而不老，中国人却未富先老。相比到2050年，欧洲人将面临从7人养一老人，变成不足两人养一老人。而中国现在一个年轻人背后，竟要站着6-8个老人，中国不仅未富先老，还老的邪乎！

**1、一张最让人惊恐的照片。**在中国无论看到什么杀人放火的恐怖的画面，也没有这个画面恐怖：这是江苏如东县一个“光荣”遵守一胎政策的老龄化家庭，一个二十多岁的大学生，一对近五十岁的父母，一个外公，一对爷爷和奶奶，一对曾祖父和曾祖母，一家八口只有一个年轻人，即使在动物世界，这都是令人非常恐怖的种族灭绝画面？如这小伙一结婚，背后站的又将是几个老人？全世界哪个国家能见到这种断子绝孙的画面？！

**2、空巢老人境遇十分凄凉。**目前，我国老年空巢家庭率已达半数，大中城市达70%。现在对老人看病和看护的巨大压力，一个孩子根本没法承担。以致独居老人离世遭宠物狗撕咬，独身老人在家被强奸、强抢，空巢老人遭诈骗，空巢老人被活活饿成干尸，独居老人纷纷自杀(甚至结伴自杀)，一岁多的留守女童与奶奶尸体独处7天未进食生命垂危等等，都已是中国司空常见的新闻。

**3、养老难到底该怎么破解。**一个孩子没法孝敬几个老人的生死，而社会又

无法承担。2013年，北京的一些养老院的床位，已经排到了100年后，某养老院的1100个床位目前已有1万余名申请人在排队等候。目前，中国缺乏自理能力的老人，已超过3300万人，实际护理人员几百万，现在全国所有机构护理人员20万。谁来养老？这已成了“天问”！

#### **难题之四：全国愈千万的“失独”家庭咋过？**

“失独”，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一个新名词，随着这个名词的不断清晰，这份伤痛更长久地折磨共和国的神经。

**1、一胎化把“失独”提高100倍。**二胎家庭孩子夭亡的概率只万分之一，一胎化把这个比例提到1/100左右。可以说，任何“一孩”家庭，都面临失独的高风险。在这个概率下，几乎每人周围迟早会发生“失独”的悲剧，相应的心理冲击和极大的心理压力，让人们从最基本的道义层面质疑一胎化，这极大的损害政府信誉，并深刻影响社会稳定。

**2、已愈千万的“失独”家庭在哭泣。**根据《2010中国卫生统计年鉴》，15岁至30岁年龄段的死亡率为40人/10万人推算，我国每年15-30岁独生子女死亡人数至少7.6万人。以1990年、2000年和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通过计算机微观仿真预测：每年新增死亡独生子女9.5万。

作为统计学中的“失独”定义：终身曾生一孩、现无子女，今后无子女的夫妇。还有将“失独”定义：无论独生子女多大，只要有独生子女证的孩子死亡，且父母至少一方存活。中国尚无对“失独”统一定义，也未见官方的“失独”家庭统计，统计“失独”的规模，竟成了一大学术难题。有专家认为：现在中国有2千万“单独”家庭。

**3、失独家庭境遇极为悲惨。**“失独”家庭已成日益严峻的社会问题。红枫中心调研发现，大多数“失独”父母都“不怕死”，60%以上“失独”父母存在较严重心理问题：有自杀倾向达38%；感到自卑达70%。今年7月，杭州一对夫妇在独生女病故百日，双双自杀身亡，而这绝非个案。“失独者”除自身心理痛苦外，养老问题更突出，2015年5月初，来自河北、辽宁等多地上千名“失独”者，在国家卫计委门前聚集，要求政府兑现“只生一个好，国家来养老”的承诺！

#### **难题之五：人口无序流动咋能平衡区域经济发展？**

地区平衡发展，是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毛泽东时代几近成倍加大中西部投资，实施“三线”战略，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已得到根本性改变。可改革开放以来，独子政策下的无序人口流动，急剧导致城乡差别加大、区域经济严重分化。

**1、欠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大规模人口流动。**至2013年底，全国流动人口达2.45亿人，人口流动已超过18%。中西部省份跨省流出人口最多。安徽、四川、湖南、河南、贵州和江西六省占全国跨省流出人口的71.07%。安徽省2014年净流向省外半年以上人口852.9万人，占全省常住人口的14.02%。2013年河南省

外出人口占本省户籍人口超 20%。贵州省 2013 年全省外流人口达 760 万人。

**2、欠发达地区出现“人口逆差”。**由于人口流出，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南、安徽、四川等省市出现“人口逆差”。此外，东北三省还面临人口自然增速锐减，其中，辽宁省 2011 年至今都人口负增长，辽宁是全国第一个人口负增长的省份，全国唯一人口负增长的省份，全国唯一连续多年人口负增长的省份。

**3、欠发达地区老龄化问题更为突出。**通常，经济高增长地区，人口增长减慢；经济增长慢的地区，人口增长较快，但中国恰恰相反。“六普”黑龙江总和生育率 1.03，吉林 1.03，辽宁 1.0，远低于全国 1.5%，比江苏、浙江等经济更发达地区都低。由于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离开东北，出生率又极低，人口结构老龄化更快。2013 年，辽宁老年人口达 789 万人，占辽宁总人口 18.5%，而全国老年人口占比 14.9%。

#### **难题之六：打击拐卖儿童咋成极难遏制的特色犯罪？**

拐卖儿童，这是实行“一孩政策”的罪恶伴生物。而拐卖儿童达到产业化、链条化、广泛化、长期化、集团化、猖獗化的程度，与长期实行的“一孩政策”，绝对脱不了干系。

**1、年失踪儿童就达 20 多万。**自改开以来，中国有多少儿童被拐卖，准确数字不得而知。但从中国广播网 2013 年 6 月 1 日报道：中国每年失踪儿童不完全统计有 20 万人左右，找回来大概占 0.1%。光一个陕西富平县妇幼保健院拐卖婴儿事发，就有 50 多户家庭排队报案。专门为妇女服务的妇婴医院，咋成了贩卖婴儿的魔窟？仅从公安部 2011 年公布的打拐战绩可见：2011 年，全国共破获拐卖儿童案件 5320 起，解救被拐儿童 8660 人。

**2、贩卖儿童已成庞大的地下产业。**拐卖儿童这庞大的地下产业，在“对外开放”中也国际化了，形成了跨国拐卖。尤其，形成严重的区域性跨国拐卖。据联合国发展计划署估计，在柬埔寨、越南、老挝、缅甸、泰国五国和中国的云南、广西两省区，就有数十万计的妇女儿童被拐卖。

**3、猖獗的拐卖儿童相伴“一孩政策”。**毛泽东时代早已根绝的拐卖儿童，随着“一孩政策”的实行，让中国的一孩成了中国最为稀缺的资源。物以稀为贵，在“一切向钱看”的指导下，引发了拐卖儿童越燃越烈的巨大犯罪，更造成数以百万计的家庭破碎。试问：美国怎么就极罕见有拐卖儿童，全世界为何只有社会主义的中国贩卖儿童这样猖獗，这同世界各国都没有“一孩政策”，就没有一点关系？

#### **难题之七：低素质劳动大军怎么适应经济转型？**

低生育人口，却缺乏高素质教育，这使低生育的劳动力素质不高的问题凸现。而缺乏高素质的产业工人队伍，已成我国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的重大障碍。

**1、人口密度高的地区往往社会分工细。**经验证明，人口密度高的地区，往往社会分工细致，经济发展繁荣，更有利于经济转型。人口与资源环境既有冲突一面，也有和谐一面，需要在互动、动态、开放、复合的体系中具体分析，很多资源环境问题，往往产生于不可持续的粗放生产和消费方式，多样化的“人类行为”和规模性的“人口数量”，这两个概念不可相提并论。

**2、老龄化的社会最难实施经济转型。**在相同的人口规模下，一个老态龙钟的社会，在知识更新能力、创造力和向上的动力及活力上，都无法与年轻人较多的社会相提并论。长期低生育率加深老龄化，最终导致平均人口素质快速下降。人口结构中婴幼儿青少年等人口比例的快速下降，老龄化的社会，内需的消费动力最弱，进而使经济下行。海南一些城市靠卖房求发展，结果外地买房的老人来养老，坐车免费、进公园免费，除了买一点食品，消费水平极低。以致靠卖房虚假繁荣一时的城市，陷入了消费的颓废。

**3、转型缺乏高素质的产业工人队伍。**目前，超过 2.6 亿农民工已占到我国产业工人队伍的 70%左右，然而，迄今仍有 76.2%的农民工，只有高中以下文化水平，65.2%的农民工从未接受过任何技能培训。在 G20 国家中，中国的人力资本构成指数(反映一国劳动力素质)，仅是美国的 1/12，日本的 1/10。低素质产业工人队伍还容易导致产品质量不高、资源浪费严重等问题。

#### **难题之八：社会和谐发展遇到很多死结咋解？**

社会生产，包括人口再生产;社会发展，却不仅是经济发展。长期的“一孩政策”，已给社会发展带来很多“死结”。

**1、独生子女体质普遍下降。**“一孩政策”让中国学生的身体素质下降。北京体育大学校长杨桦在 2012 年的全国政协提案中提到，1985 至 2010 年，小学生肺活量下降了 11.4%，大学生下降了近 10%。小学生 400 米跑，初中、高中、大学女生 800 米跑和男生 1000 米跑,成绩分别下降 8.2%、10.3%和 10.9%。中小学男生引体向上成绩降幅达 40.4%。

**2、优良的传统文化正在烂根。**“孝”是中国文化的根本，家庭养老儿孙绕膝的天伦之乐，那是中国文化的得意。而长期的“一孩政策”很难去尽孝，造成大量空巢老人，造成中国的养老模式发生根本性变化，造成中国的养老观念变化。有个小故事：一个孩子妈妈送孩子上幼儿园，嘱咐孩子好好学习。孩子说：我一定好好学习，将来挣大钱，把妈妈送到最好的养老院。孩子笑得很灿烂，妈妈却已泪流满面。村庄，更是中国文化的土壤，是中国文化的“地气”。可由于人口的短缺，大量的村庄在消失。随着“一孩政策”带来一个个深刻的变化，造成中国的传统文化已经烂根。

**3、学校等公共资源浪费巨大。**从 2000 年到 2010 年的 10 年间，全国 6—14 岁义务教育阶段学龄人口，从 2.05 亿减少到 1.58 亿，全国农村小学则从 55 万所减少到 26 万所。城市学校数量也锐减。如，从 2000 年到 2012 年，北京常住人



口从 1382 万增长到 2069 万，但小学却从 2169 所降至 1081 所，专任教师数量从 6.2 万降至 4.7 万。全国小学招生人数从 1997 年的 2500 万，减至 2014 年的 1658 万，初中招生人数从最高峰时年招生 2263 万人，降至 1448 万人。

**4、婚恋的性别比例严重失掉。**伴随人口减少的，还有光棍大潮的出现：据 2010 年人口普查资料显示，仅从 1991 年到 2010 年这 20 年期间，累积新生男性比女性多 5565 万。现每年新生男性仍比女性多 130 万左右，这意味着未来中国将产生 6000 万左右的光棍大军。如何破解带来的严峻婚姻竞争！浙江财经学院教授谢作诗给出答案称：低收入男人可几个人合找一个老婆；还应允许同志合法结婚。或者说，富人非法攫取的财富可以私有，穷人的老婆可以共用！

至于因独生子女的社会性格缺欠，造成的各种犯罪，更是千奇百怪等等。而所有的这些社会性问题，都是影响社会和谐发展的一个又一个很难解开的死结。

#### **难题之九：经济全面出现大幅下滑咋破解？**

过去 30 多年中，人口红利对发达地区增长贡献率在 40% 以上。而长期实施的“一孩”政策，已造成新生劳动力供给的严重不足，这必然拖累中国的经济出现全面下滑。

**1、食之者众，生之者寡。**随着寿命延长，“421”家庭，将变成“8421”家庭，全家十五口人只有三个人在工作；“222”家庭变成“2222”家庭，全家八口人有四个人在工作。假如这时候人均劳动者创造 GDP 是 3 万美元，则“8421”家庭的人均 GDP 是 6000 美元，“2222”家庭人均 GDP 是 15000 美元，后者是前者的 2.5 倍！最终结果是，少生孩子更穷！

**2、人口下滑“巧合”经济滑坡。**随着 2012 年我国劳动力资源总量首次出现绝对下降，中国 GDP 增幅也持续下降，2015 年前三季度，均为 6.9%。这是 2009 年 6 月以来中国经济增速首次跌破 7%。随着东北的人口净流出达到拐点，东三省的经济增长率，也逐年下降到 2014 年的全国倒数。辽宁 2011 年人口出现负增长 -0.34%，2013 年更扩大为 -0.5%，辽宁的经济增速，也同时连续四年下滑，2014 年下半年甚至负增长，2015 年更连续三个季度全国垫底。

**3、人口下滑大幅降低未来的财富。**日本、欧洲都是在 20~64 岁人口，达到止涨回跌的拐点前夕，出现的经济危机。只生一个孩子，不仅降低现在的经济增速，还大幅降低未来的财富。随着，中国劳动人口以每年千万级别以上的速度减少，房地产、汽车、家电、钢铁、水泥等产业将面临雪崩、不动产价值将大跳水！中国将成全球最大“工业废墟”和“建筑废墟”。

#### **难题之十：“再生难”挑战种族延续该咋办？**

习总书记为首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高度重视人口问题，不追求畸形的经济发展，断然结束了“一孩政策”，这绝对是民族有幸，国家有幸，百姓有幸。可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现在中国面临一个比“天字号难题”还难的，就是“再生难”！

**1、普遍缺乏生育意愿。**国家卫计委预计,单独二孩政策放开,将出现“婴儿潮”,年新增人口 200 万。辽宁省卫计委甚至大力简化审批手续:对准生证时限放宽,生完孩子也可办证,不带婚育证明也办。但从沈阳市看,不想再生育的近 50%。到 2015 年 1 月 12 日,全国虽有 1100 多万对夫妇符合条件,可政策新增出生儿仅 66 万,全国出生人口仅比上年增加 47 万。

**2、新生育文化影响生育率提高。**看生育意愿,80 后比 70 后低,90 后比 80 后低,00 后比 90 后低。新生代人口已形成新的生育文化,甚至丁克文化。如果说,当年计划生育是“天字号难题”,那现在让妇女多生孩子,比“天字号难题”还难。你再灌输传宗接代的观念,她们死活也不接受啦!加之,中国大面积出现的“剩女”,不愿未婚产子,则不会出现西方高比例的“单亲妈妈”,这造成中国的生育率更低。

**3、生养不起是主要原因。**毛泽东时代那么“困难”,那家都能养起四五个孩子,现在符合生育条件的,却犹豫纠结生不起二胎。一对夫妇平均一年要在孩子身上花 2.25 万元,直到孩子年满 18 岁。在孩子人生中的头五年,城市父母的花费比农村父母高一倍。而实际现在的独生子女何止抚养到 18 岁,几乎一直都在“啃老”。低工资让独生子女有几个靠自己挣钱能买房娶媳妇的?这生孩子成本过高,怎不让人望而生畏。当年,像抓小鸡一样,将妇女送医院绝育。现在让妇女怀孕,还能像抓猪那样去配种?

**4、“一孩”造成的伤害比长期战争都大。**在中国历史上,将人口灭杀过半就达十几次。但那种传宗接代的生育观念,让中华民族具极强的再生力、繁殖力、涅槃力。甚至战争让人口只剩百分之一,都能迅速繁衍起来,这就是民族的伟力!但“一孩政策”,所造成的生育人口下降,生育观念改变,生育成本的剧增,却让中华民族的人口极难恢复平衡,它对民族延续所造成的伤害,比长期战争的破坏都大。

最近,奥巴马针对美俄之间的较量指出,俄“总人口数量在不断萎缩,很难成为国际舞台上的主角。”在此,奥巴马表明了人口数量是大国较量一个制胜因素,这也印证了美国在中国计划生育过程中缘何人口暴涨。而中国丧失了人口优势,也将丧失大国地位,这绝不是危言耸听!

#### 附: 原文后部分网友跟帖评论

[林林](#) 2015-11-22 02:59

特色党的短视自食其果! 他们处处和毛主席作对, 最后只能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天意!

现在有一些人生不起因为养不起, 网上就有人说过, 既然养不起, 何必生呢?

看看那些有钱人, 那一个只有一个孩子呢? 当然不少恐怕是私生子。最近不是有一个阿爸的私生女的官司吗? 只不过有钱人的子女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 长大是要骑在别人头上的, 怎能当劳动力使用?

## 香港《争鸣》：李克强经常发脾气、摔杯子、拍桌子（图）

2015-11-20 | 来自：香港《争鸣》

此前有传，面对整体经济下滑，以及中共体制内官僚各自为政相互推诿的现状，中国总理李克强多次在内部会议上发火拍桌。近日，又有媒体披露，李克强在高层金融会议上面对众官僚一味争论难以落实的场面，再次发怒拍桌，直斥：“你们心目中还有总理？”

据香港《争鸣》报道，李克强曾经在近一个月的国务院金融专题会上听取有关报告，但相关汇报涉及到数字与时间等总是模糊不清，令李克强多次中断会议追问，并警告，这种毛病需要改一改，“不改要坏大事。”

报道进一步介绍，当李克强看到各部委争论不休，有关部门不停相互扯皮，导致决议、决策迟迟不能落实推行，实在按捺不住怒火，拿起资料频频拍桌，称：“你们心目中还有总理？各自为政，搞多中心，你们究竟想搞什么？”他还警告，如果想搞自己那一套，感到“大材小用”，“请打辞职报告，我不会挽留一天。”



此前，媒体有过多次报道李克强因不满官场弊端而发火拍桌的记录。

今年6月，另有港媒引述中共《内参》的报道称：“李克强在召开部委办会议时拍桌子怒斥‘庸政、懒政、散政、混政要感到耻辱、罪过’。”据报道，在会议上，当李克强追问地方负责人有关经济方面的多组数字时，回答问题的地方官员一边吞吞吐吐，一边还忙着翻本子。当时李克强就把杯子摔了，并斥责不嫌脸红。

今年4月，李克强在中共中央政治局4月召开的第11次会议上，通报对数十省市中共部级党政一把手“六问六不知”考核结果，当场大发雷霆，称官场“懒散庸疲，积重难返。”

更早时期，今年 2 月，海外中文媒体刊发署名评论文章称，问题重重的国企，早已形成了自己的种种势力范围，要触动这一群体的利益“比触动灵魂还难”，面对若干国企高层订立攻守同盟游说阻挠的局面，李克强曾为上海自贸区计划受阻而怒拍桌子。

陆媒的报道称，在上海建立自由贸易区的问题上，李克强之前表示计划向外国投资者开放上海金融服务业，并提出允许外国商品交易所建立期货仓库的建议，随即招致中国银监会和中国证监会公开反对。报道引述了解政府高层会议一手内幕的三位消息人士透露，在一次国务院闭门会议上，李克强得知其计划一直遭到反对时曾拍桌子发火。

#### 附：原文后部分网友跟帖评论

[林林](#) 2015-11-21 00:48

李克强发脾气也好，摔杯子也好，拍桌子也好，都无济于事了。为了私有化，利用反腐打击许多真正干实活的人，留下拍马屁混日子的，当然没有什麼人愿意干活了。就拿薄熙来，到哪里都拿得起来，干得漂亮，大连也好，商业部也好，重庆也好，老百姓支持他。再拿周永康，从石油学院毕业后，就一步一步实实在在干出来的，他的手下人不少来自草根，也是实实在在搞建设。然后打倒周永康，“拔萝卜带出泥”，打击一大片。本来从外面消息还要搞李鹏，目的是要私有电力系统。。。。。。拭目与待。为了他们的私有化，可说不择手段。做官的没有不腐败，因为特色制造了腐败的土壤。可是他们为何就打倒这些干部？看看他们推崇的两个胡子，他们能实干吗？看看贰柒姨的子女能干实活吗？金融能强国吗？自贸区能救国吗？一个没有自己真正实业的国家能立足世界吗？真正更大，更隐蔽的腐败家族，他们不但不去反，反而层层加于保护，不是吗？

总之，中国的人民不是阿斗，真是民间的俗语“人民心中有杆秤”。把人民当阿斗的特色党不会走得太远的，覆灭的日子将一天一天逼近。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干部队伍也不会例外！在此怀念毛主席的干部政策！ ...

## 多维：传新疆反恐“灭” 17 人妇孺匿山洞被炸死（图）

2015-11-19 来自：多维

中国公安部官方微博 11 月 14 日高调公开新疆反恐的最新消息，指当地特警经过 56 日追击，成功击杀一批恐怖分子。但公安部并未公布有关详情，随后更在微博删除相关图文。有传言称，当日特警的“总攻击”共打死了 17 人，当中包括妇女和儿童，死者被指涉及今年 9 月中旬的阿克苏煤矿袭击案。

综合媒体 11 月 19 日报道，警方指控被击杀的 17 人为分离主义者，与发生于今年 9 月 18 日在新疆阿克苏地区、导致至少 50 人死亡的煤矿袭击有关。据称，警方当日炸毁了疑犯藏匿的一个山洞，里面的人全部被炸死，而警方则无人伤亡。

而消息人士则透露，这其中妇女和儿童不是暴徒，而是被劫持的人质。他们在警方赶到前已经被恐怖分子杀害。

据悉，9月的这次汉人煤矿遇袭，导致至少 50 多人丧生，或是近年来伤亡最惨重的新疆暴力事件之一。值得注意的是，该袭击事件发生在大陆当局庆祝新疆自治区成立 60 周年这个敏感时期。

当时，一伙持刀者与 9 月 18 日深夜展开袭击，首先杀死了警卫，然后刺杀了在宿舍熟睡的矿工。遇难者大部分是汉人，其中至少有 5 名警察，另有数十人受伤。当地张贴的通缉令显示，袭击者是维吾尔人，他们似乎全部逃进了附近的崎岖陡峭的大山里，那里距离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边境不远。



新疆举行反恐演习

阿克苏是拜城所在地区的首府，曾经维吾尔人占绝大多数，但现在维吾尔人口是汉人的一半。

## 【红中时评】

### 水边：十三五能够消灭贫困吗？

2015-11-18 作者:水边 来自：红色中国时评

今年的十三五提出了一个看起来颇为大胆的口号，那就是让现行贫困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现在流行所谓“精准扶贫”，所以中央还给出了很具体的计划，那就是用产业扶持解决 3000 万，转移就业解决 1000 万，易地搬迁又是 1000 万，剩下的两千万都可以用低保来兜底。

数千万人口五年内就能脱离贫困，这样的宏伟计划听起来相当的给力，有点乌蒙磅礴走泥丸的感觉。但是红军不怕远征难的基础是有相应的理论，组织和物质基



础的，我们也可以反过来想想，如果真要实现这样的目标，我们国家需要什么条件呢？

如果是我们还生活在毛主席那个时候，要带领群众走出贫困，最起码需要这么些东西：

- 一个有正确路线的马列主义革命党组织
- 一批带领群众战天斗地的优秀干部
- 一个有群众基础有动员能力的政权
- 一个全国一盘棋的中央计划经济系统

有了这几样东西，精神变物质，毛主席领导全国人民在短短的 20 多年时间里就实现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成就。这个最直接的指标，那就是中国的人均预期寿命增长了将近 30 岁，在当时赶上了一批第二世界国家的水平。

要知道，贫困不贫困，最根本的不在于名义上钱拿多少，那都是后来流行的形而上学的政绩指标，而是在于人得到了多大的发展，有没有获得更多的改造社会和自然的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说，人均预期寿命就是最好的指标之一。

可是到了如今呢？哪怕是你想要按毛主席时代那个方子抓药，你也找不到药材了，一样也没有！可是也不是就不能扶贫了（扶贫这个词本来就是跟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的）。怎么办呢？资本主义社会有自己的解决方法，那就是投钱。

资产阶级说，人为什么会贫困呢？无非就是缺资本嘛，给你配上资本就行（除了本来的资本概念，还有后来流行的庸俗的人力资本之类）。所以解决贫困问题的关键就是如何让资本用某种方法去雇佣这些贫困人口。

中国过去这些年实现了大量人口的脱贫，主要就是按照这个路线来的，应该说在资本主义的标准衡量是行之有效的。但是这个方法的问题就在于，资本没有义务也没有必要去帮你解决贫困问题，如果正好条件不错，时机凑巧，资本的积累顺便就让人脱贫了，但是如果条件一般，资本就没有必要去做慈善了，对不对？所以，我国现有的大量农村贫困人口，都是长期陷于贫困的，因为种种自然和社会条件，没有资本愿意去那些地区，针对这些人口去搞积累。

应该说，在一些特定的条件下，资产阶级如果很有钱，或者有很强的中央计划，是可能专门拿出钱或者逼迫资本去解决贫困的，但是我们国家恰恰这两个条件都不具备。一个是我国的经济增长在明显放缓，资产阶级的本钱在越来越少，再一个是中央坚定的走市场化的道路，指望私人资本良心发现，自由的去解决贫困问题。这两个条件摆在这，十三五的豪言壮语怎么可能实现呢？我看中央也非常清楚这一点，所以也没有真的说要解决贫困问题，只是说按现行的贫困标准脱贫，这个“现行”两字还是留了不少余地的。

从历史来看，资本主义从来都不会消灭贫困，而是需要大量贫困人口，来为资本积累做准备。抛开十三五的文字游戏，中国从长期来看有多少“贫”还要扶呢，

还是可以从人均预期寿命上看。

根据国际上最近的一份研究，中国的各个省份按照其人均预期寿命，可以跟国际上类似水平的国家配对，我简要的列于下面。

河北省：保加利亚  
山西省：巴拿马  
辽宁省：波斯尼亚  
吉林省：波兰  
黑龙江省：阿根廷  
江苏省：美国  
浙江省：英国  
安徽省：突尼斯  
福建省：爱沙尼亚  
江西省：马其顿  
山东省：巴林  
河南省：厄瓜多尔  
湖北省：斯洛伐克  
湖南省：巴哈马  
广东省：哥伦比亚  
海南省：古巴  
四川省：巴拉圭  
贵州省：柬埔寨  
云南省：伊朗  
陕西省：秘鲁  
甘肃省：巴西  
青海省：危地马拉

北京市：马耳他  
天津市：爱尔兰  
上海市：瑞士  
重庆市：越南

广西壮族自治区：阿尔巴尼亚  
内蒙古自治区：墨西哥  
西藏自治区：摩尔多瓦  
宁夏回族自治区：阿曼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尔及利亚

香港特别行政区：德国  
澳门特别行政区：芬兰

看看吧，就在我们的土地上，有第一世界国家，更多的是第三世界国家。这就是资本主义自由发展的理想结果，有大量的富人，还有无数的穷人，如果没有革命，



扶贫的工作恐怕要永远的做下去，等着看十三五最后怎么把故事编圆吧。

## 附：原文后部分网友跟帖评论

[远航一号](#) 2015-11-16 11:47

海南省岂能跟古巴相提并论？2013年古巴人均预期寿命79.3岁，高于美国的78.9岁。据网上资料

<http://blog.people.com.cn/article/1373454196021.html>

海南省人均预期寿命仅74岁，低于越南目前的76岁。

水边编辑这次大意了

[远航一号](#) 2015-11-16 11:52

根据人民网上这份资料“中国大陆各省市自治区人均期望寿命数据”

<http://blog.people.com.cn/article/1373454196021.html>，可以逐一

核实。下面的数据，中国各省市自治区数据均来自上述网址，年份不一，但均属近年。与之相比的若干国家人均预期寿命，均取2013年，资料来源为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的相关资料：

北京市（2012年）81.4岁 加拿大（2013年）81.5岁  
天津市（2012年）81.2岁 韩国（2013年）81.5岁  
河北省（2015年预期）74.5岁 秘鲁（2013年）74.8岁  
山西省（2010年）73.4岁 保加利亚（2013年）73.5岁  
内蒙古（2015年预期）73岁 巴勒斯坦国（2013年）73.2岁  
辽宁省（2011年）75.6岁 马来西亚（2013年）75岁  
吉林省（2010年）73.9岁 罗马尼亚（2013年）73.8岁  
黑龙江省（2015年预期）74.5岁 哥伦比亚（2013年）74岁  
上海市（2011年）82.5岁 澳大利亚（2013年）82.5岁  
江苏省（2012年）76.6岁 阿根廷（2013年）76.3岁  
浙江省（2012年）77.6岁 捷克共和国（2013年）77.7岁  
安徽省（2011年）74岁 斯里兰卡（2013年）74.3岁  
福建省（2015年预期）77岁 克罗地亚（2013年）77岁  
江西省（2015年预期）76岁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2013年）76.4岁  
山东省（2008年）75岁 土耳其（2013年）75.3岁  
河南省（2010年计划）73岁 伊朗（2013年）74岁  
湖北省（2008年）76岁 突尼斯（2013年）75.9岁  
湖南省（2010年）74.7岁 泰国（2013年）74.4岁  
广东省（2012年）76.1岁 越南（2013年）75.9岁  
广西（2009年）73.3岁 保加利亚（2013年）73.5岁  
海南省（2011年）74岁 牙买加（2013年）73.5岁  
重庆市（2007年）76岁 波兰（2013年）76.4岁  
四川省（2010年）73.4岁 巴西（2013年）73.9岁  
贵州省（2011年）74.5岁 亚美尼亚（2013年）74.6岁  
云南省（2016年预期）72岁 柬埔寨（2013年）71.9岁

西藏（2015年预期）68岁 不丹（2013年）68.3岁  
陕西省（2008年）71.5岁 埃及（2013年）71.2岁  
甘肃省（2009年）72.1岁 危地马拉（2013年）72.1岁  
宁夏（2011年）73.5岁 约旦（2013年）73.9岁  
青海省（2010年）72岁 巴拉圭（2013年）72.3岁  
新疆（2007年）72岁 立陶宛（2013年）72.1岁

[解廌角](#) 2015-11-16 12:19

gdp可以40年来连续“增长”，财富不会40年连年增长。这个道理，应该连文盲都懂。

中国这40年的“发展”秘诀，基本上可以用“劫贫造富”来概括。135规划不是劫富济贫计划，只会制造更多的贫困而绝不会消灭贫困。说消灭贫困，仅在“现行标准”上玩文字游戏是不够的，还需要在统计学上玩人均概念游戏。

[redchina](#) 2015-11-16 14:03

远航一号提供的材料中，有几组数据值得注意：北京、上海的人均预期寿命分别相当于加拿大、澳大利亚；广东、海南的人均预期寿命分别相当于越南、牙买加；云南、西藏的人均预期寿命分别相当于柬埔寨、不丹

[水边](#) 2015-11-16 21:59

【远航一号：海南省岂能跟古巴相提并论？2013年古巴人均预期寿命79.3岁，高于美国的78.9岁。据网上资料<http://blog.people.com.cn/article/1373454196021.html> 海南省人均预 ...】

感谢远航的评论。不过我的数字来源是医学权威杂志柳叶刀（Lancet）在今年8月发表的最新文章，统一计算了2013年的全国各省人均健康指标，如果没有其他的研究，还是应该以此为准。海南的预期寿命接近78岁，而不是74岁。

读者朋友如有余力，可以参考这篇英文文献

Cause-specific mortality for 240 causes in China during 1990 - 2013: a systematic subnational analysis for the 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Study 2013, Lancet 2015 August.

[林林](#) 2015-11-17 02:51

关键在于这些数据是怎么算出来的？数学嘛可以很灵活的，完全可以根据人为的需要，加加减减，乘乘除除，分母用什麼，分子又取什麼等等。是根据各省的城市人口，包括不包括农村人口，包括不包括婴幼儿，儿童，青少年的死亡率，非正常死亡率，过劳死，在中国太多因素死亡的。天津爆炸，长江翻船，自杀，他杀，交通事故，泥石流，地震等，天灾人祸什麼的因素，是不是应该算进去呢？这些都要看统计的单位或个人怎么算的。算寿命当然得和各种情况的死亡年龄有关。

至于消灭贫困，也要看他们怎么算的？贫困的定义是什么？美国还有一个贫困线，中国的贫困线是多少？订的贫困线¥100 或¥1000，结果肯定不一样。

说难听一点，这是特色党妄图挽救他们失去民心的骗人诡计。高喊“小康”几十年，当今如何？我们看到富人外逃的钱财，他们子女在海外的炫富，他们在中国的莺歌燕舞：豪华生活。而中国的劳动人民以及他们的子女如何在挣扎。近来了解中国的儿童们“在拼爹”“在拼妈”。“拼爹”嘛，就是靠爹有钱参加各种课外班，从数理化到各种文艺体育等，可谓丰富多彩，全面发展；“拼妈”嘛，据说是拼妈妈的时间，妈妈有时间带领儿童去参加各种课外班。而这些儿童在全国有多少？

而广大劳动人民的家庭，父母双方工作已经精疲力尽也只能维持基本生活，这些大量的儿童怎能和那些中产阶级以上的人家比？——其实在这里，从儿童遭遇的差别就可以看到，如何消灭贫困？从全国来看，这种劳动人民的子女何年何月能够和那些有钱子女平起平坐呢？广大劳动人民的儿童如何能够不输在起跑线呢？

[远航一号](#) 2015-11-18 02:39

【水边：感谢远航的评论。不过我的数字来源是医学权威杂志柳叶刀（Lancet）在今年 8 月发表的最新文章，统一计算了 2013 年的全国各省人均健康指标，如果没有其他的研究，还 ...】

谢谢！柳叶刀引用的海南数据不会是海口市数据吧；人民网的数据按说也不会太离谱。且广东省人均寿命 76 岁，海南低一些似也合理

## 【经济分析】

### 迎春：评楼继伟在清华大学的演讲

2015-11-20 作者:迎春 来自：作者供稿

评楼继伟在清华大学的演讲

迎春/2015 年 11 月 20 日

今年 4 月 24 日，孙冶方经济学奖获得者楼继伟在清华大学做了一个题为《中高速增长的可能性及实现途径》的演讲，（以下简称《演讲》）这个演讲实际上是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的回顾与展望，演讲具有经济学理论色彩，因此值得认真分析。

#### 一，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

《演讲》是分析我国的经济的发展，主要围绕着我国经济会不会陷入“中等发

达国家陷阱”展开。他的演讲分为四部分，其中第三段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第四段是走出“陷阱”、保持中高速增长的实现途径，他还预计“滑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非常大，我甚至觉得是五五开。”等等。因此，本文的分析就从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开始。

现代西方经济学几乎没有科学的经济学概念，什么“中等收入陷阱”、“怪圈”、“软着陆”、“硬着陆”等形象的比喻却比比皆是。经济学的科学概念反映的是经济现象的本质，而现代西方经济学却用一些形象的比喻替代，回避了对经济现象的本质说明。

当前我国经济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增长速度不断下降，官方的语言叫“下行压力加大”，一些官员、学者们不能用科学的理论说明这种现象的本质和原因，就用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中等收入陷阱”来吓唬人们。《演讲》说：“什么是中等收入陷阱？实际上是停滞陷阱”。“中等收入陷阱”不能说明经济停滞的本质，因而不是经济学的科学概念。

首先，《演讲》提出中等收入的国家才有陷阱，实现中高收入国家也有经济增长停滞、下降的现象。例如日本，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早就超过一万多美元，是公认的经济发达国家，不是也有所谓的“失去的二十年”吗？经济危机爆发时，经济不也是急剧下降吗？可见，高收入国家也有经济停滞和下降的现象，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根本就不能成立；

其次，所谓的“陷阱”只是一个比喻，采用比喻，本身就表明这种理论说明不了经济停滞现象的本质。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最多只能说是一些国家的经验统计，不是科学的理论说明。

再次，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世界各国有不同的社会经济制度，只用收入高低划分出中等收入国家，本身就是抹杀不同经济制度的本质区别。

楼继伟作为“特色”社会主义国家的孙冶方经济学奖获得者，在整个的的演讲中根本没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概念，而突出现代西方经济学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演讲中没有根据经济关系划分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等概念，抹杀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连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概念都没有，满嘴都是西方经济学的理论。

突出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抹杀不同经济关系的性质，实际上办不到。生产关系、经济关系不仅是现实生活、包括经济生活中存在的客观事实，而且是决定社会的政治、意识形态的基础。我国改革开放的经济内容，就是把社会主义的公有制演变为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经济制度；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经济高速畸形发展，是因为改变了经济关系；当前存在经济下滑的趋势也是因为经济关系阻碍生产发展的结果。总之，经济关系在现实生活中起决定性的作用。由于经济关系是现实生活的客观存在，演讲的内容就不可能不涉及经济关系。例如演讲中所说的市场配置资源；劳动力流动等都涉及经济关系。所谓的“市场经济”就是经济关系。一般的“市场经济”，是私有者交换商品的经济关系；所谓的市场配

置资源，就是私有者在竞争中形成的盲目无政府状态；当劳动力成为商品在市场交换，就转变成为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所谓的劳动力流动性、灵活性，就是资本雇佣工人的“自由”程度等等。

总之，《演讲》突出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主要就是抹杀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等经济制度的根本区别，是赤裸裸地宣传资产阶级的理论。

## 二、从公有制向雇佣劳动制度的转变

《演讲》第一个题目是《中国经济增长三阶段的概括》。演讲中的三个阶段，是用劳动生产率和工资增长之间的关系划分阶段，说明经济增长的阶段。这也是掩盖我国经济由社会主义公有制转变为雇佣劳动经济制度的事实，抹杀毛泽东时期与改革开放以后经济性质的根本区别。

劳动生产率是指单位时间内劳动的效果或能力，反映的是劳动者改造自然物的一种能力。例如，纺织工人用手工织布机织布，一个月织一匹布，另一个纺织工人用机器织布，一个月织一百匹布，劳动生产率提高一百倍。这里说明的只是劳动者与物（布匹）的关系，在单位时间生产布匹能力的发展变化，是技术进步的结果。孤立地讲劳动生产率增减，与社会经济制度没有关系。但是，任何生产总是社会的生产，是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下进行的，不是在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下生产，就是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下生产等等。在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下生产，技术归资本家占有，实行专利权制度，限制了技术的推广、应用；相反，在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国家就能普遍推广。可见，劳动生产率只反映人与物的关系，不涉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工资则是一种经济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工资，在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下，是劳动力商品的价格。资本家用工资购买的是工人的劳动力，工人的劳动属于资本家，因此，劳动的成果和劳动生产率的高低，和工人没有直接关系；而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有制企业，如毛泽东时期的国营、集体企业，工资则不是劳动力商品的价格，是工人占有自己劳动的一部分，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工人占有的物质产品就相应增多。这两种工资的本质区别，在现象上的表现，主要是资本主义企业的工人可能被老板解雇、失业，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的工人则不存在解雇与失业的问题，与生产的物质条件直接结合。这就是雇佣奴隶与企业主人区别的根本标志。关于这些马克思在《资本论》和《哥达纲领批判》中都有详细的论述，这里就不重复。

而楼继伟完全抹杀毛泽东时期公有制企业工人和改革开放以后私有制企业工人之间的根本区别，把劳动生产率与工资之间的关系，作为划分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三个阶段，这种方法显然是错误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对于不同经济制度下的工资，会产生完全不同的结果。抹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根本区别，简单地把毛泽东时期公有制企业工人的工资与改革开放以来外资、私人资本企业的工人工资等同，是完全错误的。

《演讲》说毛泽东时期国营企业工人的工资压得特别低，说养老支出、医疗

支出和住房支出都不包括在工资内，是工资成本不真实。他还用自己当年月工资只有七八十元，而广东打工的挣二三百元作为典型，正好说明他抹杀社会主义国营企业与私人资本企业的本质区别。他所说的“工资成本真实化”，实际上就是我国公有制转变我雇佣劳动经济制度的过程。

楼继伟所说的改革开放到 90 年代中早期，就是我国经济由公有制经济向雇佣劳动经济制度转变的时期：首先，在农村推行包产到户，使集体农民成为个体劳动者，为个体农民“自由”出卖劳动力准备了条件；“改革”国营经济，“减员增效”，大量解雇工人；发展私人资本、引进外资，对外贸易高速发展，使我国经济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融合”，成为“世界工厂”。所谓的“工资成本真实化”的过程，实际上是经济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的过程，也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资本大量输出的结果。《演讲》却归结为：“这个阶段一直持续到 2007 年，其间工资增长低于劳动生产率增长。”根本不承认我国经济由公有制转变为雇佣劳动经济制度的事实。

讲我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不承认我国曾经存在过社会主义公有制，这样被资产阶级经济学侵透的学者（官员），竟当上了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财政部长，这种“特色”社会主义，当然也不可能是科学社会主义。

### 三，当前面临的是生产过剩的危机

《演讲》说：“2007 年是一个拐点。从这一年开始，工资的增长高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原因是：“2007 年在讨论《劳动合同法》，2008 年 1 月实施。这个《劳动合同法》是很有弊端的，当然，很多人可能不同意我的看法。它的弊端主要在于降低了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和灵活性。职工可以炒雇主，但雇主不能解雇职工，很多投资人离开中国也是这个原因。”楼继伟的屁股十分露骨地坐在资本家一边。

我们这里不是分析楼继伟的屁股坐在哪一边：资本家还是无产者，因为《演讲》对此毫不隐晦。重点是要指出 2007 年、2008 年爆发了世界经济危机，这才是造成我国经济发展的拐点、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根本原因。

2007 年美国爆发了次贷危机，2008 年以雷曼公司倒闭为标志的世界经济危机总爆发，是使我国经济由两位数增长，急剧转为“下行压力加大”的转折点。而楼继伟在整个演讲中，完全没有提及世界经济危机的事实，似乎根本就没有发生过世界经济危机，这样的经济学家实在令人难以理解。

我国依靠“招商引资”，大力引进外资，发展外贸，成为“世界工厂”。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依靠借债过日子、提高福利的路子走不通了，虚假的购买力显出了原形，从而我国的生产过剩也逐步显现出来，成为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原因。而楼继伟对于这样重大的事实却视而不见，反而归为实施劳动法，工资增长超过劳动生产率增长，确实令人惊讶。

2014 年，我国生产粗钢 8.23 亿吨，占全世界总产量的 49.5%；水泥产量达

24.76 亿吨，占世界总产量的 60%；生产手机 16.27 亿台，彩色电视机 1.4 亿台等，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全面过剩的态势暴露无遗。目前，钢铁、煤炭等行业亏损严重，一些企业开始倒闭，部分外资企业逐渐向工资低的越南、印度等国家转移等，主要是爆发世界生产过剩经济危机造成的，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与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

总之，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下行压力加大”的原因，主要是生产过剩。当前，我国经济面临着爆发经济危机的问题，而不是什么工资增长超过劳动生产率增长。

#### 四，促进经济发展的措施

楼继伟在论证我国经济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之后，提出保证经济中高速增长几项措施：“第一个最大的潜力在于释放农业人口。”“第二是户籍改革。”“第三，合理的城镇化。”“第四，社会保险体系必须改革。”总之，几项措施的最终目的是要逼迫更多的农民从农村、农业中流入城市打工，增加劳动力的“流动性”“灵活性”，为资本家增添更多的剩余价值，他认为这样就可以保持我国经济的中高速增长。

其实，这只是楼继伟及一些人的一厢情愿。我们反复说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是严重的生产过剩，是实行雇佣劳动经济制度的必然结果。由于我国经济面临着严重的生产过剩，不仅农村劳动力不可能继续流入城市打工，现有的农民工也将面临大量失业重返农村的问题。现在政府不断呼吁“大众创新万众创业”，本身就包含着要农民工回乡创业的意愿。

总之，我国经济面临着严重危机，唯一正确的途径，就是重新回归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发展的道路。楼继伟之类经济学家的“药方”，不仅不可能治“病”，反而会造成我国经济危机的大爆发和经济的大倒退。

楼继伟的演讲，用“中等收入陷阱”的命题，抹杀不同经济制度的本质区别；论述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的过程，抹杀毛泽东时期公有制经济与改革开放以后的私有制企业的根本区别；完全无视 2007、2008 年世界资本主义爆发的经济危机的事实等等。这样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者，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他们全部的智慧就是抹杀社会经济制度的根本区别。马克思在论述“生产一般”和“本质区别”（指经济制度）时指出：“而忘记这种差别，正是那些证明现存社会关系永存与和谐的现代经济学家的全部智慧所在。”（《马恩选集》第二卷第 88 页）

楼继伟这样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被公开邀请到清华大学给学生演讲，宣传现代西方经济学的谬论，充分说明当前我国经济学界的真实状况，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已经完全被排挤出主流阵地。我们必须高举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大旗，彻底批判现代西方经济学，让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重新占领理论高地。



## 【附】楼继伟清华大学演讲全文

中国可能滑入中等收入陷阱：中高速增长的可能性及实现途径  
(2015年4月24日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演讲)

楼继伟

钱颖一院长今天给我指派了一个任务。这个周末是清华校庆，明天校里有活动(清华建校104周年)。我今天到经管学院讲课，也算是对校庆的贡献吧。今天我讲一讲大家都很关注的原来高速增长变成中高速增长，可能吗？如果可能，什么样的路径才能够实现？否则的话会是什么样的？讲这么一个更宏观一点题目。我想给我们同学一点启发，因为我觉得这里的问题很多都可以变成我们大家研究的课题。

我讲的题目是“中高速增长的可能性及实现途径”。我想讲四个方面。先简单地回顾到目前为止经济增长的特征。第二，当前经济阶段的特征。第三，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第四，走出“陷阱”、保持中高速增长的实现途径。如果讲的面特别广，就没法概括，因此我着重从劳动生产率和工资增长的关系方面来讲。

### 一、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阶段概括

从改革开放开始，我们可以看到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早期，工资的增长大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这是成本真实化的早期，当时我挣七八十元的时候，广东打工的挣二三百元。计划经济时期我们把工资压得特别低，使得利润比较高，因为基本上都是国有企业，高投资，高利润，高上交。早期成本真实化过程持续到九十年代的中早期，压抑的工资已经基本上解决。在这个过程中，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并不平稳，而工资增长快，造成了通货膨胀压力。

从九十年代中期开始了进一步工资成本真实化的第二阶段。原来养老支出、医疗支出以及住房支出都不反映在工资中，而是反映在企业的其他成本里，到九十年代中期开始推行这些方面的改革，即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住房货币化的改革，工资成本进一步真实化。随着十四大确立了市场经济的地位，多元所有制的兴起，这段时间劳动力和劳动生产率得到了释放，再加上人口红利释放的非常充分。改革早期，基本是搞乡镇企业，到90年代中后期很多乡镇企业都垮掉了，因为真正的市场化开始后，遂形成了真正的竞争，那些夹缝中的乡镇企业不再有竞争力。劳动力开始真正的流动，我们可以看到人口红利大规模进入制造业。这个阶段一直持续到2007年，其间工资增长低于劳动生产率增长。

在前面两个阶段，经济增长基本达到9%—10%，而且可以说是基本健康的；当然，也有很多扭曲，比如说养老、医疗、住房改革都还存在很多问题，但是被巨大的人口红利缩小了这些扭曲带来的效应，使得经济增长比较快。除了中间有一些波折或是外部冲击导致的通货膨胀或者通货紧缩，总的来说没有大的问题。

2007年是一个拐点。从这一年开始，工资的增长高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2007年在讨论《劳动合同法》，2008年1月实施。这个《劳动合同法》是很有弊端的，当然，很多人可能不同意我的看法。它的弊端主要在于降低了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和灵活性。职工可以炒雇主，但雇主不能解雇职工，很多投资人离开中国也是这个原因。推行企业集体谈判是对的，但是提出行业集体谈判和区域集体谈判，是可怕的，欧洲就是这个问题造成了劳动力市场僵化。美国底特律行业工会力量很强大，工资福利特别高，如果以美国南部日本投资的汽车企业作为标杆的话，每辆汽车的成本要高2000美元，最终导致底特律汽车业破产。

另外一个大的问题是老龄化社会即将到来，劳动力增速开始减慢。而且农民工已经是第二代了，不同于第一代，择业标准也不同了。这时候需要尽快调整政策。也就是恰恰这个时候，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四万亿刺激政策出台，大规模的投资驱动掩盖了需要解决的问题。比如，2009年和2010年，虽然工资增长很快，但经济增长更快。但不可持续的刺激政策消退，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又慢于工资的增长。

归纳一下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增长，就是如下三个阶段：80年代到90年代中早期，90年代中期开始一直到2007年，2008年刺激以后一直到现在。

## 二、当前经济的阶段性特征：“三期叠加”

当前中国经济处于经济增速换挡期、经济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阶段。

经济换挡期是必然的。第一是老龄化，65岁以上人口的占比2011年是8.1%，2014年是10.1%，这个比例超过10%就意味着进入老龄化社会。第二是劳动阶段的人口，即16—59岁阶段的人口，开始净减少，从2012年开始减少了300万，以后还会减少。第三，特别是2007年开始，工资陡然上升，工资增长高于劳动生产率增长。2014年，我们的人均GDP是7500美元左右，比马来西亚低，比泰国略高。但是，据中国社科院的一份研究显示，上海的工资是吉隆坡的1.16倍，曼谷的1.8倍。我们的工资已经没有竞争力，与此同时，劳动合同法又削弱了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在其他约束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随着适龄劳动人口的下降，需要劳动生产率大幅提高才能推动增长，否则工资增长长期超过劳动生产率增长就会带来通货膨胀或“滞胀”。因此，如果不采取有效的政策措施，当然经济学上讲的政策包括改革，潜在经济增长率可能会低于5%。

由于近年来工资增长非常快，沿海一些地区制造业已经开始机器人[3.56%资金研报]化，它的规模和速度都超过了我们的想象。现在，全世界一半以上的机器人是在中国，当然是比较初级的，智能机器人比较少。这使得劳动生产率在变化，在提高。如果没有这些变化，我们的潜在经济增长可能还会低。

三期叠加中的第二期是经济结构调整阵痛期。在经济学上，经济结构调整是指为结构调整而实行的结构改革。这部分内容将放在后面来讲。先来看看前期刺

激政策的消化期。

前期刺激政策带来了一些问题。第一是高杠杆率。关于杠杆率，有很多的说法。最近彭博社说是 280%，也有的说是 230%，这些说法可能都有其分析依据。最简单的是看 M2 和 GDP 之比，这个比例现在是 193%。我认为，拿这个比例和美国比其实是不合理的。因为美国不是银行占主导的金融体系，而是以资本市场为主的金融体系。比较国际可比的是欧洲，因为欧洲也是以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但是欧洲的 M2/GDP 是 160%，我们是 193%。这个比率自 2008 年以来，提高了大概四五十个百分点。在杠杆率中，有 40% 是政府债务，主要是地方政府债务大规模地上升。据审计署审计，到 2013 年上半年直接由地方政府承担偿还责任的债务是 10.9 万亿，一年多过去了，这个数字又有增加。间接承担偿还责任的部分，一般情况下代偿率可能是 20%，但经济下行时，有可能大幅度上升，这里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第二，全要素生产率下降。我们可以看一个简单的数：设备投资占总投资之比。2007 年是 23%，2013 年降到 20.4%，降了 2.6 个百分点。设备投资和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是直接相关的。那么，前期刺激期大量的是造城和房地产。所以在消化期，要去杠杆，而且要稳妥地去杠杆。去快了，不行，像美国 2008 年、2009 年、2010 年快速去杠杆，导致 2009 年和 2010 年经济增长是负的，失业率 11%，加上一些不愿意登记失业的，实际失业率高达 16%。我们没有那样的承受力，所以要考虑缓慢地、稳妥地消化过剩产能和去杠杆，还要恢复劳动生产率。仅从这两期叠加看，GDP 增长速度是不乐观的。

### 三、结构调整期和中等收入陷阱

如果我们在下大力气进行结构调整，也就是经济学上的结构改革，中期增长有可能达到 6.5%—7%。这是一个需要努力奋斗去实现的比较乐观的前景。但是，我们也有另一种前景，即今后的五年十年，滑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是非常大，我甚至觉得是五五开。什么是中等收入陷阱？实际上是停滞陷阱，但是容易发生在中等收入阶段。1050 美元到 12470 美元都是中等收入，5500—12470 美元，是中等偏上，我们现在就是中等偏上。拉美一些国家和东南亚国家，也是在这一阶段停滞的。

为什么我们滑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非常大？我刚才提到，我们的老龄化和劳动力人口下降来得太快。五六年前我们还在谈论刘易斯拐点，很快就发现劳动人口绝对数量开始下降；老龄化，即 65 岁以上人口占比快速上升。据社科院的研究表明，从老龄化比率从 7% 上升到 14%，世界平均时间是 40 年，我国是 23 年；14% 上升到 21%，世界平均时间是 50 年，我们是 11 年。劳动力人口以每年二三百万人的速度下降，要降 20 年。

为什么特别容易滑入中等收入陷阱，是怎么滑入的呢？在经济发展的初期，增长主要来源于农业人口转为非农业人口。如果政策是比较合理的，而且重视教育，特别是有效的教育，就可以带来人力资本的提升，这时候劳动生产率就会上升，收入也在提高。由于开始时劳动力几乎无限供给的，所以工资的增长并不是

很快。这个时期资本收益很高，资本积累非常快。伴随这个过程的是，资本质量得到提升，经济向价值链更高端跃升，工资在上涨，然后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人民生活不断改善。当然这个过程是转型过程，也是各方面矛盾交织的过程。成功地经过这样一个过程，就可以脱离停滞陷阱，否则就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在我国比较不利的是，这一过程的时间比较短。如果说过去没有学苏联鼓励生育，然后又不得不实施计划生育，那么这个过程会是逐步的。所以现实情况使我们更要有紧迫感。

不滑入陷阱需要什么条件呢？要有好的政策，包括人力资本提升的政策；灵活的劳动力市场；产权保护；要素流动和交易，特别是土地；开放的经济环境。拉美为什么出问题，第一是不开放，第二是劳动力市场逐步僵化，还有民粹主义。东南亚的问题和拉美不太一样，他们还有另外的问题，如法治化比较差。

在这个过程中，有一条铁律，就是在正常情况下，工资的增长一定要低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我们说的八十年代开始的那一阶段不是一个正常情况，那是一个人为压抑工资成本后的真实化的过程。还有一个一般规律：政府收入占比，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宏观税负，要逐步提高，提供再分配。在这些环节中的任何一个环节出错，都会滑入中等收入陷阱。而且这些环节往往是综合的，容易表现为民粹主义，社会浮躁，法治缺失，腐败盛行，最后出现陷阱。

对中国来说，还没有这么悲观。我们已经创造了一些条件，比如开放，我们一直是开放的。我们是开放的受益者，是加入 WTO 的受益者。我们自己和国际的分析都认为，WTO 最大的受益者是中国，而且我们是全方位的逐步开放。我们的财政能力应该说还是比较强的，而且总体来说是比较谨慎的，劳动力的流动性和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在下降，但并不是很严重，比如我们并没有像欧洲和拉美那样搞行业集体谈判和区域集体谈判。一个企业内部应该推行企业职工和雇主的集体谈判，但是绝不能搞行业集体谈判和区域集体谈判。金融危机后南欧国家推行劳动力市场改革时，第一项措施就是终止区域集体谈判和行业集体谈判。拉美行业集体谈判带来的问题也很大。巴西各行业都推行，工资过快上涨，然后是通货膨胀，结果是普通贷款利率、债券利率高达 20%，对经济增长带来严重影响。我在中投公司时，去巴西访问，正赶上巴西银行业工资集体谈判，银行业工会一带动，不管是有效益的银行还是没效益的银行都涨工资。这种情况下，谁敢去投资。

但是，我为什么又觉得不乐观呢？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些问题，也就是劳动力和土地为代表的要素流动性、产权保护、对外开放等等，在其他国家可能有二十年的演化过程，但是由于我们未富先老，只有五到十年的调整期。

在三期叠加中，换档期是客观的，即使其他条件不变，只是人口结构变化，经济增速就必须换挡。消化期的高杠杆率、全要素生产率下降、产能过剩，也是客观的。如果我们不做出很有作为的一些调整，落入停滞陷阱的可能性是很大。

#### 四、保持中高速增长，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途径

要想保持中高速增长，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有什么样的途径呢？特别是，留给我们的时间并不多。途径就是改革。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确定了大量十分具体的改革任务，最具决定性的任务都要在 2020 年完成。落实两次全会确定的任务，我们就能越过中等收入陷阱。从经济学上说，所谓改革，就是校正扭曲，使潜在的生产力释放出来。

第一个最大的潜力在于释放农业人口。2014 年，我们的城镇化率是 54.8%，比我们相近发展水平的国家低 10 个百分点；而且其中按户籍人口算城镇化率为 35.9%，其他是所谓的常住非户籍人口。我们必须要有劳动力人口的增长，才有增长的基础。那怎么释放人口呢？一个是改革农业，2014 年，我国粮食生产 1.2 万亿斤，但各级财政大量补贴，是一种从种子到餐桌的全程补贴。补贴干预了资源配置。比如说，东北应该是漫山遍野大豆高粱，但是补贴后的玉米成本是 6 毛钱，国家再按八九毛钱收购，相当于再补贴，所以农民都改种玉米。但玉米市场价格人为抬高，玉米加工企业大量亏损，又在争取国家补贴，于是补贴变成指导资源配置。我们应该减少对价格的干预性补贴，可以对勉强耕作的农地退耕还林、还草、还湿等生态恢复的活动给予补贴，而对农业生产应回到承包制时的种什么、怎么种、怎么卖、怎么用由农民自己决策。现在的做法就是国家用所谓的经济杠杆直接配置资源，而不是市场配置资源，国家作为补充。怎么办呢？就是把价格放开，让农民根据比较效益自主决策。资源配置的结果，很可能是因粮食收益不高，出现耕地集中化经营，达到平均收益，分散的农户发展各类种养业，相对收益较高，农业合作组织获得发展，帮助农民连接市场。目前，经过大量补贴后，我国粮食价格仍高于国际市场，反映了我国的农业资源条件相对较差。价格放开之后，资源配置的结果，必然是粮食生产减少。其实不必过分担忧，适度进口就行了。例如，阿根廷关心的是中国人得买它的大豆，韩国人拍的纪录片《超级中国》，一上来就说阿根廷 40% 的耕地种的是大豆，主要卖给中国人。种大豆的收入比过去畜牧业收入高，阿根廷能回去吗？他们会卡着不给我们吗？如果我们不进口，这些国家马上会来交涉。我们保住了基本口粮，一些非关键品种如水稻都可以适度进口。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是主流。特别是民选政府国家，如果卡住农产品[2.72% 资金 研报]出口，政府就要丢选票，就站不住。那么，如果发生严重紧张的国际局势呢？很好办，保留一年的库存周转，搞好种业，然后还草一耕，几个月就长出小麦，还湿一耕，几个月就长出水稻了。

放开价格，让市场配置资源，实际上是劳动力和土地资源的市场配置。按照三中全会确定的任务，农用土地的流转试点现在也已经开始了。还有集体建设用地的流转，与国有土地在同样用途管制的情况下，同等入市，也在选一些地区做试点。这些全部推开后，几百亩上千亩的大户就有可能越来越多。当然在 WTO “黄箱” 约束之内，我们仍可以适当地对粮食提供补贴，但是不要全过程补贴，应该实行后补助。所谓后补助就是设定一些标准，比如按农药、化肥残留标准。因为施用农药、化肥越少，产量越低，适度补贴后还可以卖高价，让农户自己选择。

通过对上述方面的改革，我们可以释放出农业劳动力、合理利用农地、提高农业生产率，农民的收入也可以增长。

第二是户籍改革。这也是市场配置资源的重大改革，而且公共服务资源应该随着人口的流动，特别是其中的教育，当然也包括卫生和医疗等。财政部和教育部合作，推行终身学籍制度，正在探索义务教育资源随着学籍流动。户籍制度改革现在已经开始了，但是不理想，2014年7月份户籍制度改革文件下发，到现在为止有14个省市出台了落实的方案，而人们最愿意落户的那些省份一个也没有。

第三，合理的城镇化。大量的研究表明，以大城市、特大城市为中心的城市带，包括周围的小城镇，才有就业机会，比如设计、物流、生活服务，以及围绕制造业的一些生产服务业就业。西部地区很可能围绕省会以及一两个重要城市，形成城市带。在这个过程中，就会出现农业人口转入非农部门，于是劳动生产率得到提高。我们必须打破阻碍劳动力流动的一些障碍。现在各地都对劳动力流动有限制。在1954年《宪法》中，我国劳动力人口是有自由迁徙权的。1958年的时候逆转了，因为全面进入计划经济，随后实行最严格的人口流动管制，直到1982年《宪法》重新修订，但当时仍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其后屡次修改《宪法》，劳动力充分流动这个市场经济的基本要素，在宪法正文中都没有改入。目前相当多的地区规定必须有产权房才能够落户。这也是造成住房房租比畸高的重大扭曲。租房为什么不能落户口，在德国80%的人租房，并没有出现所谓的“大城市病”。

劳动力向最能发挥其效能的领域和地域流动，是城镇化的应有之义。当然，可以有适度限制，主要是考虑公平性。有的国家的一些省州规定，要在当地交税达到一定时间，子女才能享受上省州立大学的优惠。

随着城市化的发展，服务业和制造业有可能向价值链比较高的方向发展。实现这一条就需要解除管制，放开市场进入。现在国务院正在推简政放权。克强总理一直在讲，创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环境，已产生应有的效果，特别是在创造就业方面。在进一步解除管制的同时，政府也可以采取适当措施，支持引导企业向价值链高端发展。财政现在成立了一些基金，把过去直接面对企业的资金改造成“种子基金”，就是引导社会上的一些基金对企业创新投资，比政府自己做强，而且还减少了腐败的机会。

当然，讲到城镇化有必要讲房地产税。我见过很多文章说地方主要靠土地财政，是看到土地基金年收支规模达到四、五万亿。实际上地方在土地上的净收入并不多。全国平均，土地拆迁补偿、安置及土地整理后的净收入约占毛收入的20%。问题主要在于地方不断依靠新增土地获得收入，造成了用地扭曲。今后农村建设用地在符合用途管制的情况下，同等条件入市，地方财政土地净收入还可能少一点，但是这并不是最重要的，我们不能总是靠土地增量来解决问题。

我们可以看到，最近七八年，建设用地增加了70%多，常住人口增加了50%，人口密度是降低的。我们的城市不仅人口密度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更不要说OECD国家，而且交通还比人家拥挤。这就是用地扭曲的表现。今后应该有一个好的激励，而房地产税是一个好的激励。激励地方政府盘活存量，城市集约式发展。

第四，社会保险体系必须改革。社会养老保险必须改成国家直接管，才能形成劳动力自由流动。三中全会明确了要国家统筹，但是，必须要改目前的保险制度，因为这个制度负激励效应太大。不改成一个正激励的制度，也就是三中全会要求的多缴多得的制度，单纯提高统筹级次，就是灾难。社会保险要精算平衡，收缴、给付、投资收益以及替代率、给付年龄等等都是精算调整的因素。不然的话，我们也是过不去的，马上进入的快速老龄化更过不去。医疗保险问题也很多，但不再赘述。

上述这些改革都是三中全会中提出的重要任务，四中全会又提出了依法治国的180项改革。我们已经看到了改革正在推进，比如，在沈阳设立了最高法院的巡回法庭，管辖东三省，在深圳设了一个巡回法庭，管辖海南、广东、广西，全国至少还得设若干个跨区域的巡回法庭，这是促进市场统一、公正的重大改革。巡回法庭属于中央事权，将由中央财政承担支出责任。中央财政的支出占比要提高，也是三中全会确定的。

总之，三中全会、四中全会确定下来的决定性任务，如果到2020年我们按时完成了，我认为可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而且这几年非常非常关键。由于我国人口快速老龄化的因素，人家有二十年时间的变动，我们可能就只有十年要做那么多的事，才能够使我们的全要素生产率上去，走出停滞的陷阱。在这个过程中，除了推进改革外，还要处理好两大难题。第一个难题就是去杠杆化，不能再积累，但是又不能经济失速。在企业方面，现在股本市场比较好的时候，应该大力发展股本性融资，比如私募基金、风险投资。资本加大了，债务率就下来了。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失速和规范有时候是冲突的。改革是需要规范的，比如对地方存量债务的处理，要清理也要给出路。要置换债务缓释风险，转换方式，例如转成规范的PPP方式，从而在规范中增长。

另一个难题是社会稳定与改革力度之间，改革的进度和改革力度之间也要平衡。例如，2008年出台的《劳动合同法》是一部过分超前的法，可能超前50年。但修改它要取得共识是很难的。2011年出台的《社会保险法》，规定个人账户可以继承。保险是大数定律，互济原则。买了保险最后的结果是相当于同等年龄段的人，互相之间互济。说直白点，就是短寿补长寿。保险法却规定为储蓄了，而不是保险。那么长寿者怎么补呢？只好提高单位的缴费率，大多数人却认为这是对的。医疗保险应该是一辈子缴费，而在我国退休后是不缴费的，绝大多数实行基本医疗保险的国家是退休后还要缴费。美国比较特殊，是65岁开始缴医疗保险，缴到终老。在65岁之前是税收政策支持的商业保险。这些难题都是老龄化面对的问题，也是我们当前要解决的问题。

社会稳定与改革力度之间，改革的进度和改革力度之间这两个权衡，难度比20年前大多了。我认为，我们如果不采取措施，就有可能是5%左右的增长速度，但如果采取措施真正推行很好的改革，6.5%—7%是完全可行的，而且是实实在在的，人民在当前和长远都受益的包容性的中高速增长。上述列举的改革措施，其实都是三中、四中全会规定的任务，有些已在推开，有的正在试点，有的处于积极准备阶段。我们要坚定地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文件规定的要求，坚决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尽我们所能往前推，再难也要做到。现在正



在开始研究“十三五”规划了，这些问题都摆在我们面前。不仅是指标，更大的的是怎么落实三中全会、四中全会的任务。所谓途径，就一句话，按照三中全会、四中全会真这么做就对了。这样，我们就可以实现一个中高速增长，而且成功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 刘杰：危机是件很具体的事——论今天中国经济危机的成因

2015-11-21 作者：刘杰 来自：红色中国网

左向前按：“经济下行”已成“新常态”，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步履维艰，资产阶级的手段虽未用完但已越来越少，这是连他们自己都不得不承认的事。对于重建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者来说，需要全面观察深入研究经济形势才能准确把握经济危机的形成与发展，以便对未来革命形势作出正确判断，抓住有利时机开辟革命道路。近期红色中国网主编远航一号与左翼学者阳和平因经济危机问题引发讨论，双方见仁见智，各有详细论述。但前后数篇文章由于篇幅太长，且专业性较强，《红色中国周刊》不能一一刊登。青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者、红色中国网刘杰编辑针对双方观点发表了自己的见解，文章虽然不长，但说理透彻，通俗易懂，亦能从中了解争论双方的不同认识。特刊登于此，以供关心经济形势的读者参考。

### 危机是件很具体的事：论今天中国经济危机的成因

认识我的人都知道，刘杰是个很温和的人，善搞中庸，胆子还小，通常不见兔子不撒鹰，可是逮着兔子就小富即安，牛也拉不回。最近看到红中网上有许多关于经济危机的文章，于是也想亮一亮兔子。我周围经常能听到一些时髦词，新常态一带一路亚投行什么的，反正电视网络上说什么大家就说什么，大家见面说的都在重复媒体的话，见不得个人的思考。所以先看看关于中国经济危机“大家都怎么说？

一种说法叫三期叠加，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这是什么意思呢？一句话，资本主义来了大姨妈，人口红利减少了，产能过剩，企业和地方政府大量负债，贫富分化严重，社会矛盾尖锐，从程度上可能很痛，但是从时间上来说是阵痛，挺一挺就过去了。有人把国家比作全能神，宣称国家想要8%经济增长还不容易吗？现在就是故意保持低增长，进行结构调整。大姨妈来了的确不适合剧烈运动，可是我一听到结构调整这几个冠冕堂皇的字就知道，讲话的人要么真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要么就是心怀鬼胎。结构调整无外乎就是破坏性创造，就是让企业破产让工人失业为重振资本积累准备条件。像楼继伟说的更赤裸裸，他把改开以来分成三个阶段，注意这可不是春天的故事一个阶段走进新时代一个阶段，而是根据劳动生产率与工资增长的关系来划分的阶段。从1978到90年代中早期，劳动生产率增长不平稳而工资增长快，这是第一阶段。从90年代中期到2007年，工资增长低于劳动生产率增长，这是第二阶段。2007年是一个拐点，工资增长开始高于劳动生产率增长，这是第三阶段。他把第三阶段归咎于《劳动合同法》，还要避免高福利陷阱，俨然中国工人享受的福利已经接近高福利国家，我个人深感拖了祖国的后腿。他其实想说，我们现在三

期叠加，要拿工人开刀。我觉得这是比较实在的说法。先不管危机的成因是什么，反正我现在危机了，我要找那个好欺负的开刀。

还有一种说法叫做激励机制出了问题，反腐把官员整得小心翼翼，不敢作为，还有人总结说抓起来的都是干事的人。这么多年以来，主流经济学翻来覆讲地方政府官员为了晋升或者捞得好处，所以想方设法促进地方经济增长，所以要招商引资压低工资减少环境监管，好事坏事都是这么一个故事。现在有所作为可能被反腐，所以经济增长就下滑了，虽然咱们不明说，但其实腐败什么的都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都是灰色地带，别净整非黑即白那种事，忘了我们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了吗。这种说法在被反腐影响到的所谓中产阶级那里还真有市场。倘若真是这样，那么三期叠加避免高福利陷阱之类的话岂不都白 **bb** 了，中央出个文件宣布反腐告一段落，危机自然就解决了。可是官员做的不是资本家的事，招商引资不是官员投资，官员顶多促进了资本积累而没有代替资本积累，资本家不投资也并没有什么卵用。

这两种说法一个盛行于官方，一个流行于坊间，官方的冠冕堂皇，坊间的颇为厚黑，可我觉得都云里雾里，并没有把今天中国经济危机的成因说明白。我想用马克思进行分析，可是我读的书也不多，不能起个名字叫马克思主义的视角什么的。不过话说回来，大多数有幸拥有马克思主义视角的人却很少分析具体问题，还请这些人对我挂羊头的分析网开一面，少说“你连什么什么都不知道之类”装大爷的话。我认为，马克思虽然说过这说过那，说过生产过剩消费不足说过一般利润率下降，说过工人可以争取工资提高说过资本总有办法对付工人，但是我们现在的危机事件很具体的事，就摆在我们面前，而且可能持续很长时间，所以我得说句废话，叫做别套用马克思的一般理论，而要用马克思的方法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我的观点与阳和平同志不同，与远航同志也不完全一样。在红中网的争论中，阳和平同志认为生产过剩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本起因。其实，生产过剩和资本主义相伴相随，剩余价值的生产形成了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对抗性的分配关系，工资无法购买全部产品，资本家剥削越成功，生产过剩很可能就越严重。在一定条件下生产过剩会导致危机，可以表现为商品过剩也就是商品卖不出去，或者产能过剩，也就是产能没有充分利用。可是不能反过来说，如果商品过剩产能过剩，就一定是生产过剩导致的危机。有很多原因可以导致商品过剩产能过剩，比如金融泡沫破裂，比如利润率低迷导致投资下降，比如国际国内企业间的恶性竞争，比如出口市场的萎缩，比如汇率的变动。中国统计中的劳动者报酬占 **GDP** 的比重只有 **40%** 多，这里面不仅包括了工人工资，还包括了务农收入、个体收入、管理者报酬、事业单位和公务员工资，所以工人阶级的收入份额应该更低。这说明什么？说明中国本身就是一个生产过剩的体质。但是，一个胖子并不总会因为胖而得病，他可以挺健康，也可以因为胖以外的其他原因而得病。医生给他看病的时候不能抓住肥肉不放，不管得的什么病都是减肥一把刀。每当资本主义发生危机，生产过剩总是一种“不会错”的解释，也是一种“会不错”的解释，可是要想判断未来发展方向，保证不错是不够的。在一定条件下，中国这个生产过剩的体质可以维持，虽然工人消费能力弱，但是社会总产品还可以用于投资或者用于出口。现在出现了危机，那么肯定是这个“一定条件”不具备了。我们只有分

析了这些条件，才知道虽然是一个生产过剩的体质，为什么前一个时期中国可以高速增长，现在这个阶段陷入危机，将来较长一段时间还要处在低迷之中。

首先全球性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之后外部市场萎缩。这没什么说的，也没有什么争论。虽然 GDP 增长中净出口的贡献很小，但那是净值，对企业来说重要的是出口总量，出口萎缩对企业是致命的。第二是投资的下降。我们可以用统计上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增长率（经过价格调整）来看投资增长的速度。2001-2008 年平均增长率是 15%，2009 年四万亿计划导致增长率提高到 25%，2010-2014 年则下降到 10%，其中 2014 年只有 7%。从 2015 年的月度数据来看，投资还在进一步下降。投资为什么会下降，因素很多，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利润率。我计算的利润率表明利润率在 1999—2007 年之间上升，2007—2014 年下降，2014 年只相当于 2003 年的水平。这里得加个注：我排除了非企业部门，而且根据剩余价值在生产部门和非生产部门的转移进行了调整。利润率的分子是以重置价格衡量的固定资本存量，有人要批评我没有把流动资本以及以商品资本、货币资本形式存在的资本加进分母中，与马克思的原意不符。这是缺乏数据所导致的，但是不能因为与马克思原意不符就固步自封吧，所以我想尽办法看看没有放进分母的各部分在 2007 年前后是怎样变化的，现在我可以这样说，即使按马克思的原意进行调整，利润率在 2007 年前后仍然出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

现在得问题就是，利润率为何以 2007 年为界出现了先升后降的趋势？有三个方面的因素可以影响利润率，一是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从长期来看，有机构成提高会导致平均利润率下降，可现在利润率的趋势是先升后降，即使有机构成在起作用，它的提高也无法导致利润率先升后降。二是价值实现出了问题，这又回到中国的生产过剩体质上了。生产过剩和利润率下降不是单向的关系，而是相互影响的关系，生产过剩越严重，东西卖不出去，生产能力闲置，利润率就越低，反过来利润率越低，投资需求越弱，生产过剩就越严重。2007 年之后金融危机爆发，外部市场萎缩，中国生产过剩的矛盾暴露出来，此后四万亿计划短期内掩盖了生产过剩的矛盾，但是进一步扩大了产能，在计划结束后钢铁等行业产能过剩的问题更为严重。生产过剩肯定是利润率下降的一个因素，但它是体质性问题，存在了很久，只不过条件成熟后暴露出来，它和利润率是相互影响的关系，所以不能把问题都归因于生产过剩。除了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和价值实现问题，第三个影响利润率的因素就是价值生产的问题。也就是说，2007 年前后，劳资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从分配比例来说工人分得的价值更多了，剩余价值减少了，导致利润率下降。这个因素的争议是最大的，但我有这么几个证据。

证据 1：以 2008 年为界，分配中劳动报酬占国民收入的份额先降后升。远航同志也经常使用这个证据，虽然数据来源不太一样。我衡量了统计中的劳动者报酬占 GDP 的比重，劳动者报酬占不包括固定资产折旧在内的 GDP 比重，还有企业部门的剩余价值率，前两个指标都在 1997—2008 年上升，2008-2014 年下降，剩余价值率则相反。阳和平同志说这是假象，是利润份额的变化所导致的，其背后的原因还是生产过剩。大概在 2010 年的时候，我也认为是利润份额变化的原因，并且觉得劳动份额迟早要下降，毕竟企业不赚钱可以压低工资，就这样到了 2014 年，劳动份额还在上升，一个假象能持续这么长时间，我们还真得认真对待它了。

证据 2: 产业后备军在减少。90 年代国企改革形成的下岗职工现在基本到了退休年龄, 大多已经退出了劳动力市场。农民工的数量没有减少, 但是其增速在 2008-2014 年出现连续下降, 并且在 2011-2014 年慢于城镇就业总量的增长。当然, 存在使产业后备军减少的力量, 就存在使产业后备军增加的力量。如果失业工人大量增加, 产业后备军的减少有可能被抵消, 工资就会停滞, 但是目前看还没有出现这种情况。

证据 3: 工人阶级内部结构趋于稳定, 差异趋于缩小。2008 年之后城镇就业中农民工的比例基本稳定在 43% 左右, 2010—2014 年还稍有下降, 90 年代和 2000 年初农民工比例逐年增加的情况不同了。同时, 农民工在收入水平上与以国企为主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虽然还有很大差距, 但是差距在明显缩小, 2008 年农民工收入水平是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的 56%, 2014 年变为 61%。90 年代以来城镇工人和农民工彼此竞争, 资本家用农民工代替城镇工人, 这是工人力量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目前这种情况实际上有利于工人阶级的团结。

证据 4: 虽然工资有所增长, 但仍没有达到生活工资水平, 所以工资降无可降, 工人有理由有动力争取生活工资。中国工人的福利不是过高而是过低了。长期以来资本家没有给工人支付生活工资, 这方面的斗争空间是巨大的, 争取生活工资的斗争如果取得成效将显著改变劳资之间的分配关系, 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也会改变劳资之间的力量对比。

当前危机是工人阶级的责任吗? 当然不是。如果上述证据成立, 那么工资对利润产生了挤压, 但是就算是涨了工资也达不到生活工资的水平。资产阶级长期以来习惯了低工资, 大量僵尸企业靠低工资获得高利润, 现在工资涨了是理所当然的, 有什么理由责备工人?

同样, 正是因为工资达不到生活工资水平, 工人斗争还处在转折过程中, 工人力量强大的局面还远没有到来。但至少事情在发生变化, 90 年代以来劳资对立偏向资方的趋势正在改变。

工资增长对解决危机是否有好处呢? 危机的成因有生产过剩的一面, 工资增长会增加有效需求, 缓解生产过剩, 但工资增长会挤压利润, 恶化危机。目前的经济结构, 投资仍然是总需求的最重要部分。工资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负面作用会超过正面作用, 所以中国经济将在较长时间内处在这种低迷状态下。在这种情况下, 利润率低迷会促使资本进入金融领域从事投机, 可能导致金融危机的发生。国家再来个金融自由化人民币国际化就齐活了。唯一可能的路, 就是利用国有企业不计较利润率得失进行资本积累, 或许能冲破这种低迷局面。

#### 附: 原文后部分网友跟帖评论

[远航一号](#) 2015-11-22 18:47

“认识我的人都知道, 刘杰是个很温和的人, 善搞中庸, 胆子还小” 我认识刘杰, 刘杰所说不实。

修正了个别文字错误, 如原文中: “我衡量了统计中的劳动者报酬占 GDP 的比重, 劳动者报酬占不包括固定资产折旧在内的 GDP 比重, 还有企业部

门的剩余价值率，前两个指标都在 1997—2008 年上升，2008—2014 年下降，剩余价值率则相反。”按照文章原意，应为“1997—2008 年下降，2008—2014 年上升”

[远航一号](#) 2015-11-22 19:09

刘杰分析得好。我测算的中国利润率显示近年来下降幅度更大，但绝对水平仍高于美国。其中与刘杰利润率的差距，仍有待进一步切磋。刘杰与阳和平都使用了中国经济“当前危机”的说法。我认为不妥。中国资本主义经济虽然增长放慢，但是仍然属于按照较快速度增长（即使考虑到官方统计的浮夸成分）。个别行业（如钢铁煤炭）处于危机，但是整个经济不能算危机。危机一词不宜滥用，导致左派同志和一般群众以为，危机也不过如此，对资本主义没有大碍。到目前为止，中国资本主义尚未经历真正的经济危机

[龙翔五洲](#) 2015-11-23 00:56

“别套用马克思的一般理论，而要用马克思的方法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赞赏这个观点，也是我们运用马列毛主义观察分析事物的根本方法。

[刘杰](#) 2015-11-23 11:42

同意远航：1. 危机一词不宜滥用，目前还没有发生真正危机；2. 中国的利润率下滑，但是仍然高于美国，从这个角度说，中国资本家不是承担不起工资的提高；3. 远航的修改是对的，我笔误了。

## 刘诗蕾：社保基金收支压力在加大 媒体调查称 22 省养老金吃紧

2015-11-19 作者：刘诗蕾 来自：破土网

2014 年末全国社保基金滚存结余超 5 万亿元，总支出增幅持续保持在高位，专家称支出增大是人口老龄化的集中展现，并提醒长远而言，将影响社保金的可持续性。

近年来，全国社会保险基金收入增长已显乏力，支出增幅持续保持在高位。日前公布的 2014 年全国社会保险基金决算的说明显示，去年全国社会保险基金总收入 40439 亿元，比上年增长 12.4%。年末滚存结余 51635 亿元。总支出 33681 亿元，比上年增长 17.2%，支出压力不容忽视。

“通俗一点讲，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就是记录财政开支的‘国家账本’。”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所副所长赵锡军向界面新闻介绍，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即据国家社会保险和预算管理法律法规建立、反映各项社会保险基金收支的年度计划。

全国社会保险基金预算以险种论编制，含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工伤保险基金、失业保险基金、生育保险基金等社会保险基金。其中数额最庞大的当属涉及我国几亿企业职工的“养老钱”——职工养老保险基金。

2014年全国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基金收入23273亿元，比上年增加2483亿元，增长11.9%；支出19797亿元，增长18.6%。支出比收入增幅高6.7个百分点。2014年度收支延续了2013年起的逐年递减趋势，结余3476亿元，较上年减少615亿元。年末滚存结余30376亿元。

与此同时，2014年基本养老保险费首次出现了收入低于支出的情况。过去一年基本养老保险费收入为18726亿元，同比增长10.1%，增幅持续下降；而支出则为19045亿元，当年基本养老金支出高出基本养老保险费收入319亿元。

“全国企业职工养老金的统计对地方养老金实际情况的展现还是有限的。全国养老金的管理由各省的财政部门、民政部门来运行管理，分散在2000多个处于相对独立的状态的统筹单位中。”赵锡军表示，“广东、江苏的状态比较理想，与此同时，比如东北等地区养老金收支情况就恶化，统筹层次比较低，不能一概而论。”

从全国范围看，2014年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扣除财政补贴后，有22个省份当期收不抵支。《第一财经日报》调查发现，一些欠发达地区会动用失业保险金、工伤保险基金等有结余的基金发放养老金。与此同时，也有广东、山东、北京、浙江、江苏等省市2014年底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累计结余都超过了1000亿元。

为解决养老金区域分化严重的问题，上月召开的十八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明确将养老保险中的基础养老金进行全国统筹，也就意味着将事权提高到中央政府层面，通过归集使用以有余补不足。养老金入世也在进行中，今年出台了旨在推动养老金入市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投资管理办法》，以市场配置的方式提高养老金收益率，以保值增值。

就全国整体而言，职工养老保险、居民养老保险、职工医疗保险、居民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等6项保险基金都处于收支基本平衡、总收入略大于总支出的情况。去年一年全国社会保险基金收入增速出现放缓，支出增幅持续保持在高位。

“支出增幅大是人口老龄化的集中展现，体现了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分布变化。”赵锡军分析，“但按长远看，对保险金的持续性有较大影响。但如果前期缴纳积累经投资有了收益，通过收益进行弥补当期亏空都是正常的做饭，现在对可持续性影响确实是不能忽视的，因为现在还没积累起来经验，很多配套制度还在摸索过程中，比如完善个人账户制度、养老保险全国统筹等，还是需要制度来完善。”

同时值得关注的是，2014年度所有保险金中，只有失业保险基金总支出尚不及总收入一半。2014年失业保险基金收入1380亿元，支出615亿元。本年收支结余765亿元，年末滚存结余4453亿元。

“首先全国失业情况可能有改善，还有一个不能忽视的原因是各地失业险缴取的执行力度。这几年关于失业险难领的新闻还是不少，各地部门对失业险的领取做



了很多规定，比如缴不足一年不能领，主动辞职不能领。”赵锡军说，“失业保险一直是社保中比较难领到的，这种情况还是只能借助制度完善。”

## 【附】中国养老金亏空 3000 亿 进军 A 股补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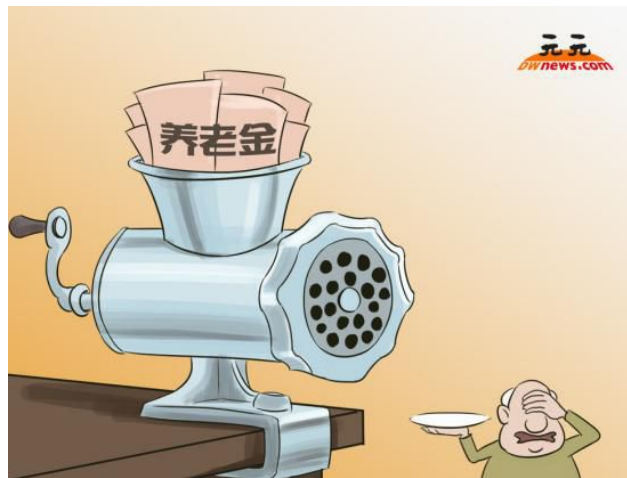
2015-11-19 作者：李星仪 来自：多维

据 2015 年中国全国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显示，剔除财政补贴后，2015 年养老保险“亏空”将超过 3,000 亿元(1 人民币约合 0.1568 美元)。人社部发布的《中国社会保险发展年度报告 2014》显示，中国 32 个统计单位数据中，黑龙江去年的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基金透支 105 亿元，数额居 32 个统计单位之首。

这意味着，养老保险的可持续性受到极大挑战，因为在中国由城镇职工和城乡居民两项制度构成的养老保险体系中，前者居绝对比重，占去年累计结余近九成规模。更值得关注的是，缺口到来的时点提前了。中国社科院财经院财政审计室主任汪德华曾在 2009 年做过测算，当时预计 2015 年才可能出现缴费赤字。

而且，中国作为一个急剧快速老龄化国家，抚养比将在不久的将来出现逆转。中国目前 3.04: 1 的职工养老保险抚养比，到 2020 年就要下降到 2.94: 1，2050 年将下降到 1.3: 1。也就是说，30 多年后基本就是用 1 个在职员工缴费供养 1 个退休人员。这对中国养老保险基金支撑能力构成极大风险。如果继续执行现有养老保险体系，到 2029 年，累计结余将消耗殆尽。

面对当前的严峻形势，为养老金寻找新的增长动力，就成了重中之重。毫无疑问，养老金投资 A 股，必然会成为焦点话题。在今年爆发股灾后，不足一个月，《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投资管理办法》就得到中国国务院批复。办法明确，投资股票、股票基金、混合基金、股票型养老金产品的比例，合计不得高于养老基金资产净值的 30%；参与股指期货、国债期货交易，只能以套期保值为目的。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根据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获得数据显示，截至去年年底，中国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的结余已超过 3.5 万亿元。按照 30% 的比例投资股市，有望带动 1 万亿元增量资金入市。这意味着养老金全面开启市场化、多元化、专业化投资时代。



养老金入市，确切地说是入股市，在中国引起很多争论。然而，纵观这些争论，里面有很多误解。养老金入股市不论在中国，还是海外都已经是个既成事实。真正的问题是如何控制养老金投资风险。

2007-2009 年的金融危机造成海外各养老金基金严重缩水的重要原因就是它们在股市上的损失。再以美国最大的加州公共职员退休系统基金（CalPERS）为例，它在后来破产的安然能源公司的一家股票投资就高达 4 千万美元。日本政府养老金投资基金在股票市场的投资也高达 21%（其中 11% 为国内股票，10% 为海外股票）。

但必须指出的是，养老金投资股市虽已是既成事实，但绝不应将其作为提振股市的手段。养老金基金的管理者应有强烈的责任感，那就是在一定风险期限内，最大化地提高基金的收益率。除此之外，一切都不应是基金投资的主要目的。养老金基金的社会责任不应超过为基金参与者谋求更高的收益率。

那么追根溯源，我们可以看看，作为工业革命发源地英国的养老金制度与法律保障。最基本社会保障制度推出前的英国，特别是工业革命之后城市化初期的社会底层，贫困现象曾是造成犯罪率高的主要原因。从 1908 年开始，英国议会推出第一部老年津贴法案，确保 70 岁以上公民每星期至少获得 5 先令收入，约合 0.25 英镑。

英国就业和养老金部委托独立的国家养老金信托委员会管理国家养老金的收入、投资与配发事务，并在投资分配中仅将约 30% 的资金投入于市场；对于何种证券可以投资，以及养老金/退休金中对其他政府债券、包括房地产等他类投资和现金持有量均有相应的法律规定。

当然，即使拥有完善的立法和透明的管理与监督制度，随着人口老龄化趋势日益明显，英国政府近年来也面临着养老金入不敷出等时代的严峻挑战；对此唐宁街 11 号也陆续决定在渐进式提高国家老年津贴起领年龄，并预计在 2046 年实行男女同龄（68 岁）领取基本老年津贴。

对此，面临更严峻老龄化形势的中国，必须要拿出大刀阔斧的改革勇气，养老金是否该入场 A 股已经是个伪命题。如何在尚在底部的中国股市，奠定稳定运行的基本规则才是当务之急。

## **摩根士丹利：劳动力人口萎缩阻碍中国经济以 6.5% 增长**

2015-11-19 来自：观察者网

摩根斯坦利的分析师说，“过去 50 年，没有一个经济体在劳动力人口萎缩的情况下以 6% 或更高的速度增长。从历史证据来看，中国达到 6% 或者更高速度经济增长的概率基本为零。”基于这一点，中国经济更可能以 4%-5% 的速度增长。

摩根士丹利新兴市场负责人 Ruchir Sharma 看来，由于劳动力人口减少，中国希望在未来五年达到年均 6.5% 的 GDP 增速面临严峻挑战。

Ruchir Sharma 是这样解释的：过去 50 年，没有一个经济体在劳动力人口萎缩的情况下以 6% 或更高的速度增长。“从历史证据来看，中国达到 6% 或者更高速度经济增长的概率基本为零。”基于这一点，中国经济更可能以 4%-5% 的速度增长。11 月 18 日，Ruchir Sharma 在接受彭博社采访时表示，自己是对 200 个国家过去 50 年的发展道路进行研究以后得出了上述结论。他的研究显示，经济增速若要维持 6% 甚至更高，劳动年龄人口就需要达到年均 2.7% 的增速。Ruchir Sharma 今年入选《彭博市场》杂志评选出来的“2015 年最具影响力 50 人”名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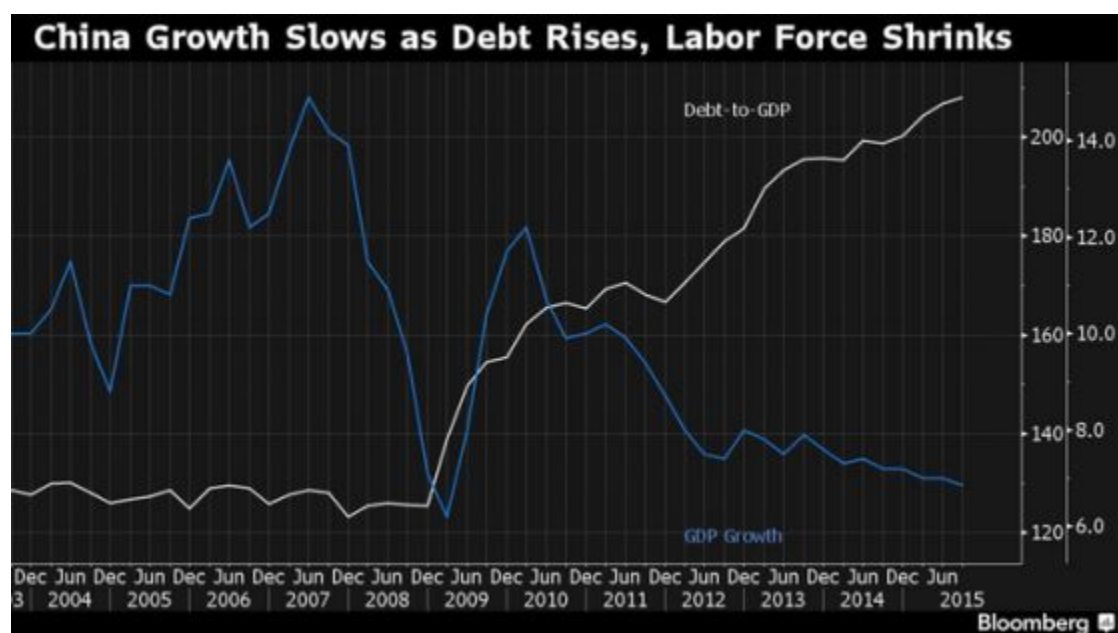
而中国的人口红利正逐渐消失。2014 年，中国劳动力人口(16 岁到 59 岁)出现至少 20 年以来的首次萎缩。联合国预计该数据未来 10 年将继续下滑。长期来看，劳动年龄人口减少是抑制需求的重要因素，人口结构的变动将对我国经济产生深远影响。

正值全球经济增速放缓、中国经济转型的当下，中国人口红利在最不合适的时候结束了。

为了完成“十三五”规划经济目标，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本月表示，要确保到 2020 年实现 GDP 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 2010 年翻一番的目标，未来五年的经济年均增长底线是 6.5% 以上。

参与彭博调查的经济学家预计，中国经济今年可能增长 6.9%，为 1990 年以来的最低增速。

为了遏制劳动力人口减少，中国在上个月宣布推出全面二孩政策，从上世纪 80 年代初开始执行的“单独一孩”政策正式退出了历史舞台。



Ruchir Sharma 表示，欢迎这样的转变，但是这些行动太晚，难以抵消人口趋势改变的影响。他补充说，生产率的提高可能不足以弥补劳动人口减少的缺口。

他的研究显示，日本和韩国等亚洲国家此前也经历过劳动力人口减少的发展阶段。日本劳动力人口在 1996 年开始萎缩的时候，年均 GDP 增速降至 0.8%，仅为之前 15 年均值的四分之一。

除了刺激人口增长以外，Ruchir Sharma 还认为，中国目前应该首先控制信贷增长。

中国家庭、企业债务在 GDP 中的占比从 2008 年的 125% 攀升到了 208%，高居发展中国家之冠，较金融危机前倍增。

但债务带来的边际效益却在递减。Ruchir Sharma 在今年 2 月初指出，2008 年中国每增加 1 美元的债务，就能对应地创造出 1 美元的 GDP。但到了 2013 年，需要举债近 4 美元才能创造出 1 美元的 GDP。

## 【国际瞭望】

### 法国新反资本主义党声明：他们的战争，我们的死亡——帝国主义战争的野蛮带来恐怖主义的野蛮

2015-11-15 来自：法国“反资本主义党”

编注：“反资本主义党”是法国近年新兴的一个左翼政党，在历史上来自于托洛茨基主义倾向的一个派别



法国新反资本主义党声明：

他们的战争，我们的死亡——帝国主义战争的野蛮带来恐怖主义的野蛮

周五晚上在巴黎发生的恐怖袭击已经导致 120 多人死亡了（此数据截止到该文写

作时——译注），还有好几十人受伤，这一令人发指的暴行让人厌恶和气愤。新反资本主义党（NPA）同样厌恶和气愤这种暴行，并愿意同受害者及其亲友团结一起。这一惨剧中更凶残的是，他们伤害的是无辜的受害者，凶手袭击的是普通平民。

发生在巴黎市中心的这一卑劣的野蛮行径是在报复法国，因法国战机在轰炸叙利亚（这一决定是由费朗索瓦·奥朗德作出的）时带来了同样的血流和更为恐怖的暴行。

表面上看，这些打击行动是要同伊斯兰国，同恐怖主义的圣战分子战斗，但事实上，同俄罗斯的干涉与轰炸一样，他们负责牺牲叙利亚人民以保卫独裁者阿萨德。而且事实上，叙利亚的平民是首要受害者，他们要么生活在恐怖之下，要么冒着生命危险逃离。

帝国主义野蛮和伊斯兰主义野蛮互相哺育对方。这样做是为了控制石油供应。

在可鄙的访谈中，奥朗德断断续续、结结巴巴地对共和国说了一些话。他说他是战争的领导者，承载着在这场悲剧中恢复“信心”的重大的责任。他向整个法国发布紧急状态，认为解决问题的方案就是践踏基本的自由。他马上就得到了萨科奇的支持。因此从现在起，当局可以禁止公共集会并控制出版。

再一次，要为这一系列野蛮暴行负责的主要人物们在号如民族团结。他们试图将现在动荡的局势转为对他们有利的局势，以遏制人们的义愤。他们有现成的替罪羊——穆斯林。我们反对同任何应为战争负责的人——资产阶级、奥朗德、萨科奇和勒庞——搞民族团结。我们谴责种族主义——当政府以“共和国价值”为名，以打击恐怖主义为幌子而推行种族主义时，事实上已威胁到民主权利了。我们要求解除紧急状态。

唯一能答复战争与恐怖主义的，是工人与人民不分出生地、肤色、宗教信仰团结起来，超越国界一起反抗那些要他们沉默、要控制他们的人，以消灭这个造就野蛮的资本主义制度。

要杜绝恐怖主义，就必须消除由跨国公司控制的、旨在连续不断地掠夺人民财富的帝国主义战争，就必须将法国军队从他们现在正在驻扎的所有国家撤回，尤其是叙利亚、伊拉克和非洲。

蒙特利尔，2015年11月14日

译自：

<http://www.npa2009.org/communiquelstatement-mpa-cruelty-imperialist-wars-results-cruelty-terrorism>

法语链接：

<http://www.npa2009.org/communiquelleurs-guerres-nos-morts-la-barbarie-imperialiste-engendre-celle-du-terrorisme>

# 王琪：市场的扩张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兴起

2015-11-15 作者：王琪 来源：破土工作室

**【破土编者按】**当地时间 13 日晚发生的巴黎恐怖枪击事件，震惊全球，也再次引发全球对伊斯兰问题和恐怖主义的关注。破土网针对今年年初同样发生在巴黎的查理周刊恐袭，曾经发表评论，认为查理事件代表着族群冲突成为转嫁阶级矛盾的手段。面对市场原教旨主义者所释放出来但无力解决的一系列冲突，罗莎·卢森堡的名言“社会主义还是野蛮”更显振聋发聩：人类如果不通过阶级政治走向社会主义，就必然会走向法西斯主义。何去何从，留待历史来检验。

## 市场的扩张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兴起

查理周刊事件再次引起了全球对伊斯兰问题的讨论。国内媒体也从不同的角度予以分析，如言论自由的界限、文明的冲突以及西方的双重标准等等。笔者则尝试从另外的角度，来探讨查理事件产生的社会根源。

伊斯兰复兴运动与新自由主义在全球的胜利恰恰在同一时段发生，这不是偶然现象，而是波兰尼所说的“双向运动”的结果。在波兰尼看来，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中，市场从来不是人类经济生活的主要形式，市场总是嵌入在社会之中，受到社会的控制，而只是在最近两三百年来，市场才逐渐摆脱了社会的控制并不断扩张，试图把一切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土地与货币——都商品化，这就是波兰尼所讲的“大转型”。劳动力商品化造成了毁灭性的后果，当国家政策通过更多地依赖于市场的自发调节的脱嵌方向移动时，普通人就会被迫承受高昂的代价，工人及其家庭变得更容易处于失业状态，农民被暴露在更大的国际竞争之下，而且这两个群体都被要求在更少得到帮助的情况下硬挺下去。正是因为市场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所以自我调节市场的每一步扩张都遭到社会的反抗，这种反抗不仅包括传统的工人运动，还包括了其他社会阶层，而国家在这种反抗运动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对阿拉伯世界来说，随着 19 世纪自由市场经济在全球的扩张，阿拉伯各国纷纷沦落成西方国家的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在从西方大量涌入的商品和资本的冲击下，阿拉伯世界的封建经济逐渐解体，大量的小生产者破产，失去了传统社会的庇护，沦为了城市中无依无靠的贫民。二十世纪的民族解放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对帝国主义的反抗本身就内在地包含着对市场的反抗和寻求保护的愿望。所以二战之后，阿拉伯的民族主义政权没有走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道路，而是以“阿拉伯社会主义”的名义建立了保护型的国家政权。在埃及，纳赛尔仿效社会主义国家，在工业领域对主要的工业、金融、商业实行了国有化，保障工人的就业和生活水平，限制资本对工人的剥削，在农村实行了土地改革并建立农村合作组织，同时还推行免费教育、建立最低工资和最高收入标准、限制房租和生活必需品价格等政策，为普通工人和农民的生活提供保障。在埃及的带动下，利比亚、阿尔及利亚、苏丹、叙利亚、也门、突尼斯等国，也相继走上了这条“阿拉伯社会主义”之路。在通过社会的保护限制、削弱了市场的

作用之后，宗教的社会基础也大为削弱，曾经在三四十年代的埃及获得广泛支持的穆斯林兄弟会在纳赛尔时代迅速衰落下去，其他阿拉伯民族国家的世俗力量也牢牢掌握着政权。

在纳赛尔死后，阿拉伯世界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支持和推动下逐步转向新自由主义，实行私有化、自由化、市场化的改革。国家让位于市场之后，原有的保护型的福利体系逐渐解体。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政策导致了大批工人变成市场上任人宰割的劳动力“商品”，生活水平迅速下降。阿拉伯社会主义时期对农民的保护政策也被废除了，农民日益陷于破产的境地。公共社会服务的市场化和福利的大规模削减导致普通民众丧失了基本医疗卫生和教育的机会，无法接受教育的穷苦孩子最终只能从事卑贱的工作，拿着微薄的薪水，来勉强维持家庭的生计。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之下，阿拉伯国家的民族工业也受到严重的冲击。大多数阿拉伯国家都面临“高失业、高通胀、高贫困”的困境，阿拉伯国家 28%的城市居民生活在市郊的“贫民窟”，不足 3 亿人口的阿拉伯世界贫困人口却接近 9000 万，至少 7300 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原教旨主义运动在穆斯林世界的兴起就不是难以理解的事情。这种表面上看起来是要复兴“传统”的伊斯兰运动，并不是要倒退到前现代社会。恰恰相反，伊斯兰的复兴是在现代化进程中所产生的现象。正如亨廷顿所指出的那样，原教旨主义运动没有得到农村的精英、农民和年长者的支持，其社会基础，恰恰是现代化进程的参与者与这一进程的产物，如从农村迁移到城市的城市贫民、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其中百分之七八十来自于农村）以及城市的下层中产阶级，因为这些人最强烈地感受到现代化进程中市场霸权给社会带来的灾难性后果。

两极分化的社会现实与伊斯兰教义中“社会公正”的信条相违背，伊斯兰教义中包含的平等理念提供了一种市场之外的替代性的选择，强调平等与朴素的穆斯林生活方式成为了改革失利者们赖以寄托的思想源泉。而宗教组织则为饱受市场侵夺之苦的穆斯林提供了归属感和庇护所。在政府退出之后，宗教组织开始填补政府的空白，充当了社会保护者角色。在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组建了广泛的组织网络，给大量的穷苦人民提供了卫生、福利、教育和其他服务。在约旦，穆斯林兄弟会在这个只有四百万人的小国家里开设了 1 所大医院，20 个诊所和 40 所伊斯兰教学校。而在加沙地带，伊斯兰教组织建立和经营了“学生会、青年组织、以及宗教、社会和教育协会”，建立了从幼儿园到伊斯兰教大学的各类宗教、诊所、孤儿院、养老院。在印度尼西亚，一个拥有 600 万成员的穆斯林团体组成了一个“世俗国家内部的宗教福利国家”，并通过一个精心建立的包括学校、诊所、医院和大专院校的网络，为全国提供“从摇篮到坟墓”的服务。以穆斯林兄弟会为代表的宗教组织通过自己的社会福利网络得到了穆斯林群体的广泛支持，对阿拉伯世界的影响越来越大。

基地组织等极端宗教力量也是从 70 年代之后获得快速的发展。新自由主义带来的贫困、失业、两极分化成为滋养恐怖主义的温床，极端组织从这些人群中源源不断地获得补给。2011 年革命之前，突尼斯的失业率高达 52%，而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的失业情况尤为严重，这些年轻人很容易成为极端组织的猎物。埃及著名的政治评论家穆罕默德·海卡雨评论说：“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在最贫穷的地



区蓬勃发展并从贫困中得到滋养并不是偶然。如果你是一名年轻的阿拉伯人，如果你受了教育，又回到了你的村庄，但是找不到工作，你自然有可能变成激进分子。在过去，你可能成为一名共产主义者，而如今你会变成为一名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

全球范围内的两极分化造成不同社会群体、国家之间的冲突日益加剧，失业、贫困、骚乱在全球多个国家蔓延。世界无疑已经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是继续市场化，还是抵制市场化？

在国内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看来，市场扩张所造的后果只能通过进一步市场化来解决，他们用一种完全不可能实现的市场乌托邦来为市场所造成的一系列后果辩护，正如俄罗斯休克疗法失败后，辩护者们把失败的原因归结为政客们屈服于社会的压力而没有实现完全的、彻底的市场化一样。我们相信他们是永远不可战胜的：“市场自由主义的乌托邦性质本身恰恰是它在智识上所具有的异乎寻常的弹性的根源之一。因为诸社会无一例外地在全盘市场自发调节化的悬崖边上退缩了，所以它的理论家就可以宣称，任何失败都不是设计本身的结果，而是缺乏贯彻它的政治意愿造成的。市场自发调节的信条由此就无法被历史经验所证伪，它的鼓吹者也有了无懈可击的理由来为它的失败辩护。”

撇开市场原教旨主义者那种自欺欺人的梦呓不谈，在如今的全球大环境下，人类将可能面临两种前途。

一种是通过阶级反抗运动来重建社会保护。波兰尼认为，经济自由主义原则与社会保护措施之间形成了深入骨髓的社会紧张的冲突，而这种冲突直接发生在对这两种原则持不同态度的阶级之间，“广大的劳工阶级则对打破市场法则毫不畏惧，并公开挑战市场。”这样，经济领域的冲突演变为政治领域的冲突，从而将整个社会都囊括进来，“在这个市场经济衰落的最后阶段，阶级力量之间的冲突决定性地登场了。”

另外一种走向以种族对抗为基础的法西斯主义。在波兰尼看来，法西斯主义的兴起正是市场失败所造成的结果。市场经济的扩张和“脱嵌”导致经济/逐利的原则侵入乃至主宰一切领域，导致社会不同群体之间的冲突加剧，并最终导致经济和政治体系全民瘫痪，法西斯主义由此而生。今天的世界也面临着同样的威胁。在法国，随着经济形势的恶化和失业率的增高，极右翼的“国民阵线党”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支持，他们鼓吹极端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认为外来移民加剧了法国的失业状况和犯罪率，增加了法国人的不安全感。在2014年的欧洲议会选举中，国民阵线党在法国赢得近25%的选票，成为最大赢家。而在德国，新纳粹势力也逐渐开始崛起，2013年极右势力制造的仇外暴力案件数量增长了20.4%。就在《查理周刊》恐怖袭击事件前一天，德国爆发了3万人的反“伊斯兰化”抗议游行，打出“欧洲爱国主义者反对西方伊斯兰化”的标语。仇视西方的伊斯兰极端势力和仇视伊斯兰的勒庞式种族主义是一体两面，都是社会强势阶级主导的市场扩张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的产物。但是他们把斗争的目标不是指向新自由主义、指向剥夺弱势群体的社会强势阶级，而是指向其他族群，用种族冲突取代了阶级政治，从而遮蔽了实质性的社会矛盾，保护了市场化的社会秩序。

此次查理事件，就是后一种冲突的产物。如今法国的失业率高达 24%，族群冲突就成为转嫁矛盾的最好手段。法国学者多米尼克加图指出：“‘伊斯兰化’为萨科奇政府成功分担诸多社会问题带来的压力，而这一工具，也被奥朗德政府完美的继承下来，因为政治家发现，无论面对多严重的社会问题，只要举起打击恐怖主义的大旗，大多数法兰西民众就会重新和政府团结起来，为了法兰西的生存，准备克服一切困难。”查理事件后，以国民阵线党为代表的极右翼势力进一步抬头，出现了越来越多要把穆斯林从法国赶出去的纳粹式声音，而穆斯林群体对西方的仇恨情绪也持续升温，巴基斯坦等地相继爆发了对查理周刊的抗议活动，法西斯式的种族冲突若隐若现。

亨廷顿所讲的“文明的冲突”，只是在共产主义陷入低潮后，阶级政治让位于族群冲突的产物。面对市场原教旨主义者所释放出来但无力解决的一系列冲突，笔者可以下这样的判断：人类如果不通过阶级政治走向社会主义，就必然会走向法西斯主义。何去何从，留待历史来检验。

附：原文后部分网友跟帖评论

[茅矛](#) 2015-11-15 17:52

希望左派的同志们多看一看这篇文章，一定会有收益的。

## 【聚焦工农】

### 下岗工人儿子对话李政道儿子：我们的头要比 150 年前还低

2015-11-17 · 来源：破土网

【破土编者按】改革开放初期以前，超过 40%的教育精英是工农子弟；改革开放中后期，超过 50%的教育精英来自有产家庭。这是李政道之子李中清教授最近的研究成果。知识是没有边际没有阶级的，这句话是句废话。底层孩子进入高等学府到底要经历多少艰难？每个底层孩子都有相似而不同的故事。



## 下岗工人儿子对话李政道儿子：我们的头要比 150 年前还低

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先生的儿子，香港科技大学的李中清教授对精英教育的阶层传递感上了兴趣。最近，他公布了自己多年的研究成果：

“在过去的 150 年中，中国的教育精英，即受过良好教育、最具优势的职业群体有四个阶段的转化：

1865—1905 年，即清政府废除科举之前，超过 70%的教育精英是官员子弟，来自全国各地的“绅士”阶层；

1906—1952 年，超过 60%的教育精英是地方专业人士和商人子弟，尤其是江南和珠三角地区；

1953—1993 年，约超过 40%的教育精英是来自全国的无产阶级工农子弟；

1994—2014 年，超过 50%的教育精英来自各地区的有产家庭，与特定的重点高中。”

报告还表明，21 世纪以来中国的精英大学中来自农民家庭的学生比例与人数均有下降，在自主招生体系中这一转变更剧烈。但在普通高考体系中，来自蓝领阶层家庭(农林牧副渔水利生产人员)的学生总体比例则相对稳定。而以苏州大学为例，干部子弟的情况也发生了很大转变，越来越多的干部是商业或企业干部，而非传统认为的行政管理干部。

拥有资本优势，就拥有了教育优势，几乎成了当代社会的常识。很多人说，中国当代的教育公平水平滑落到了 150 年前。

破土查到了六年前的一个数据：在 2009 届大学毕业生中，农民与农民工、产业 与服务员工家庭子女就读“211”院校的比例分别为 38%和 22%，而就北大这样精英学校而言，2013 年，北大新生中只有 14.3%的学生来自于农村。同时，有学者对无锡某职业技术学院 2007、2008 级 1250 名学生的家庭阶层进行了考察，发现该高职院校学生大都来自社会较低阶层，父亲职业属于农民、个体工商户、工人的约占总调查数据的 65%，母亲职业属于农民、无业、失业、半失业、个体工商户的约占总调查数据的 70.9%。精英学校的门为谁打开，一目了然。

底层孩子到底差在哪呢？

小刚来自一个西南边陲的“四五线”小城市，爸爸原来在银行里当保安，妈妈是纺织工人。90 年代中期，父母都双双下岗了，现在只能在菜市场租个摊位卖猪肉。和他的许多同学比起来，他是努力而且幸运的，因为他最终考上了大学，虽然也不是什么重点大学，但毕竟不是留守儿童的命运。

“我是我们高中成绩最好的，但是这并没有什么卵用。”小刚说，“即便是

在我们小城市，一个人应去哪所学校上学，根据的是其所属的学区而定。但是，重点学校的房价往往都高不可攀，在我们那个小城市，学区房的房价也要 7、8 千一平米，只有当官的或者是很有钱的人才能在买得起那里的房子。我们家不算有钱的，不过也不算最差，但只能到这样的学校读书，毕竟，到重点中学要交借读费，我们交不起。”就这样，穷人在城市拆迁和迁移中被“赶”出拥有优质教育资源的主城区，其集中的郊区和贫民区几乎没有重点学校。

小刚也有在重点中学的朋友，是妈妈原来工友的孩子。“她成绩也不错，上了‘自费线’（重点中学在招生时都有高、低两个录取线，达到高录取线的只需要缴纳政策规定的学费，而达到低录取线的学生需要以“捐助”或交纳“择校费”等形式才会被录取），她妈妈还是努力花了一些钱让她进了重点中学。但是她也无法像更多她的同学一样，花更多的钱上辅导班，成绩也是一般般，分数没有比我高多少。”小刚说。

城市中，重点高中集中了更多的社会上层子女，有数据表明，重点高中来自精英阶层的子女比例是城市非重点高中的 1.7 倍，是重点高中内下层阶层子女的 1.6 倍，在非重点中学中，来自下层的学生比例最高。如果将社会群体划分为高中低三个社会阶层，高层家庭的子女约 62%在重点中学学习，而低层家庭的子女恰好相反，约 60%在非重点学校就读。即在不同的高中，学生家庭背景的趋同性在增强。

但就算底层有运气好的孩子，聪明、勤奋、成绩好，真的就能脱颖而出进入重点大学学习吗？另一个数据又要震惊你：从进入高校时的录取线来看，有一项对某学院 2000 级新生的一项调查表明，父亲的社会地位不同，大学生入学的实际录取分数是不一样的，农村子女入学的实际录取分比干部子女的实际录取分高约 20 分，工人子女的实际录取分比干部子女的平均分要高出约 4 分。从大学生的学科专业的分布来看，也越来越具有阶层的属性。上层社会的子女更多地选择了热门专业和艺术类专业；而工人、农民等低阶层的子女选择冷门专业的更多。原因通常与高考层出不穷的加分政策相关。

当教育成为商品和市场的时候，自然是钱多的就能买到更多，进而成为教育精英，毋庸置疑。李政道是商人的儿子，在近百年以前，经过这样的阶层传递，他的儿子也同样成为了教授，中国的教育却依然没有变化，甚至，在对教育市场“无微不至”的开发之下，如今底层要成为教育精英，要走更为艰难的路。下岗工人的孩子尚且如此，更多农民工的孩子呢？他们或许只能进职校，早早地成为新一代工人吧，继续为精英教育出来的老板们打工吧。

## 郝贵生：石二群为什么从普通农民变为银行劫匪？

2015-11-21 · 作者：郝贵生 来源：乌有之乡

10月21日，郑州“1999.12.5”特大持枪抢劫银行案告破，主犯石二群等五人全部落网。《新京报》11月9日刊载记者张维写的报道《石二群的多面人生》，较为详细介绍了石二群如何从一个普通包工头到银行抢劫，再到房地产大亨的过

程。文中开始写道：“电影剧本中的情节成为现实版，十六年间，石二群走出了一条由抢劫、发迹、赎罪等关键词组成的多层面的人生路线。”石二群抢劫银行固然是极其严重的犯罪行为，其最终也将遭到法律的严惩。笔者作为一名研究社会问题的普通学者，不是如法律工作者那样去研究其抢劫银行行为本身的罪恶和量刑大小，而是要研究石二群为什么从一个普通的农民工头发展到抢劫犯，其社会根源是什么？这种人生轨迹有否普遍性？究竟如何防止类似现象发生？唯物辩证法认为，任何个别都是一般。石二群的个别中也包含着一般。笔者正是依据唯物史观理论和该报道中的个别，联系中国社会其它类似现象，揭示“石二群”现象的深层次社会根源，认识中国当今国情的具体特点，反思几十年来中国改革路线的成功与失败。

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有一个极其重要的观点就是“环境决定论”思想，即有什么样的社会环境就有什么样的人，改变了的人是改变了的环境的产物。马克思从实践观出发批判了这种观点，强调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但并没有否定社会环境对人的影响和决定作用。石二群从一个普通农民发展到银行劫匪，固然有其自身的原因，但不能否认一定的社会环境对其转变所起的一定意义上的决定作用。

该报道指出，石二群是从一个普通包工头发展到劫匪的。其实完整说应该是从一个普通农民发展到打工者再到劫匪的过程。而石二群从普通农民到打工者是中国当今大多数农民走过的人生轨迹。而之所以农民走这条轨迹，根源就是小岗村的私有化改革，使农村集体经济瓦解，农民完全依靠个人承包的土地根本无法解决生存和发展问题，迫使大量农民背井离乡到城市和沿海地区为国有企业和各种大大小小的私有企业打工。所谓“农民工”实际就是马克思《资本论》中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社会中那种没有任何生产资料、没有经济和政治地位的“无产者”。他们在城市从事各种最苦最累最脏的工作，而收入则是最低，且没有维护自身生存和发展的最基本的权利和各种社会组织。正因为他们与企业主的关系是典型的雇佣关系(与国有企业关系也是如此)，因此其收入只是其必要劳动时间创造的必要价值，其剩余价值已经被雇主所侵占，那么即使最低收入也都得不到保证。从“农民工”这种中国特色的生产关系开始，无论是国企还是私人企业，拖欠农民工工资现象比比皆是，几十年来从来没有停止过。石二群最初的社会角色无论是农民还是农民工，都是依靠自身劳动生存发展的普通劳动者。他作为第一代农民工也经历了上述受剥削、受压迫的这种场景。如文中写道：“1984年，头脑活泛的石二群在郑州当起了包工头。召了不少小时候的玩伴一起打工。‘本以为能赚钱，谁知道经常要不来工钱。’跟着石二群去打了两年工，李付强决定不去了。他说，经常看到石二群整夜整夜地坐在人家门口要钱，但对方理也不理。10月28日，被羁押在看守所的石二群回忆起当年的境况，也感慨连连。按石二群的讲述，一年春节前，他跑到一个开发商家里要欠的70多万工程款。去之前，他专门花了5600块钱买了两箱茅台酒，两条烟。好说歹说，对方只愿意给5000元。他试探性地问：‘能不能多给一点？’对方只回了一个字：‘滚！’还有一次，他要账只要回来一个大哥大手机。一年开学，大女儿要交500块钱学费，石二群实在拿不出，跑去找孩子舅舅。舅舅说：‘在郑州混了那么多年，连孩子上学的钱都拿不出来？’”不仅石二群有这种经历和感受，大多数农民工几乎都有这种经历和感受。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至今，企业拖欠农民工工钱现象不仅没有停

止，且愈演愈烈，为此导致人命案的现象屡屡发生，媒体几乎年年都有报道。去年底发生在太原的周秀云案件就是这种现象的典型。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认识这种现象，难道不是资方对农民工的残酷的盘剥和压迫吗？我们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性质的国家，法律应该最大限度地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且这些年“依法治国”口号喊得震天响。但现实生活中的法律不仅不去保护农民工的基本权益，甚至站在农民工的对立面资方立场上，合伙压制、打击、镇压农民工的维权行为和反抗斗争，甚至包括中央电视台的主流媒体都对农民工维权事实混淆是非，颠倒黑白，屁股彻底站在资方和官方立场上。是非极其鲜明的周秀云案件法律审判已半年有余，至今不予宣判。法律究竟是保护劳动者还是剥削者，其立场不是昭然若揭了吗？既没有法律也没有有关社会团体关心和保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但农民工也要生存，迫使个别农民工铤而走险。报道接着写道：“石二群说，多次的碰壁，使他萌生买把枪吓唬吓唬开发商的想法，‘好好要账’。1996年底，石二群跑到许昌买枪。却被人敲诈20万，对方称如果不给钱，就把他送到监狱去。为了付清这笔钱，石二群卖了老婆的首饰、项链，勉强凑了一两万，又借了亲戚朋友的18万。‘300块钱买的一辆自行车，最后也只卖了100块。’‘没有生存空间了’。石二群说，他于是有了抢劫的念头。”注意这句话“没有生存空间了”，因此，石二群抢劫银行难道不是无可奈何被社会环境所逼的结果吗？

大家知道这些年来，城市偷盗现象愈发严重，且大多发生在年末。其重要原因就是农民工一年赚不到钱，无法回家过年，于是产生偷盗现象。同时又使我想起了2013年中央电视台“今日说法”栏目播发的一贵州在浙江的年轻打工者也是到银行抢劫但未得逞的行为，其原因不是老板欠钱，而是因为其儿子被樱桃核呛入气管脑瘫，无钱救治，而社会无人关心、帮助，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一瞬间产生抢劫银行的邪念且付诸行动，最终入狱。如果其能够其在一定的社会组织中生活、工作，且能够得到所在社会组织领导和同事的关心、帮助，他能走上这条道路吗？这些都是个别的偶然事件，但这些个别、偶然现象中有否一般、必然的本质呢？

恩格斯1842年到1844年用21个月时间对英国著名工业城市曼彻斯特的工人阶级生活和斗争状况进行了全方位的调查研究，运用大事实说明当时的英国社会就是典型的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压迫剥削的社会，是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一场“社会战争”。他在其后出版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讲到：“因为这个社会战争中的武器是资本，即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直接或间接的占有，所以很显然，这个战争中的一切不利条件都落在穷人这一方面了。”恩格斯特别说，整个社会“穷人是没有人关心的；他一旦被投入这个陷入的漩涡，就只好尽自己的能力往外挣扎。……如果他找不到工作，那么他只有去做贼(如果不怕警察的话)，或者饿死，而警察所关心的只是他悄悄地死去。”我们今天的社会是否也是“一切不利条件都落在穷人这一方面了”？是否也是“穷人是没有人关心的”？在无生存空间时是否也被迫“去做贼”呢？中国当今社会的某些情景与恩格斯对英国当时状况的描绘为什么如此相似呢？因此笔者认为，农村私有化改革使农民沦为城市资本集团中的“无产者”是石二群沦为银行劫匪的根本的社会原因。不仅王二群的犯罪行为，改革开放以来几乎所有发生在农民身上的犯罪行为包括抢劫、偷盗、卖淫、杀人等等都与农村私有化和农民离乡背井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而上世纪80年代至今一直坚持集体化道路的南街村、华西村和周家庄等农村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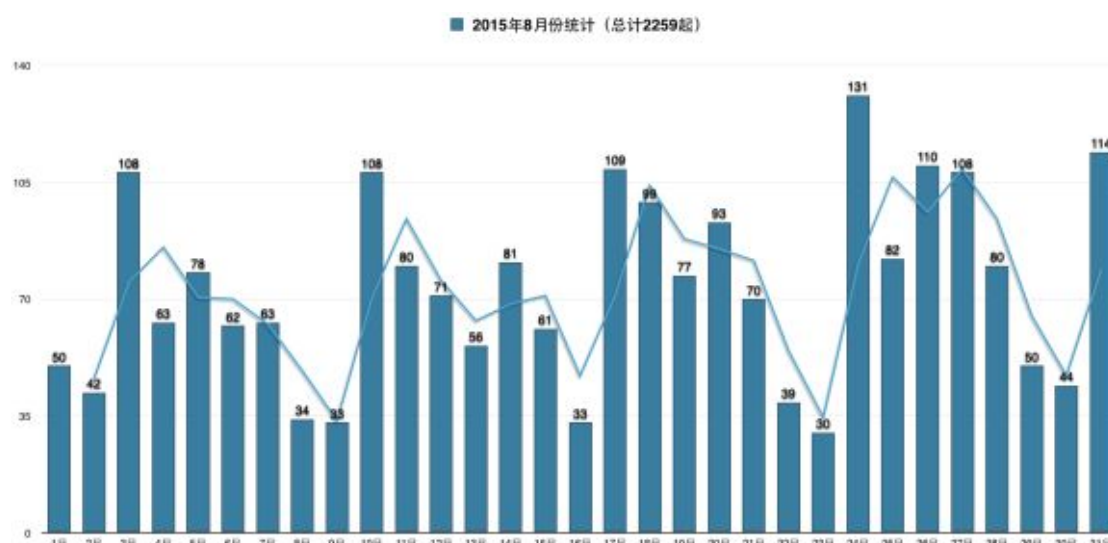
农民没有一个外出打工者，且把周围许多农民都吸收到集体企业中来。这样的农民不可能堕落为偷盗抢劫者。因此根除王二群犯罪现象，必须根除产生王二群犯罪现象的社会根源，单纯强化对其犯罪行为的严惩是无济于事的。

## 2015年8月份全国爆发大规模群众斗争 2200 余起（组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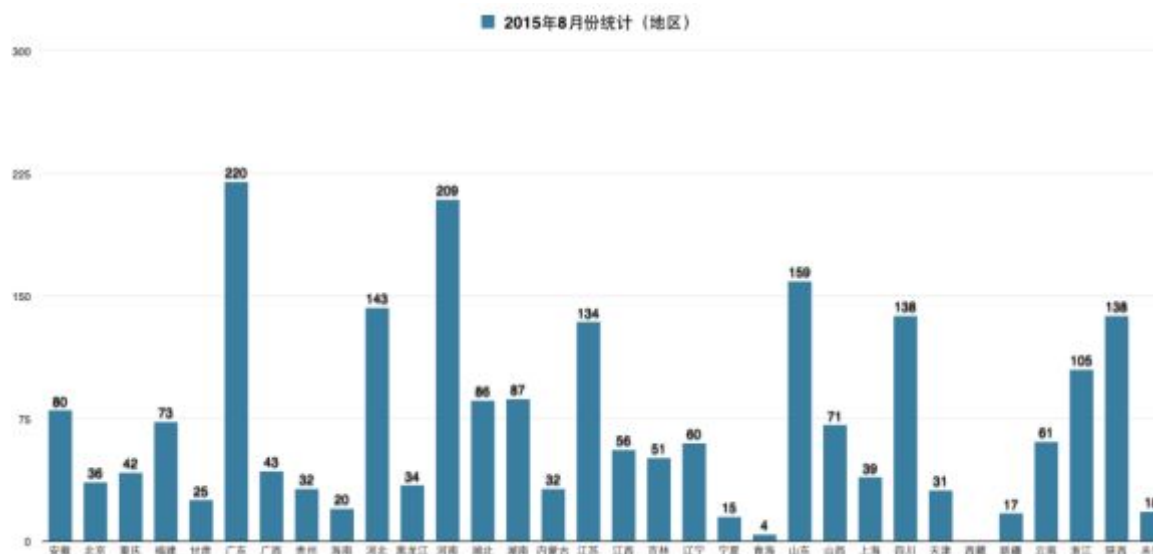
2015-11-16 | 来自: 非新闻

### 2015年8月份统计

总计：2015年8月份总计 2259 起，至少 183 起被镇压，1062 人被抓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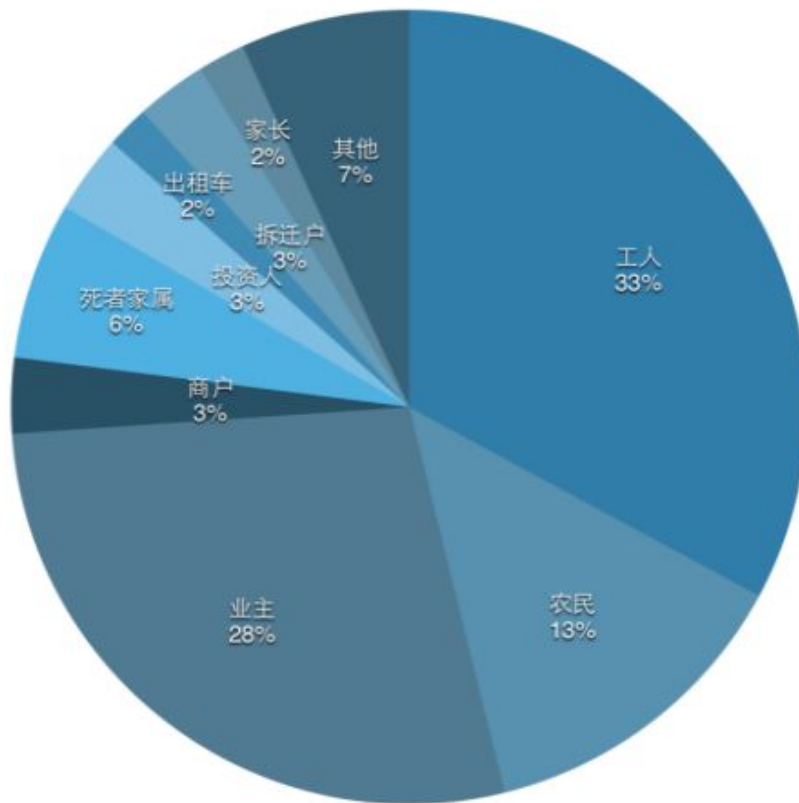
地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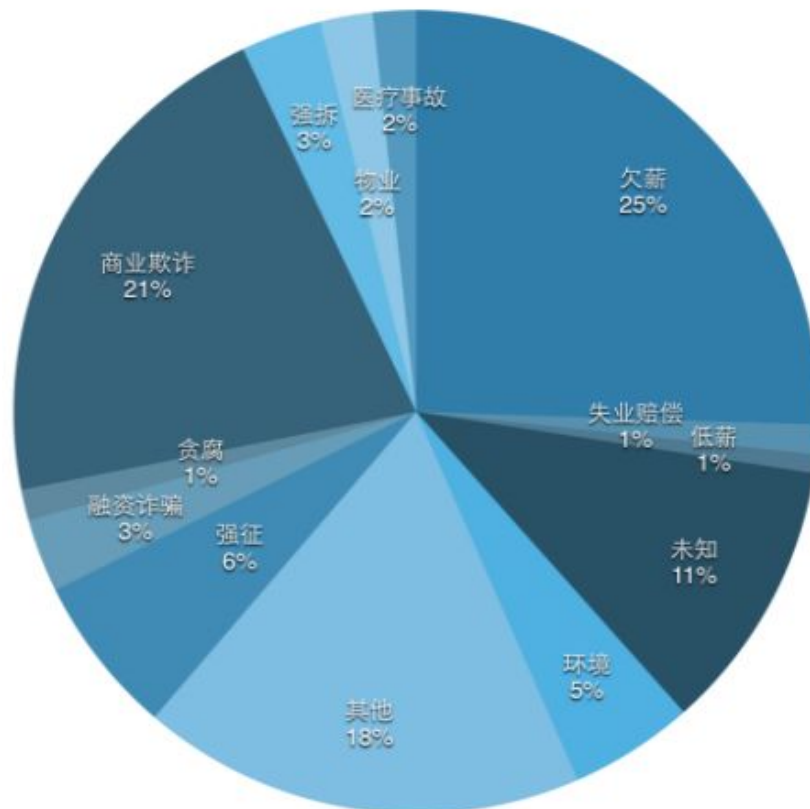
涉及群体:

2015年8月份统计 (群体)



引发原因:

2015年8月份统计 (原因)



附：原文后部分网友跟帖评论

[解廌角](#) 2015-11-16 10:57

多少陈胜吴广啊！多亏现代科技，让他们暂时不成气候。

**探索革命道路 重建社会主义**

《红色中国周刊》电子信箱：[redchinacn04@gmail.com](mailto:redchinacn04@gmail.com)

欢迎来信来稿参与讨论

—————本期完—————